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7期(总第229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新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金 鹏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胡海荣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 辑 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7-10

■ 学术论坛 -----		
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伦理悖论研究*	单英迪 赵丽梅	5
知识萃取研究述评*	高国伟 康 涔	10
■ 图书馆学史 -----		
郑振铎与萱荫楼藏书捐献史实考述	蔡成普	18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KANO模型的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	杨 敏	25
公共图书馆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初级实践应用及效果评价*	曾 舜	34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功能拓展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张烧婕	42
■ 工作研究 -----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具体规定及实施进展*	邢张睿 赵锦涛	47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述略*	黄秀娟	55
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实践探析 ——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张希慧	61

■ 阅读文化 -----

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邓李君 杨文建 67

数字阅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以宁波图书馆为例

华东杰 何东凝 74

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提升策略*

慎一虹 余百海 吴小娟 沈望舒 吕霞 李政 79

■ 文献学研究 -----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毛伟林 杨峰 尹飞 84

钱泰吉题跋辑考*

林才伟 90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7 2023 (Serial No.229) Monthly

Research on the Paradox of Data Ethics in Smart Library Services	Shan Yingdi Zhao Limei	5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Gao Guowei Kang Cen	10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Zheng Zhenduo's Donation of Books from Xuan Yin Lou	Cai Chengpu	18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Strateg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ruption Risk Based on the KANO Model	Yang Min	25
Primary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ser Portrait and Resource Portrait in Public Library	Zeng Lin	3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xpanding Service Function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Public Libraries i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Zhang Raojie	42
Public Lending Right in Taiwan Region: Pilot Programs,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Xing Zhangrui Zhao Jintao	47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ang Xiujuan	55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in Public Library Communication Space: Taking Guangzhou Library as an Example	Zhang Xihui	61
Research 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Deng Lijun Yang Wenjian	67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Services: Taking Ningbo Library as an Example	Hua Dongjie He Dongning	74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Cultural Reading Promo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Shen Yihong Yu Baihai Wu Xiaojuan Shen Wangshu Lv Xia Li Zheng	79
The Research of the Time to Complete the "Three Tong"'s "Jingjikao" and "Yiwenlve" Codified by Qing Dynasty Officials	Mao Weilin Yang Feng Yin Fei	84
A Critical Compilation of Qian Taiji's Postscripts	Lin Caiwei	90

· 学术论坛 ·

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伦理悖论研究*

单英迪¹ 赵丽梅^{1,2}

(1.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文章通过阐释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概念,从权力势差、利益冲突、规则约束缺失三个层面系统解析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形成原因;基于数据权力与数据安全两个维度论述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存在形式及其所造成的潜在威胁;从制约数据权力扩张、创新数据技术管理、强化数据权益主体追责、重视数据伦理教育四个方面提出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规避措施,旨在为寻求符合伦理规范的智慧图书馆服务创新提供建设性思路。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服务;智慧服务数据;数据伦理;伦理悖论

中图分类号: G250.7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aradox of Data Ethics in Smart Library Services

Abstrac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the paradox of data ethics in smart library servic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is paradox from three levels: power imbalan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lack of regulatory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data power and data security, it discusses the forms of the paradox of data ethics in smart library services and the potential threats it poses. The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to avoid the paradox of data ethics in smart library services from four aspects: constraining the expansion of data power, innovating data technology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the accountability of data rights holders, and emphasizing data ethics educ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ideas for seeking innovative smart library services that conform to ethical standards.

Key words smart library service; smart service data; data ethics; ethical paradox

1 引言

智慧图书馆服务是数据驱动型服务,是用户寻求高效便利的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诉求的一种表达^[1]。宏观而言通过多维度的用户数据确定主要用户群体,并对其信息特征进行分析与挖掘,微观而言记录与总结用户个体的信息偏好,实现智慧图书馆服务的主动

性、泛在化及个性化。用户本是智慧化服务的主体,但实际上却被“智慧”对象化,在享受由智慧数据带来的服务便利的同时,也会感知个人隐私空间缺失,以及在自我情感、思维与行为上陷入信息茧房,用户个体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它们在智慧图书馆服务实践中则有可能转化为一系列的现实数据伦理问题,并不断演变为各种可能妨害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现实伦理悖论。当前

*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双数’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SJGY20210689)和黑龙江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双数’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1B57)的成果之一。

学者从多视角对智慧图书馆服务存在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张健^[2]以法律解析的视角总结了智慧图书馆面临的伦理失范问题及成因,认为未来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智慧图书馆的伦理规范建设;陆康等人^[3]以技术应用的视角总结了智慧图书馆服务聚焦于大数据及其技术的创新应用,然而却忽视了数据主体尊重、数据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公平保障等伦理问题;Joachim Schöpfel^[4]以隐私保护的视角探讨了智慧图书馆价值理念与智能技术应用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认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容易受到大规模监控,存在侵犯用户隐私与削弱自由的伦理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助力智慧图书馆服务成为目前研究的显学,但是有关智慧图书馆服务中的伦理悖论仍缺乏系统的探讨。智慧图书馆要寻求符合伦理规范的服务创新途径,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彰显服务用户的存在价值,因此规避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伦理悖论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初心所在。

2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概述

2.1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

智慧图书馆是基于智慧馆员、智慧技术与智慧数据的新型信息服务平台,依托智慧馆员和智慧技术对大量用户数据进行整合集群与协同管理,通过更为精准的数据分析与挖掘形成智慧数据,并将其转变为用户知识画像^[5],以提供精准化、便捷化、及时性以及舒适空间体验的新型服务。基于数据的智慧服务成为智慧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6],在服务过程中所涉猎的数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用以支撑智慧服务的资源型数据,包括智慧图书馆自身所有的馆藏资源与其购买的各类数据库、知识库,同时开放获取资源也是智慧服务的一个重要数据来源^[7]。二是用户相关数据,包括自然数据与行为轨迹数据。前者是用户个体自然特征的直接反映,如用户注册信息时所填写的姓名、性别、身份证件、教育水平等身份数据;后者是用户在接受智慧图书馆服务的过程当中,留下的诸如检索记录、浏览记录、借阅记录等各种业务数据,是智慧图书馆形成用户画像以提供精准个性服务的主要数据支撑。

2.2 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伦理悖论

随着数据价值的广受关注,多个研究领域开展了基于专业情境的数据伦理研究,包括教育数据伦理、翻译数据伦理、科学数据伦理、健康数据伦理等,它们都是由数据伦理概念延伸扩展而来,丰富了数据伦理的概念体系与应用背景。数据伦理是描述人如何对数据进行正确抓取、存储与利用的行为准则,是用来规范人的数据行为的准绳和指南^[8-9]。综合智慧图书馆服务的特征,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可以定义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对与用户数据活动相关,包括管理、分析与挖掘等过程所产生的行为失范问题进行的道德思考,探究的是数据行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智慧图书馆服务追求为用户提供高效便利的应然状态,但现实却是用户自身也成为了被高效便利的对象,伴随数据行为而来的数据安全难以保障、数据隐私泄露的伦理问题也层出不穷,行为的目的与最后结果呈现“二律背反”^[10],不断衍生和演化为数据伦理悖论。因此,“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伦理悖论”,指的是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数据行为,基于目的达到为用户提供智慧服务的理想状态;从用户价值评判标准来看,是用户对实际履行结果感到个人隐私空间缺失,以及陷入情感、思维与行为上的信息茧房,并会为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担忧之间的“二律背反”,导致智慧图书馆服务最终呈现出与数据权力、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相悖的状态。

3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形成原因

3.1 智慧图书馆与用户的权力势差

数据规模和算法依赖是智慧图书馆服务的前提,也是带来权力势差引发数据伦理悖论的形成前提。大数据时代数据量激增,智慧图书馆利用技术对庞大数据资源的占有,使得图书馆可以轻松地通过对用户显性数据的提取,获取个人身份特征、阅读偏好、浏览记录等零散的用户数据化信息,并依托各种算法进行运算、分析与挖掘,识别用户隐性需求从而提供精准服务。智慧图书馆借助由数据规模和算法依赖带来的势差优势,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用户的思维与行为,形成隐性支配用户的权力^[11]。尽管智慧图书馆服务致力于满足用户日益增长与不断变化的知识和信息需求,但却会让用户感到自我在思维与行为上的受限。

现实所收集到的数据很多时候都并不完美^[12],智慧图书馆也同样如此。数据并不能代表用户的正确且全部喜好,数据本身带有的偏见、不平等也会使算法带有偏见和不平等,甚至催生算法异化。算法本身的缺陷使得数据可靠性和规范化的程度也大为降低,智慧图书馆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算法把用户的个人隐私变成“商品”。数据的占有差异和算法的过度依赖加剧了智慧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了权力积聚与分配的不均衡,在精准服务赋能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同时,用户价值挖掘出现异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尊严也没有得到捍卫。用户既希望自身得到精准服务,又担忧因权力势差对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所造成的威胁。

3.2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形成,从深层次来看,则是反映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相对问题,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嵌入,使得智慧图书馆与用户的利益在某些数据应用场景中存在冲突性,这受数据特性、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影响^[13]。智慧图书馆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诉求,包括响应数据共享理念、传播文化信息和承担社会责任,挖掘用户隐性需求,是平均主义基础上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智慧图书馆作为服务主体具有共性个性化,对用户数据的利用凸显了公共利益属性。用户面对海量资源环境和碎片化信息,希望智慧图书馆能够根据自身行为轨迹的数据记录,来提供细粒度的知识体系,并能够呈现与所需知识相关的多元载体形式的资源。用户作为服务客体具有个性多元化,通过数据交互行为获取智慧服务以满足自身信息需求,凸显的是纯粹的个体利益属性。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互融偏差,会使智慧图书馆掩盖可能伤害用户个体利益的数据行为,导致个体利益沦为公共利益追求下的牺牲品,如智慧图书馆注重数据共享而忽视了用户数据隐私安全问题;又如注重社会效益而滥用用户数据,从而侵犯了用户的权益。数据伦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除和协调数据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14],智慧图书馆服务过程需要平衡好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与用户在数据共享需求和隐私保护、文化传统和数据安全以及价值理念和读者认知等方面的冲突。

3.3 数据行为约束的规则缺失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形成与数据行为约束规则的缺失有关,宏观层面的数据行为规范体系的不成熟,以及个体层面的主体道德认知的匮乏,共同导致了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产生。2021年6月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强调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及安全防护建设,明确了数据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工作,但其规制范围十分广泛,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数据活动缺少明确规定。除此之外,我国虽然还出台了《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进一步对用户数据的使用加以约束,但同样缺少对具体活动的规定,安全隐私和权利边界模糊。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迅速推进和落地实施,与数据伦理领域的安全保护之间仍然存在差距^[15],智慧图书馆会由于缺少对具体数据行为的约束,导致服务过程因边界的模糊性而可能侵犯用户权益。

目前数据相对应的商业价值也迅速提升。2021年3月31日,由闪捷信息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数据泄漏态势分析报告》指出,与2020年相比,2021年数据泄漏所占比例呈现不断增长的宏观态势,其中以获利为目的的数据泄漏事件同占80%^[16],可见造成数据泄露的主要原因仍是利益驱动。利益的诱惑在数据行为规范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更易使数据拥有者和应用者降低道德标准,有意或无意地泄露用户数据。自身道德素养的缺失或偏差也会使得馆员及相关部门更易践踏数据伦理,产生伦理失范,加剧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用户在权力、安全与隐私方面的矛盾。

4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存在形式

4.1 数据权力悖论

数据权力悖论是大数据鸿沟的直接现实表现。在算法主导的智能互联网时代,数字网络平台成为了社会权力积聚的新场域,网络服务提供者成为权力主体,这种权力的获得在于某些主体相较于其他主体在技术、平台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数据生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开放性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创新提供了重要养料,基于技术与平台优势,与个体用户数据相比,智慧图书馆拥有更强的数据优势,即使智慧图书馆能够做到尊重用户权利,但它本身大于用户的数据权力

仍使得用户处于信息弱势,这就为数据隐私泄露伦理问题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数据作为智慧图书馆与用户交互过程当中的共同产物,当智慧图书馆利用数据开展系列服务时,用户应享有知情权,以明晰个体数据的流向与利用数据的最终目的,并应拥有对智慧图书馆数据行为的监督权。

智慧图书馆服务对算法的过度依赖,则可能会使桑斯坦的信息茧房假说成为现实^[17]。当下流行的精准推送本质上就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算法,智慧图书馆将用户所需信息等价为用户喜欢的内容进行推送,长此以往人们便会被同质性信息包围,这会使用户陷入“过滤气泡”。在这个“气泡”里,用户获得的信息将不再均衡和完整,用户也会被自动化地分类到不同“口袋”,形成“算法歧视”。这种权力走向的悖论要求智慧图书馆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充分尊重人的尊严,探求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从而规制潜在的权力风险。

4.2 数据安全悖论

智慧图书馆服务过程所涉猎的数据资源,在规模、密度、效率、多样性等方面越来越趋近于大数据,也将能够逐步持续创造间接的经济效益^[18]。出于权力势差、利益相对以及规则缺失的原因,智慧图书馆服务在持续关注实现用户数据价值的同时,也增加了用户数据安全风险,最终演变为数据安全悖论。在智慧图书馆服务流程的内部,数据安全悖论可能存在于数据的产生到存储、使用、共享以及发布的各个环节,如数据存储阶段中,数据的多类型、多来源、多维度的价值体现,也加剧了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管理的难度,难以保证数据的安全与服务质量;数据共享阶段对数据挖掘与分析后的结果,进行多平台与多系统的比对和纠正时,共享泄露的风险也在逐步增加。智慧图书馆服务需要依托更先进的技术支持,用户数据安全的保障也更加依赖于技术保护模式,但是一些信息技术本身存在的安全漏洞,以及实践中多维的数据源、多样化的数据挖掘和多角度的检索分析,使得现有的技术手段并不足以有效保障用户数据安全,还有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

智慧图书馆服务专注于数据价值的释放,依赖于数据技术的使用,但在很多情况下伴随数据的流动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衍生出现实的数据安全悖论。智慧图书馆服务过程中安全和隐私是密不可分的,数

据安全风险的增加对用户隐私也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衍生数据安全悖论的同时也会派生出用户隐私悖论。

5 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规避措施

5.1 制约数据权力扩张

从国家、智慧图书馆和用户三个层面共同制约数据权力扩张,以实现数据利用与个体权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国家层面,利用国家公权力限制数据权力无限扩张,通过个体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数据使用的规范细则,即对数据相关活动顶层立法的方式,避免数据权力积聚差异进一步拉大,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权力弱势一方面临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的伦理问题。智慧图书馆层面,借鉴相关法律与现有的政策法规,制定融合智慧图书馆服务业务发展与安全需要的制度,对数据伦理失范行为作出具体的惩罚规定,以约束和引导数据应用主体。此外,智慧图书馆服务相关用户的数据行为都需要一定的透明度,要构建政府、智慧图书馆、读者、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透明监管机制。用户层面,要加强对数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提高自身知情同意权利,当察觉数据拥有者和应用者侵犯到个人安全和隐私,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身权益。

5.2 创新数据技术管理

数据技术的创新速度超越了数据伦理的发展,导致技术难以受伦理的有效约束。要创新数据技术管理,建立针对整个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下的用户数据安全保障机制:数据收集阶段将私有链与公有链相结合,分别集成存档个体用户存取数据的记录,以及智慧图书馆资源型数据和整体数据的存取情况;数据挖掘阶段要关注数据引证性研究,对于所引证的与用户相关的数据,利用数据脱敏技术与匿名化处理技术,来保护用户敏感信息与个人隐私,降低数据发布的精度;数据共享阶段可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如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数据加密标准)算法、RSA(以数学家Rivest, Shamir和Adleman名字首字母命名)算法,即使读者隐私信息在网络传输时被非法窃取,也无法看到信息明文^[19];数据利用阶段可采用数据映射技术解决系统之间存在的数据接口问题,利用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技术保证智慧图书馆数据系

统资源的合法使用。智慧图书馆要充分利用各种语言、算法,在完善原有安全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用户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5.3 强化数据权益主体追责

通过责任追究用来协调利益关系,推动数据权益主体真正承担起其所肩负的权利与义务。首先,明晰数据权责界定,通过借鉴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实行方式,明确智慧图书馆数据服务的权力范围,包括“清单式”地公示数据职权、法规依据、服务流程和责任承担^[20],确保数据活动遵守权责对等原则的同时,真正做到以用户为中心,落实用户的自主权。其次,建立数据追责机制,智慧图书馆要遵循适度、正义、自由等原则,加强服务过程中对数据行为评判标准的建设。责任人员即侵犯用户数据权益的相关责任者,要施予一定处罚以规范数据伦理失范行为,有效利用保险制度来弥补用户数据权益在受损维护方面的不足^[21],最大限度地降低用户数据安全保障与隐私泄露的风险。最后,优化数据监督评价,接受来自用户、行业和媒体的监督、批评和指正,充分发挥社会合力作用。结合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权力扩张制约与安全隐私保护的需求和特点,开通网络投诉、举报、留言等多种反馈和建议渠道,为多方参与数据监督评价提供有效路径。

5.4 重视数据伦理教育

智慧图书馆可分别针对馆员和用户进行数据伦理教育,以提升数据相关主体的伦理规范意识,加强道德自律和数据素养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智慧图书馆要从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和职业规范等方面对馆

员进行数据伦理的教育与培养,馆员自身要具备道德想象力,具有保护用户数据安全和保障用户权益的思想意识,坚持伦理准则与道德底线,“内外”结合将数据伦理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智慧图书馆要将数据伦理的相关知识和可展示的数据活动流程公示于用户,让用户知晓与执行业务使用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要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开展规范化与多样化的数据伦理教育,加强用户自身道德判断与基本法制观念,最大限度地从本体(用户)降低客体(智慧图书馆)使用数据带来的伦理风险。技术的长期发展与人文的相互制约和融合^[22],将会使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用户之间存在的数据冲突达到平衡状态,数据伦理悖论也就会迎刃而解。

6 结语

本文从服务行为目的与用户价值判定呈现的“二律背反”出发,描绘了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存在,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这一悖论的形成原因、存在形式以及规避措施,为提升智慧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提供了指导方向。由于数据伦理悖论是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伦理冲突,结合智慧图书馆服务具体情境,研究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以及相关议题的相关文献和参考资料较少。因此,本文有关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的探讨与最终的系统研究尚有差距,期望未来能够对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伦理悖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完善相应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 [1] 初景利,任娇蕊,王译晗.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2):52-58.
- [2] 张健.《数据安全法》视域下智慧图书馆伦理规范问题研究[J].图书馆,2021(12):47-51.
- [3] 陆康,刘慧,任贝贝.从技术伦理到制度伦理的图书馆智慧管理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5):66-72.
- [4] Joachim Schöpfel. Smart Libraries[J]. Infrastructures, 2018, 3(4):43.
- [5] 廖运平,卢明芳,杨思洛.大数据视域下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29(3):73-82.
- [6] 龙军,向宏华.智慧社会视角下的智慧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2):12-17.
- [7] 王春迎,苏超萍,宋宁远.多源数据驱动下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1(22):49-55.
- [8] FLORIDI L, TADDEO M. What is data ethics?[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2016, 374(2083):2016036.
- [9] 宋晶晶.由信息伦理向数据伦理转型:溯源、驱动与路径[J].图书馆学研究,2020(3):35-39,60.

(下转第24页)

知识萃取研究述评^{*}

高国伟 康 涔

(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文章对知识萃取的概念、面临的问题、技术和应用进行了描述,通过对当前知识萃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述知识萃取的研究现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知识萃取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技术和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文章提出知识萃取的技术创新、知识库的构建和维护、知识图谱和知识融合的发展有可能成为知识萃取未来的研究热点,可以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知识萃取;大知识;知识获取;知识工程;知识图谱;知识融合;人工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 G252.8

文献标识码: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 challenge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By reviewing curr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is clarifi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extraction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 and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of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Furthe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need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 bas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graph and knowledge fusion could become the future research hotspots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Therefore, more in-depth research could be conducted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knowledge extraction; big knowledge;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engineering; knowledge graph; knowledge fusi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1 引言

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注重对知识萃取的研究。知识萃取是知识获取的最佳途径,选择合适的知识萃取方法和技术可以放大知识的使用价值。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知识的数量持续增长,知识的种类也愈加复杂。在网络发达的现今社会中,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持续摄取知识来充实自身,以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业并且发展事

业。但是由于知识存在质量良莠不齐、形式碎片化等特点,所以只有进行知识萃取,才能使人们更方便地获取高质量的知识。

知识萃取是大知识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知识工程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大数据时代下知识工程的核心是集成碎片化知识。知识萃取可以对碎片化知识进行组织和管理,以达到萃取出高质量知识精华并为人所用的目的。目前国外学者侧重于研究知识萃取的技术创新以及应用,国内学者则更侧重于研究知识萃取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但是总体来说缺乏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知识超网络的碎片化知识非线性融合方法研究”(项目编号: L19B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知识萃取的相关述评仍是一个空缺。

本文使用文献调查法、归纳总结法和比较分析法,总结归纳知识萃取的概念,梳理了知识萃取的技术,对国内外的知识萃取研究内容进行简要对比分析。并从应用知识萃取较多的领域入手,梳理了知识萃取的应用,最后提出了未来知识萃取的发展方向。

2 知识萃取概念

知识萃取(knowledge extraction),亦可称为知识抽取。业界对于知识萃取的概念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笔者梳理了学者们比较认同的知识萃取概念。吴庆海^[1]认为知识萃取是从大量数据、信息、文本、经验中,通过合适的方法和工具,将精华的知识抽取出来的过程。化柏林等人^[2]认为知识抽取是通过对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处理,把文献中所蕴含的知识点(也称知识元)逐条抽取出来,对知识的属性进行标记,再以一定形式存入知识库中。Jung Hanmin等人^[3]认为知识萃取是一种可以作为知识发现、数据挖掘和数据库的自然语言接口的基础前端技术,并且可以逐步转变为主要的Web应用技术。郑彦宁和化柏林^[4]认为知识的利用具有普遍性,从数据变成信息的过程需要知识,知识作用于数据转变为信息的转化过程之中。因此知识的加工、萃取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可以是对数据和信息的精炼。综上,本文认为知识萃取是指从数据、信息、知识等中,对有意义的知识元进行整合、加工和提炼,再将知识存入知识库之中,使知识更加容易被固化、传承,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3 知识萃取的技术研究

3.1 知识萃取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成为了用户分享的平台,用户生成内容逐渐增多并广泛传播,给知识萃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用户生成内容是指由用户创作并发布在维基百科、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5]。用户在互联网上随意发表观点、修改词条等行为,使互联网上存在大量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碎片化知识内容。由于碎片化

知识具有表征情境性、结构瑕疵性、领域多样性等特征,增加了用户精准把握知识的难度,使知识萃取面临了一些问题。

(1) 隐性知识的转化。波兰尼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已经被证实的,可以用语言、文字、图表等表述的知识。显性知识萃取是知识萃取的核心之一,也是知识工程的核心之一^[2]。隐性知识又被称为默会知识、意会知识,是指不可以用文字、符号、图表等表示出来,而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以及日常行动之中的知识。但是隐性知识却不能直接被萃取,需要将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才能进行知识萃取,以便更好地保留并发挥出隐性知识的价值。因此如何进行隐性知识萃取或者将隐性知识经过转化后再进行萃取,是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知识萃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2) 冗余知识的约简和提优。在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发展迅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发表观点。过多的用户生成内容使知识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复杂性也随之增加。由于知识的划分不明确,同时每名用户都拥有着自己的知识结构,所以往往会存在着一些重复或者不被他人所认知的知识。每名用户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专业性知识,但是由于用户生成内容过多,用户常常会摄取到一些非自身专业的知识。这些现象导致了知识存在冗余,增加了用户吸收知识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如何对这些冗余的知识进行约简并择优提取,是知识萃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3) 碎片化知识的补全。在大数据环境下会产生很多基于知识领域的情境知识,这些情境知识是基于当前某些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产生的,是不完整的,并且无法独立地表示某一领域概念。同时大量的用户生成内容使知识碎片化,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断章取义等情况,无法真正了解知识所表达的完整含义,这样就会使得知识库中的实体往往会存在信息缺失或不完整的情况。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会产生很多新知识存储到知识库中。因此如何识别不完整知识并将其进行情景化扩充和补全,是知识萃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4) 跨学科知识的规范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学科。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交叉流动,又发展出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生物

化学等。学科知识大多存在于图书、论文等传统文献之中。学科的不断演化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得很多不同的词语却被用于表达同一概念。由于学术环境的不同,不同学科对同一知识的理解和表达不尽相同,使知识存在语义问题。而且目前跨领域研究十分普遍,但是这种现象对跨领域研究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如何规范这些存在语义问题的领域知识,方便学者的跨领域研究,是知识萃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为了解决上述四个问题,本研究将知识萃取的技术划分为四个方面,即知识的转化、知识的约简、知识的补全、知识的规范。很多学者都在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并创新了知识萃取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所论述的知识萃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有些技术可能还不是非常成熟,有待后续的创新完善和发展。

3.2 知识萃取的技术

3.2.1 知识的转化

本体和神经网络是实现知识转化的有效技术。本体作为语义Web应用的核心,利用本体库可以实现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周宁等人^[6]对MUDs (Multi-User Dungeon) 进行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MUDs的新模型。该模型可以将用户输入的文本和概念图中的信息抽取出来,经过本体服务器的分析提取出新的知识,存储到本体库之中,实现知识的转化过程。神经网络规则抽取算法是一种有效获取隐性知识的手段^[7]。Luis E.Zárate等人^[8]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FCANN, FCANN是一种可以通过形式概念分析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FCA) 从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中提取和表示知识的方法。FCANN方法的实现共有8个步骤,具体如图1所示。由于隐性知识很难被提取出来,人类无法吸收网络中所保存的知识,而FCA可以从先前训练的神经网络中提取和表示知识。所以FCANN就利用FCA从先前训练的神经网络中提取和表示静止状态下的物理过程的知识,满足符号表示和易于理解的要求。

某些学者提出的模型也可以实现隐性知识的转化。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识转换生成模型——SECI (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Internalization) 模型^[9],包括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四个过程。外化过程可以用比喻或类比



图1 FCANN 方法的步骤

等方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再通过组合化过程对显性知识进行汇总,使知识的价值呈螺旋式上升。吴庆海^[10]在企业知识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萃取应用框架 (Knowledge Extraction Application Framework, KEAF) 模型。KEAF能够将存储于企业员工大脑中的经验萃取出来。这些经验作为隐性知识通过KEAF模型萃取出来,并让员工掌握其中的精髓,可以达到提升知识创造的效率和质量的目的,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3.2.2 知识的约简

粗糙集理论和模糊推理可以实现知识的约简,是知识萃取的主要技术。粗糙集理论提供了一种从决策系统或训练集中寻找属性 (条件属性、决策属性等),并且自动去除属性冗余成分的知识萃取方法,能够有效实现知识的约简。模糊推理模型是让用户通过容易理解的模糊规则深入了解位置的系统,也是一种能够处理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系统。Xu Hua等人^[11]提出基于粗糙集的多机器人协作系统 (Cooperative Multiple Robot Systems, CMRS),该系统是动态知识萃取方法,其中多知识的机器人具有识别环境变化的能力,能够做出更加可靠的决策。Wu Qingxiang等人^[12]开发了一种寻找多重约简的算法,该算法可以用于从UCI机器学习存储库中找到数据集中的多重约简。梁宗经等人^[13]基于粗糙集理论对高校网站信息进行属性约简、规则提取,最终推导

出12条决策规则用于后续的实证证明。Hanli Wang等人^[14]提出的基于多目标层次遗传算法(Multi-objective Hierarchical Genetic Algorithm, MOHGA)的新方案,此方案是一种基于规则的知识萃取方法,其流程如图2所示。该方法可以使模糊集和规则被最优简化,消除规则库中的冗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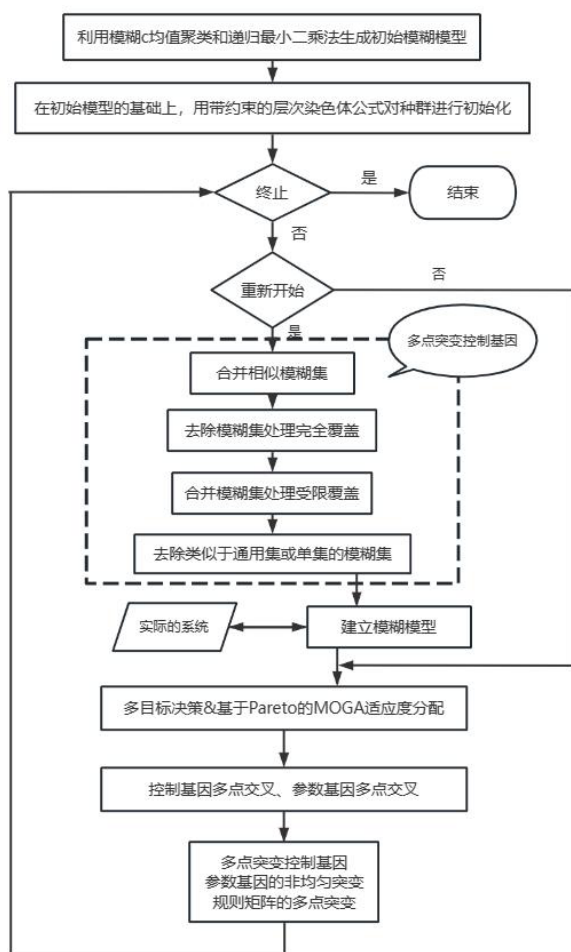


图2 MOHGA 的流程图

有学者还提出了其他可以实现知识约简的方法或模型。冷伏海等人^[15]提出了面向科技文献的混合语义信息抽取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抽取科技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性能指标等,达到去除冗余信息的目的。朱丹浩等人^[16]因为中文机构名结构复杂、识别难度大而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循环神经网络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对中文机构名称的识别。周宁等人^[17]提出了基于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平台的知识元抽取模型,该模型需要对基本知识元的结构、长度、内容三个方面进行解析和约束,抽取出知识元再存入到数据库中。

3.2.3 知识的补全

贝叶斯网络 and 知识元抽取可以很好地对知识进行补全。贝叶斯网络作为一种概率模型,可以学习和表示不确定和粗糙的知识,完成概率推理^[18]。同时贝叶斯网络很容易被解释,可以为提取的知识提供透明的洞察力,为决策过程提供信心。沈嘉懿等人^[19]基于中文机构名有多个简称、全称中实体过多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的中文组织机构全称和简称识别的方法。在中文组织机构全称识别过程中,通过规则匹配和贝叶斯概率模型确定组织机构名称的左边界,通过机构后缀词获得组织机构名称的右边界。而中文组织机构简称的识别是基于全称识别的,可以将简称和全称进行匹配,一定程度上补全中文组织机构简称。

董坤^[20]提出了基于知识元的非遗知识抽取与组织方法,该方法从最细粒度的知识元层面出发,通过构建非遗知识语料库、知识元抽取、知识元关联、知识元表达这四个步骤构建其组织框架,实现了对非遗知识的完整揭示与多元化表达。王忠义等人^[21]提出了一种基于碎片化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知识元抽取模型,如图3所示。该模型通过BTM(Biterm Topic Model)主题分割方法从用户生成内容中抽取知识要素,然后使用K-means方法聚类知识要素,最后根据知识要素的属性和聚类结果生成对应的UGC知识元。并且作者还对此模型进行了实验分析,分析结果可以证明该模型能够解决知识碎片化的问题,生成具有完整含义的知识元,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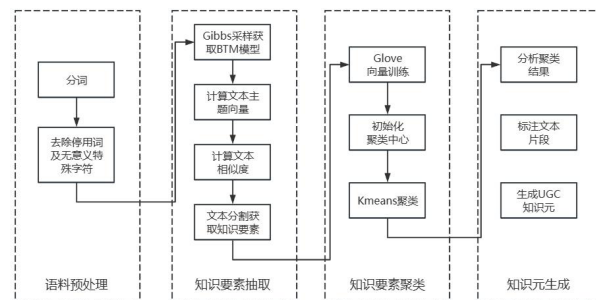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碎片化 UGC 的知识元抽取模型

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其他方法实现知识补全。Heru Agus Stantoso等人^[22]将概念层次结构作为背景知识,将背景知识融入到OWL(Web Ontology Language)本体的构建之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本体抽取方法。俞琰等人^[23]提出了一种融合论

文关键词知识的专利术语抽取方法,利用论文中丰富的关键词知识获取专利文本之外的特征,弥补专利语料库中信息不足的缺陷,提高专利术语抽取的准确率。

3.2.4 知识的规范

在知识萃取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命名实体识别(概念抽取)、实体关系抽取以及属性抽取等技术实现知识的规范化处理。本体、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可以有效解决某个实体有多种含义的语义问题。孙荣等人^[24]提出的基于规则的事件信息抽取方法,可以有效抽取事件信息,解决一词多义的现象。刘秀磊等人^[25]提出的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和卷积网络深度机器学习的关系抽取技术,对科技情报中预定义的关系进行抽取,增强了对科技情报对象的感知刻画能力。丁君军等人^[26]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学术概念属性抽取方法,可以从学术文献中抽取出对某一学术概念的属性,从而构建属性描述知识库。Jon D Patrick等人^[27]提出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系统框架,可以有效地对临床病历中缩写语等进行校对、规范。

化柏林^[28]提出了基于NLP的知识抽取系统架构,如图4所示,该架构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抽取两个部分。自然语言处理部分,需要对科学文献中的内容等进行句子切分、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等8个过程。知识抽取部分包括分析篇章结构、分析论文类型、知识表示、知识抽取4大模块。只有充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才能进行知识抽取。经过处理后的规范化句子,需要将其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形式存储到知识库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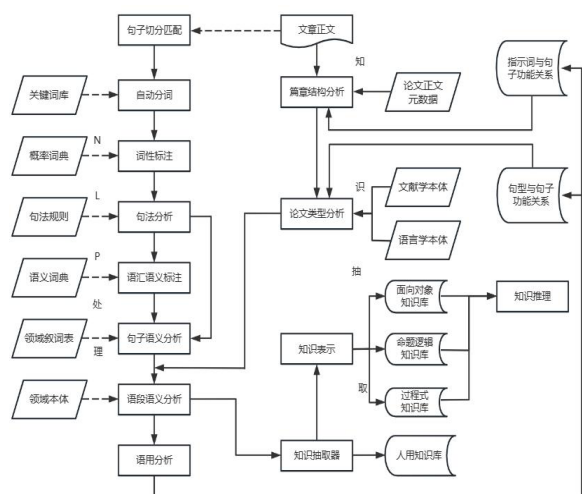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NLP的知识抽取系统架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实现知识萃取主要是通过本体和神经网络、粗糙集理论和模糊推理、贝叶斯网络、实体抽取等技术来实现。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本体、实体抽取、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以及企业知识管理、知识融合、知识图谱等领域。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神经网络、粗糙集理论、模糊推理等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国内外学者也都更加侧重于知识萃取技术的实际应用,通过一些思考或想法对已有模型进行修改或改进,亦或借助某项技术完成某一模型或算法的构建,来实现知识萃取,以此投入到某一实际应用之中。

4 知识萃取的应用

企业管理领域诞生出了许多有关知识萃取的典型方法,包括联想复盘、华为知识收割、美国陆军事后回顾等。最早做知识萃取的就是联想的联想复盘。联想复盘是由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先生提出的。联想复盘学习模式包括回顾目标、评估结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四个步骤^[29],旨在通过总结和分析过往事件,发现其中具有规律性的内容^[30],从而形成类似知识库的智慧结晶,为以后的事件作出指导和借鉴。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Jung Hanmin等人^[31]提出了信息抽取系统——POSIE (POSTECH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ystem), POSIE是在问答框架上混合自动引导和一系列学习算法的知识萃取系统。POSIE使用结构化的Web文档、字典和语义信息来设置实例和上下文的模式,用最少的人力来验证这些模式,然后迭代地发现新的模式。Fernando Gomez等人^[31]提出了一种从文本中提取知识的系统,是一个完全基于语义解释器输出的知识获取系统(Knowledge Acquisition System, KAS),旨在实现大规模的语义解释。

在生物医学领域,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是丰富的临床信息来源。但大量非结构化文本的存在阻碍了电子病历的发展,面对这种挑战,Guergana K Savova等人^[32]提出了临床文本分析与知识萃取系统(Clinical Text Analysis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 System, cTAKES),cTAKES结合了基于规则和机器学习的技术,旨在从临床叙述中提取信息。随着电子病历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对医疗实体和关系抽取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Zhao Qing等人^[33]提出

了知识增强关系抽取 (Knowledge-Enhanced Relation Extraction, KERE) 模型, 以提高电子病历中关系抽取的性能, 同时KERE模型还具有减少语义歧义和人工标注的能力。

在军事研究领域, 武器装备的制造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率先开展了有关知识萃取的研究工作, 将存在于人脑中的想法和经验转化为大家共同拥有的财富, 为大量的宝贵知识资源提供了知识共享的途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提出了面向型号的关键知识萃取及表达方法^[34]以及面向型号的知识萃取系统建设^[35], 力求提高航天型号知识的共享与利用以及航天型号的核心竞争力。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提出了基于知识标签的“3+4+5+2”式知识萃取模型, 对人脑中存在的隐性知识进行挖掘, 使知识外化和群化, 进而使他人得到分享并校验知识^[36]。Liu Chenguang等人^[37]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随机场和句法分析树的实体关系抽取方法, 优化了军事装备领域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

5 知识萃取研究展望

5.1 知识萃取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知识萃取的技术发展包括已有技术的组合应用、已有技术的突破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创新发现。现有的知识萃取技术种类繁多, 但是大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融合, 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目前许多知识萃取技术都同时存在着本体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影子。张敏等人^[38]在构建多维语义索引的时候就结合了基于本体和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 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 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多维语义索引。因此知识萃取的技术之间相互融合、互利互助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可以全方位地实现知识萃取的价值。

神经网络是知识萃取的重要技术之一, 知识萃取被证明是神经网络领域最有兴趣的开放问题之一, 所以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是值得广大学者关注并继续研究的。由于人们对神经网络系统内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认为其没有解释能力, 无法解释其潜在的推理机制, 因此神经网络通常被批评为“黑盒”模型。为了克服神经网络被称为“黑盒”模型的情况, 许多学者都做出了新的尝

试。Garcez等人^[39]做了从训练有素的网络中提取象征性知识的第一次尝试。Greer B.Kingston等人^[40]考虑到模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提出了一种从人工神经网络的权重中提取概率信息的通用框架, 以评估建模的输入—输出关系。因此在未来可以着重开发能够更加全方面来准确量化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重要性的技术, 最好解释其内部推理机制, 增强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实用性。

知识萃取是人工智能领域知识获取的关键技术之一。知识工程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成果之一, 知识工程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工智能中知识获取的问题。知识工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表示和知识利用三大过程。知识萃取是知识获取的方式之一, 但是知识获取却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难点。所以知识萃取技术的创新发展可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去原动力。因此如何发展知识萃取技术, 从而攻克知识获取的难题, 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进而丰富知识工程, 是未来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之一。

5.2 知识库的构建和维护

知识库的构建与维护一直是知识萃取研究的热点, 同时知识库的动态更新和维护一直是知识工程面临的一大难题。知识萃取是知识获取的有效方式之一, 知识获取又是知识库构建的前提, 所以知识萃取对于知识库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在知识萃取的过程中, 经过转化、约简、补全、规范等操作的知识都会存入于知识库之中。然而知识库之中的资源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 在一定的时期内, 时效性比较差的资源使用价值就会下降。如果仍旧将这些资源保留在知识库之中, 会给知识库的内存和运行造成压力。所以对知识库中的资源进行定期的管理。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新知识并保存到知识库之中, 使知识库中资源具有时代性。另外知识萃取的技术实现需要算法, 也需要计算机运行算法。但是算法和计算机都存在潜在的危险以及不确定性, 需要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定期的维护, 防止出现算法错误的情况。因此在知识萃取中, 知识库的构建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 是知识萃取未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5.3 知识图谱的应用和发展

知识萃取是知识图谱构建的主要技术之一, 为构建知识图谱提供数据基础。关键的萃取技术包括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属性抽取、事件抽取等^[41], 其中实

体抽取和识别是知识图谱构建的核心。由于知识的来源十分庞杂, 很容易出现知识的冗余或错误, 所以构建知识图谱的本体是一个难题^[42]。知识图谱中的知识需要补全与更新, 李纲等人在构建国家安全事件知识图谱的过程中就提及了对模式层和数据层的信息的补全和更新^[43]。因此需要研究更加通用的实体抽取技术和更加精细的算法来解释其知识来源, 开发更方便的本体构建方法, 探究动态的知识补全模型, 以构建高质量的知识图谱, 更加清晰地展示技术的演变。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知识萃取的重点研究方向。同时知识图谱的发展也方便了科研人员搜索、跟踪和更新技术文档, 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也为知识图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5.4 知识融合的发展

知识萃取是知识融合的重要环节, 知识融合是知识萃取的接续发展。知识经过萃取和融合会更好地发挥价值, 知识融合是通过实体消歧、实体对齐和知识合并等方法, 对经过知识萃取的知识进行融合, 从而形成新知识或新的知识组合的过程。知识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经过萃取的知识单元可以更好

地进行知识融合, 反过来更好的知识融合也会促进知识萃取的发展。知识萃取过程需要经过不断的评价和反馈, 以提高知识融合的效率^[44]。知识融合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知识, 新知识会给知识萃取带来挑战, 但是也会促进知识萃取的技术发展。知识融合的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医疗、军事、商业等。知识融合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也会给知识萃取带来新的机会。因此知识萃取和知识融合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发展, 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6 结语

知识萃取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异构知识中萃取出精华。许多学者不断针对知识萃取进行了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 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知识萃取的内容。但是当前知识萃取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一些知识萃取的技术研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没有更加深入的实践。所以知识萃取的未来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研究方向和领域也需要不断深化拓展。相信知识萃取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可以为知识工程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 [1] 吴庆海.企业知识萃取理论与实践研究[J].知识管理论坛,2016,1(4):243-250.
- [2] 化柏林,张新民.从知识抽取相关概念辨析看知识抽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情报科学,2010,28(2):311-315.
- [3] HANMIN J,EUNJI Y,DONGSEOK K,et al.Information extraction with automatic knowledge expansion[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2005,41(2):217-242.
- [4] 郑彦宁,化柏林.数据、信息、知识与情报转化关系的探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1-4.
- [5] 赵宇翔,范哲,朱庆华.用户生成内容(UGC)概念解析及研究进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5):68-81.
- [6] 周宁,王淼.基于MUDs的面向特定领域的知识管理模型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164(5):33-38.
- [7] 孙晨,周志华,陈兆乾.神经网络规则抽取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0(2):34-37.
- [8] Zárate L E,DIAS S M,SONG M A J.FCANN:A new approach for extra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from ANN trained via Formal Concept Analysis[J].Neurocomputing,2008,71(13/14/15):2670-2684.
- [9] NONAKA I,TAK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10] 吴庆海.知识萃取应用框架研究与实务[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65-69.
- [11] XU H,JIA P F.A novel dynamic knowledge extraction method in cooperative multiple robot system using rough set[C]//IFIP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September7-9,2005,Beijing.New York:Springer New York.2005:535-543.
- [12] WU Q X,DAVID B.Multi-knowledge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C]//Proceeding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ugh

- Sets, May 26–29, 2003, Chongqing,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3: 274–278.
- [13] 梁宗经, 旷芸, 雷应喜.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高校网站信息知识发现[J]. 现代情报, 2010, 30(11): 19–24.
- [14] WANG H, WONG S K, JIN Y C, et al. Multi-objective hierarchical genetic algorithm for interpretable fuzzy rule-based knowledge extraction[J]. Fuzzy Sets and Systems, 2005, 149(1): 149–186.
- [15] 冷伏海, 白如江, 祝青松. 面向科技文献的混合语义信息抽取方法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11): 112–119.
- [16] 朱丹浩, 杨蕾, 王东波.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文机构名识别研究: 一种汉字级别的循环神经网络方法[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6(12): 36–43.
- [17] 周宁, 余肖生, 刘玮, 等. 基于XML平台的知识元表示与抽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6(3): 41–45.
- [18] ZHANG Y C, LAN Y X, FANG Q, et al. Effici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Demonstration via Bayesian Network-Based Knowledge Extraction[J].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1: 1–16.
- [19] 沈嘉懿, 李芳, 徐飞玉, 等. 中文组织机构名称与简称的识别[J]. 中文信息学报, 2007(6): 17–21.
- [20] 董坤. 基于知识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抽取与组织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9): 148, 155–160.
- [21] 王忠义, 郑鑫. 基于碎片化UGC的知识元抽取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324(1): 188–194.
- [22] SANTOSO H A, HAW S C, ABDUL-MEHDY Z T. Ontology extraction from relational database_ Concept hierarchy as background knowledge[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1, 24(3): 457–464.
- [23] 俞琰, 陈磊, 姜金德, 等. 融合论文关键词知识的专利术语抽取方法[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4): 104–111.
- [24] 孙荣, 周文, 刘宗田. 用规则抽取句子中事件信息[J].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11, 32(11): 2309–2314.
- [25] 刘秀磊, 王延飞, 刘思含, 等. 科技情报对象关系抽取的技术选择[J]. 情报工程, 2018, 4(3): 39–47.
- [26] 丁君军, 郑彦宁, 化柏林. 基于规则的学术概念属性抽取[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 34(12): 10–14, 33.
- [27] PATRICK J D, NGUYEN D H M, WANG Y F, et al. A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reuse pipeline for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clinical notes[J].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1, 18(5): 574–579.
- [28] 化柏林. 基于NLP的知识抽取系统架构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7(10): 38–41.
- [29] 徐宁. 互联网时代下组织学习机制构建: 以联想复盘式学习模式为案例[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24): 58–62.
- [30] 柳传志. 复盘: 最好的学习方式[J]. 新远见, 2013(7): 59–61.
- [31] FERNANDO G, CARLOS 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J]. ScienceDirect, 2007, 20(1): 51–60.
- [32] SAVOVA G K, MASANZ J J, PHILIP V O, et al. Mayo clinical Text Analysis and Knowledge Extraction System (cTAKES) architecture, component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s[J].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0, 17(5): 507–513.
- [33] ZHAO Q, LI J Q, XU C, et al. Knowledge-Enhanced Relation Extraction for Chinese EMRs[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2, 22(4): 57–62.
- [34] 朱红, 贾倩, 杨玉莹, 等. 面向型号的关键知识萃取及表达方法研究[J]. 航天工业管理, 2017(4): 11–14.
- [35] 姜悦, 姚星合, 郭大庆, 等. 面向型号的知识萃取系统建设[J]. 航天工业管理, 2019(4): 8–11.
- [36] 赵媛心, 杨飞, 底亚峰, 等. 基于知识标签法的专业知识萃取与应用实践[J]. 航天工业管理, 2019(4): 39–43.
- [37] LIU C G, YU Y L, LI X X, et al. Application of Entity Relation Extraction Method Under CRF and Syntax Analysis Tre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Equipment Knowledge Graph[J]. IEEE Access, 2020(8): 200581–200588.
- [38] 张敏, 丁良萍, 刘欢. 面向科技文献的多维语义索引构建思路及实现[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8): 139–145.
- [39] GARCEZ A A, BRODA K, GABBAY D M. Symbolic knowledge extraction from trained neural networks_ A sound approach[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 125(1/2): 155–207.
- [40] KINGSTON G B, MAIER H R, LAMBERT M F A. A probabilistic method for assisting knowledge extraction from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used for hydrological prediction[J].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2006, 44(5/6): 499–512.
- [41] 于浏洋, 郭志刚, 陈刚, 等. 面向知识图谱构建的知识抽取技术综述[J]. 信息工程大学学报, 2020, 21(2): 227–235.

(下转第78页)

郑振铎与萱荫楼藏书捐献史实考述

蔡成普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1951年郑振铎南下赴华东地区进行工作考察,发现明初刻本《天工开物》,由此多方努力联系到藏家萱荫楼李氏,决定征集全部藏书两千八百余种、三万余册。随后多方协调,事无巨细,动员萱荫楼李氏捐书、协调接收、提书进京;善始善终,协调李氏家人安置等。一斑可窥全豹,可见郑振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动员私人藏书家进行藏书捐献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 郑振铎; 萱荫楼; 藏书捐献; 《天工开物》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Zheng Zhenduo's Donation of Books from Xuan Yin Lou

Abstract In 1951, Zheng Zhenduo went to East China to conduct work investigations and found the M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book *Tiangong Kaiwu*. Through various efforts, he managed to contact the collector Li from Xuan Yin Lou and decided to collect more than 2,800 types and over 30,000 volumes of books from their collection. Afterwards, with extensive coordination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Zheng mobilized the Li family to donate books, coordinated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of books to Beijing, and ensured the proper settlement of the Li family.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Zheng Zhenduo'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in mobilizing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to be donated to the sta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Key words Zheng Zhenduo; Xuan Yin Lou; book donation; *Tiangong Kaiwu*

郑振铎作为藏书家,自己收书、藏书,同时也为国家守护古籍,为我国古籍保存和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上海“孤岛”时期与张元济等人向政府请愿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典籍,为世人所称道。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历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领导全国古籍保护事业,进一步为古籍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中指出:“郑振铎(1898—1958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在文化部的行政主管工作岗位,为积极抢救和保护流散民间的文献典籍而呼吁而尽力,另一方面则一直做着说服和动员历尽战火劫难的私

人藏书家,如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等,将家藏书籍捐献给国家的工作。他奔走于南北方之间,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20世纪中后期我国国有藏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在动员私人藏家捐献古籍方面,新中国建立之初动员萱荫楼藏书捐献就是其中典型一例,由此也可见郑振铎保护文献典籍之一斑。

1 萱荫楼藏书捐献研究现状

萱荫楼是浙江宁波较为晚起的一座较大型私家藏书楼,1927年由当地李氏家族主母方矩为李家创办。方矩(1893—1978年),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

区)人,出生在富商家庭,善于经商,丈夫李瑞瑚19岁时因患伤寒病去世,育有女李访梅,又过继丈夫胞兄之子李庆城。方矩重视子女教育,1927年购入当地著名藏书家蔡鸿鉴的墨海楼藏书236橱,将位于毛衙弄住宅内的明轩楼作为藏书楼,聘请李家的家庭教师蔡和铨管理藏书。藏书楼命名为萱荫楼,蕴含“书为母氏所得”^[2]之义。为妥善保存图书,方矩特意将萱荫楼一楼布置为灵堂,楼上储书。1936年方矩将萱荫楼交给结婚成家的继子李庆城管理。在方氏李氏的悉心保护下,萱荫楼藏书完好保存至解放后。

萱荫楼建成后,因遭遇战乱,长期不为人所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渐有人撰文介绍,如袁元龙《萱荫楼与墨海楼》^[3]、《明州史话:萱荫楼与墨海楼》^[4]、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十二卷》^[5],以及萱荫楼曾经主人李庆城所撰《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记事》^[2]、俞信芳《萱荫楼主李庆城先生藏书始末》^[6]、李性忠《萱荫楼及其藏书价值》^[7]、骆兆平《萱荫楼献书充公库》^[8]等。这些文章基本是对萱荫楼藏书来源、藏书情况和捐献图书过程的简要介绍,对郑振铎协调此事,也是简单提及。萱荫楼李氏后人李定鑫撰《萱荫楼往事》^[9]文,补充了萱荫楼藏书以及捐献的部分细节,对郑振铎动员捐书起到的作用有所着墨。其不仅指出因郑振铎的名声好,方氏才同意捐献,并表彰“郑公办事认真,能将捐献者的要求放在心上”。李性忠《萱荫楼——民国时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一文^[10]较为后出,对萱荫楼藏书来源、所藏图书价值、藏书数量等作了较详细考证,并纠正了前人研究文章关于萱荫楼创办时间、《萱荫楼李氏藏书目录》编者和编辑时间、萱荫楼捐献时间的讹误。辨正捐献时间部分明确指出,“萱荫楼藏书的捐献是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的直接关心和具体安排下进行的”。同时对捐献时间作了简单梳理。该文作者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有条件见到浙江图书馆藏萱荫楼藏书捐献档案资料,文章提到的郑振铎致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①副馆长徐韬的信,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当时给浙江省文教厅关于萱荫楼藏家捐献情况的汇报,都是很重要的资料,有助于对当时捐献过程的全面梳理。此外,陈福康《郑振铎传》^[11]以及郑源《郑振铎画传》^[12]等著作虽对郑振铎协调萱荫楼捐献事有所着墨,但作为郑振铎一生传记或限于年谱体例,对此均未展开。此外,《宁波通史》^[13]《宁波图书

馆志》^[14]《宁波词典》^[15]《浙东藏书史》^[16]等著作对相关史事也仅简单提及,未提供新的数据。一些论著中关于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保护文献典籍的论述较为宏观,本文全面梳理相关资料,考证郑振铎在李氏萱荫楼藏书捐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及所做的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工作,揭示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抢救和保护散落民间的文献典籍所作的巨大贡献。

2 初见明刊本《天工开物》

1951年4月14日,郑振铎南下赴华东地区进行工作考察,在浙江宁波考察过程中于冯孟颀处偶然见到李氏藏书目录中收录有明刊本《天工开物》,极为惊喜,在4月25日写给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的信中透露出将此书化私为公的想法:

在江南已经十天,办了不少事。曾到宁波,登天一阁观书,此是生平第一次,亦快事也!阁无恙,书亦无恙……蔡氏书售给李爱廪(按:经与该书著者刘波研究馆员确认,此处应为李庆城,信函原件中为李庆尘,应为同音字误)的,在冯孟颀处见到其目,其中竟有明刊《天工开物》!为之惊喜欲绝!惜主人不在,未能一阅。此是极重要的消息,必欲告兄,且也必须设法得到也。得此书,其他皆若尘土矣……此间保护甚为周到,因之行动也大受限制。本想逛逛九溪十八涧,怕太麻烦人家,也许竟不去了^[17]。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学者宋应星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关于农艺学和工艺学的综合性科技著作,是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一部重要著作。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宋应星在好友涂伯聚的资助下刊行此书,被称为涂本,是该书的初刻本。清乾隆年间,宋应星因受兄长宋应升的株连,该书未被《四库全书》收录,几近失传^[18]。该书当时在我国虽不受重视,但流传到日本、英国和法国后,受到高度评价,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作的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19]。郑振铎发现李氏萱荫楼收藏的《天工开物》是明代初刻本,最为珍贵。版本学家李致忠指出:“今检此书目录后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迹象,故此本当是涂、宋二氏初刻之本,洵为珍贵。”^[20]

郑振铎在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购珍贵文献时负责文献采访、转运等工作,与各地藏书家、书贾洽

购古籍,建立了人脉广泛的古籍交游圈,及时掌握书讯抢救珍贵古籍。他曾说:“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21]在工作考察过程中,他从古籍交游圈获悉明刊本《天工开物》尚存人间时极为惊喜,立即致信赵万里分享书讯:“此是极重要的消息,必欲告兄,且也必须设法得到也。”可见,当时他已决定征集此书。

3 动员捐书

看到藏书目录上收录有明刊本《天工开物》,郑振铎当时就设法联系藏书家李氏观看此书,并筹划征集李氏萱荫楼藏书。

郑振铎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1951年5月7日,他在写给同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的信中分享了发现《天工开物》的书讯,并提及已设法联系收藏家:

因到宁波、绍兴一带走了好几天……在宁波,无意中知道李氏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这是很大的消息!可惜找到了关系,且找到了李宅,而重门深锁,主人离去已久,未能亲见此书。闻主人现在上海,正积极的在找关系,想和他谈谈。如能得到此书,则大可为研究“科学史”的人增加了一部重要的史料也。(流行本《天工开物》非原书也)^{[22]457}

郑振铎在信中明确指出明刊原本《天工开物》在研究科学史上的重要史料作用,还提及自己尝试在宁波登萱荫楼观书之事。见到李氏藏书书目之后,他在宁波设法找到了关系,到了萱荫楼李氏家门口,只因当时李庆城在上海,郑振铎在宁波未能登楼观书。对此,他毫不气馁,又多方打听,设法在上海联系李庆城。关于与李庆城联系途径,有不同说法。李庆城《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记事》一文提及是郑振铎请徐森玉帮忙通过秦康祥与自己取得联系。李庆城胞兄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十二卷》一文提及,当时郑振铎通过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长钱铭岐与其联系,请他帮忙联系李庆城,他让李庆城在宁波的管家胡某到上海转告此事。《郑振铎画传》提及郑振铎通过上海的公安部门从数十名同名者中筛选,才找到萱荫楼主人李庆城^[12]。可见,郑振铎一方面设法在宁波找到李

庆城亲属,试图登萱荫楼观书,一方面通过李庆城胞兄李庆坤设法与远在上海的李庆城联系,还托请在上海的好友徐森玉设法联系李庆城,此外还设法通过上海的公安部门寻找李庆城。穷尽一切办法,只为联系到藏书家。

很快,郑振铎便与李庆城取得联系。5月10日,郑振铎致浙江省立图书馆副馆长徐韬的信中便提及李氏愿意捐献全部藏书:

……此事系宁波李氏愿意捐献其全部藏书,藏在浙江图书馆……^[23]

郑振铎与李庆城见面的确切时间暂无相关记录,但从上文5月7日和5月10日两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二人见面及商定捐书的时间应在5月7日至10日之间。据李庆城《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记事》一文记载,郑振铎原计划作价收购李氏萱荫楼藏书;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十二卷》一文也提及郑振铎通过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长钱铭岐与其商谈让其联系李庆城将萱荫楼藏书“转让给国家管理”,可印证李庆城之说。可见,郑振铎原计划是由国家收购萱荫楼藏书,化私为公。

既然郑振铎的计划是国家收购萱荫楼藏书,为什么最后变成了捐献?这一巨大转变还要从萱荫楼第一位主人方矩说起。虽然早在1936年她将萱荫楼交给儿子李庆城管理,移居上海,但萱荫楼藏书的最终决定权仍由方矩掌握。据李定鑫《萱荫楼往事》一文所记,在郑振铎动员后,李庆城夫妇尚有疑虑。方矩得知此事后,力主捐献,因她“早年住在上海法租界,知道郑公的大名,他是位酷爱文物的大学问家,爱国、正直、人品很好,可以完全信赖……当年建萱荫楼的初衷,是要勉励李氏后裔,让藏书世代代传下去。如今,天下太平,国家有能力把图书管得比私人好,理应化私为公,予以配合……自己是浙江人,有故乡情结,想把图书捐到杭州,存放在省城里的图书馆里”^[9]。可见,在民国时期,方矩住在上海法租界时就听闻郑振铎保护文物的事迹,印象深刻。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等人主动向国民政府请愿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收购抢救大批珍贵文献典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动员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私家藏书楼楼主将藏书化私为公,为抢救和保护流散在民间的文献典籍四处奔走。郑振铎保护文献典籍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他已成为保护文献典籍的一

面旗帜,深得藏书家的信任。正是基于对郑振铎的信任,认同郑振铎化私为公的理念,李氏自愿捐献全部藏书。

4 协调接收赠书

得知李氏愿意捐献藏书后,郑振铎根据藏书家的捐书意愿立即着手统筹安排接收藏书等下一步工作。

5月10日,郑振铎致函浙江省立图书馆副馆长徐韬,提及李氏愿意将其全部藏书捐献给该馆,要求该馆安排馆长张宗祥或副馆长徐韬到上海商谈借书藏书事项:

……又有一要事,须请阅声先生或先生来沪一行,决定处理办法……此事系宁波李氏愿意捐献其全部藏书,藏在浙江图书馆,惟其子拟在馆求一职。最好能面商如何接收该项书籍的步骤。此批书中,佳本极多也……^[23]

浙江省立图书馆收到郑振铎的信函后,指派徐韬副馆长赴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以下简称“华东文化部”)与郑振铎商谈此事,浙江省立图书馆向浙江省文教厅汇报李氏萱荫楼藏书过程的材料对此事有记录:

我馆于5月10日接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郑振铎局长自上海来函,谓宁波李氏愿意捐献其全部藏书,藏在浙江图书馆……当于14日请徐副馆长赴沪了解并作商洽。徐副馆长到沪接洽后,于22日返杭^[10]。

商定萱荫楼赠书接收方案后,郑振铎在5月17日晚特意设宴招待捐献图书文物的收藏家李庆城、朱剑心,并请徐森玉、唐弢、徐韬、徐伯郊等作陪。李庆城《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记事》一文中也有相关记载:

“于数日后约我去上海乐义饭店叙谈。在坐的有沙文汉、徐森玉、唐强与朱鼎暄诸先生以及浙江图书馆的一位负责同志,商定图籍移交的具体事宜。”^[2]

商定接收事宜后,郑振铎继续与浙江省文教厅、浙江省立图书馆沟通,要求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李庆城等返回宁波整理、交接图书。5月21日,郑振铎致徐韬函,要求浙江省文教厅或浙江省立图书馆指派熟悉宁波情况的人陪同李庆城赴宁波,并委托其转交致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副厅长俞仲武的信函。

曼略先生:

昨未及畅谈,为歉!李庆城先生捐书事,必须好好的褒扬他才对,这批书十分的重要。附上给刘丹、俞仲武二同志一函,乞转致为感!一切事,并请照顾。如派人陪同前去,文教厅有人可派否?最好派对宁波情形熟悉的人去^[23]。

郑振铎5月21日致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副厅长俞仲武函,提及中央要从李氏所捐图书中提出一小部分善本,要求浙江省文教厅派人护送李庆城回宁波运书,以及后期对捐书者多加关照。

刘丹、仲武厅长:

在杭时,曾奉上一函,想已收到……兹有一事奉恳:宁波李庆城先生藏书极为丰富,史料尤多,经我在沪和他本人面谈,已允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此事极为重要。李先生化私为公和热爱、信任人民政府的精神,极可钦佩!除其中有一小部分善本拟提交中央外,除(余)均运度浙江图书馆。此好消息当为同志们所乐闻也!现李先生拟于本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陪同他母亲返鄞料理此事,华东文化部派专人同去。到杭后,乞加意照料,并予以种种照顾与方便为感!并请派员护送他们到宁波,运书时,并请派人押运到杭为荷。中央对于捐献文物、图书的人,向来极为重视,经常的不忘记他们,也经常的照顾他们。他们信任人民政府,我们也信任他们。不仅藉以鼓励后来的捐献的人也。所有旅运费和其他费用,全部由华东文化部负责,他们当另有公函给贵厅。详情当由徐韬同志面罄^[23]。

根据郑振铎的意见,华东文化部指派郭若愚陪同方矩和李庆城自上海经杭州赴宁波点交所捐献藏书,浙江省立图书馆指派馆员毛春翔、唐贡新二人从杭州陪同方矩等三人自杭州赴宁波接收、提运图书。

26日,萱荫楼主李庆城与其母方氏由华东文化部郭若愚同志陪同,自沪来杭,邀约我馆派员赴甬提运。我们于27日派馆员毛春翔、唐贡新二员与李氏母子及郭同志一同自杭至甬,带去馆藏之抄本《李氏萱荫楼藏书目》上下两册作为点收之根据。在甬点收时,由书主李庆城逐一点交,并亲自在我馆带去之目录上加记符号。各箱点运后,即加贴我馆所备之封签,计236箱,分装卡车三辆,由我馆馆员毛、唐二员押运,于5月31日由甬起程,6月1日上午到杭,存放于我馆孤山总馆红洋房内^[10]。

根据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材料,李氏捐献的萱荫楼藏书于6月1日运至该馆。

5 移提图书

妥善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方矩和李庆城赴宁波办理捐书事宜后,郑振铎开始着手调查、鉴定萱荫楼藏书中《天工开物》等图书的版本。5月31日,郑振铎在写给梁思永信中委托其核查明刊本《天工开物》是否被国民党运到台湾等信息。

《天工开物》尚未取来。闻前东方文化明刊本《天工开物》一部,系陈时文书,不知已否运台,请托人一查。无论如何,此书总是不多见的。日本尊经阁亦有明刊本一部。此间古书不多^{[22]459}。

6月1日,李氏所捐萱荫楼藏书运到杭州。参与此事的华东文化部工作人员郭若愚按郑振铎要求将其中的明版《天工开物》等几种图书送到上海交给他鉴定。鉴定完《天工开物》后,6月5日下午,郑振铎致函华东文化部唐弢副处长,安排下一步工作:

唐弢处长:

顷与郭若愚兄谈过,并看过所带来的书。《周礼》和《斜川集》均是伪本,非宋板,殊失望!然《天工开物》却不坏。有三事须请一办:(一)郭兄须再赴鄞一次,陪同李君母子出来,以全信用。(二)李氏书系捐献给华东文化部者,是否全部拨归浙江图书馆尚是问题,请他们不必立即盖印归库,应静候与捐献者协商解决。

(三)附书单一张,系北京拟提之书,请做一公文给郭兄带杭,交文教所一办^[24]。

在信函中,郑振铎肯定了萱荫楼藏书中《天工开物》的价值,要求浙江省立图书馆暂缓将李氏所捐图书盖章入库,待其与李氏沟通后再做分配,并开出拟划拨北京图书馆的书单,让华东文化部出具公文让郭若愚直接带到杭州。

郑振铎非常尊重藏书家,作为藏书家,他深知聚书之难、散书之痛。因此,为了协调移提图书,他写信给藏书家李庆城,征得他的同意后才安排运书事宜。正是他对藏书家发自内心的尊重,对捐书工作的认真负责,深深打动了藏书家,得到了他们的配合。李定鑫《萱荫楼往事》记录了郑振铎与李庆城沟通提书进京的过程。“郑公办事认真,能将捐献者的要求放在心上。书运到杭州后,父亲即接到郑公来信,说他欲选择善本多种,送京收藏,征询原藏家有何意见,祖母知道后,感到备受尊重,非常愿意接受郑公建议,而

郑公是在接到父亲回函之后,才敦促唐弢去办理这部分善本运京事宜的。”^[9]

经浙江省立图书馆对萱荫楼藏书、书目逐一核对、清点,李氏萱荫楼藏书共2 898种,30 755册^[10]。文化部将其中7种408册划拨北京图书馆,将其余图书拨交浙江省立图书馆。拨交北京图书馆的7种图书包括明崇祯十年(1637年)初刻本《天工开物》10册,抄本《明实录》350册,抄本《诗渊》16册,抄本《[宝庆]四明志》14册,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刻本《[正德]福州府志》10册,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刻本《[嘉靖]冀州志》,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万历]嵊县志》4册。这7种书即上文所说选择善本送京收藏的书,均为明刻本(或抄本),并非一些数据中所说萱荫楼全部宋元善本,更不是萱荫楼全部藏书。

6 协调解决人员安置

郑振铎早在5月10日写给浙江省立图书馆副馆长徐韬的信函中就已提及人员安置工作:

……又有一要事,须请闻声先生或先生来沪一行,决定处理办法。已和华东文化部商定……此事系宁波李氏愿意捐献其全部藏书,藏在浙江图书馆,惟其子拟在馆求一职。最好能面商如何接收该项书籍的步骤……^[23]

他在写给徐韬的信函中提及李氏希望能为其子在浙江省立图书馆谋求一个职位,为此,他要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或副馆长徐韬到上海与他当面商谈此事。浙江省立图书馆按郑振铎要求,指派副馆长徐韬赴上海商洽此事,5月22日返回杭州,“商洽结果,李氏藏书除有数种须移提赴京保存外,余书可由浙馆辟室专藏”^[10]。据骆兆平《萱荫楼献书充公库》记述,李庆城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职^[8]。办理完接收、移提图书等事项后,郑振铎协调人员安置工作。6月11日,他致函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弢,提出将李庆城安置到华东文化部。

唐弢同志:

李庆城先生的履历及自传均已交给你了。他为人诚笃谨慎,历史也简单,对于图书方面也有研究。你曾谈及,文物处方面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他现在已可不到杭州浙江图书馆去,正好为华东文化部添一生力军也。兹特介绍他拜谒,乞赐接见,并予以安置为荷!

敬礼!

弟郑振铎启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22]216-217}

华东文化部按照郑振铎安排,于1951年将李庆城调入华东文化部工作^[9],从而为萱荫楼捐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处系年有误,陈福康在《郑振铎书信出版中的差误》文中已指出该信时间应为1951年^[25],并在《郑振铎年谱》中将该信函内容录于1951年6月11日^[26],可从。1957年,李庆城调入上海图书馆工作。

7 结语

萱荫楼藏书捐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流散在民间的珍贵文献典籍化私为公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在日常考察工作中发现珍贵的明刊本《天工开物》当即决定征集此书,锲而不舍地寻找书主;动员李氏捐书过程中,他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如他致函浙江省立图书馆要求指

派工作人员陪同赴宁波;他重守信诺,当得知李氏母子因故晚回上海后,要求郭若愚返回宁波护送李氏母子返回。此外,他还善始善终,先是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为李庆城觅得职位,后又将其安排在华东文化部工作。

郑振铎动员藏书家捐书依靠的不是他的权威,而是他对古籍的真爱,真正想方设法为国家收购古籍,如他自己所言“书生报国之一道也”^[24]。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屡见私人藏书家藏书流散的惨景,也因甬宋楼藏书流失国外而痛心,组织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沦陷区为国家抢救大批珍贵文献古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初心不改,并考察天一阁、铁琴铜剑楼,动员知名藏书家将藏书化私为公,为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呕心沥血。正是他对古籍的真爱,为国家永久保藏古籍的义举,深深打动了藏书家,得到了他们的配合与支持。也正是仰赖于郑振铎的护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明初刻本《天工开物》等珍贵典籍才得以入藏国家并广为传播,从而确保民族文化绵延不绝。

注释:

- ① 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53年6月更名为浙江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 徐雁,谭华军.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下)[J].图书馆,2003(2):90-93.
- [2] 李庆城.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记事[J].图书馆杂志,1989(3):50-51.
- [3] 袁元龙.萱荫楼与墨海楼[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3):37.
- [4] 袁元龙.明州史话:萱荫楼与墨海楼[N].宁波报,1982-05-16(3).
- [5] 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十二卷[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宁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114-117.
- [6] 俞信芳.萱荫楼主李庆城先生藏书始末[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5(2):51-53.
- [7] 李性忠.萱荫楼及其藏书价值[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9(2):61-62.
- [8] 骆兆平.萱荫楼献书充公库[M]//骆兆平.书城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1-216.
- [9] 李定鑫.萱荫楼往事[M]//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文丛:第十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284-287.
- [10] 李性忠.萱荫楼——民国时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M]//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史海钩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0-41.
- [11] 陈福康.郑振铎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566-567.
- [12] 郑源.郑振铎画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274-275.
- [13] 傅璇琮.宁波通史:5民国卷[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407.
- [14] 邓大鹏.宁波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图书馆志[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81-82.
- [15] 《宁波词典》编委会.宁波词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277.

- [16] 冯晓霞.浙东藏书史[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153.
- [17] 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8:324.
- [18] 吴洪印.湛德丰.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103.
- [19] 潘吉星.天工开物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88:26.
- [20] 李致忠.昌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03-504.
- [21] 郑振铎.求书目录[M]//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534.
- [22]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 16书信[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 [23] 李性忠.郑振铎先生的三封佚信[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5):33-35.
- [24] 郭若愚.落英缤纷——师友忆念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838.
- [25] 陈福康.郑振铎书信出版中的差误[M]//叶再生.出版史研究: 第4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77-90.
- [26]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1479.

作者简介: 蔡成普, 硕士, 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参考咨询、中国图书馆学史。

收稿日期: 2023-02-08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9页)

- [10] 陈爱华.论人工智能的生命伦理悖论及其应对方略[J].医学与哲学,2020,41(13):8-13.
- [11] 张以哲.经济权力: 大数据伦理危机的社会关系根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5-15.
- [12] 林曦,郭苏建.算法不正义与大数据伦理[J].社会科学,2020(8):3-22.
- [13] 刘颖.智慧图书馆中的数据伦理风险识别及利益协调策略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 2021(12):11-15,27.
- [14] 张东华,尹泷杰,卢俊.数据伦理视角下档案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2):97-101.
- [15] 陆康,刘慧,任贝贝,等.基于智慧图书馆数据规范的伦理对策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6):64-70.
- [16] 搜狐网.闪捷信息重磅发布《2021年度数据泄露态势分析报告》[EB/OL].[2021-03-31].http://news.sohu.com/a/534247191_99956189.
- [17] 杨雨娇,袁勤俭.个性化推荐的隐忧: 基于扎根理论的信息茧房及其前因后果探析[J/OL].情报理论与实践:1-14[2023-03-14].<http://gfffg5fce84748f1d4cc2hkf5vbnwxvkwn6b9b.fgy.hlju.cwkeji.cn/kcms/detail/11.1762.G3.20220906.1328.006.html>.
- [18] 陆康,刘慧,杜京容,等.数据治理——我国智慧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机遇[J].图书馆,2022(10):30-34.
- [19] 王家玲.智慧图书馆模式下读者隐私技术保护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7,36(9):82-88.
- [20] 陈庚,郭智嫒.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践、困境及破解思路[J].图书馆,2022(6):1-6,21.
- [21] 王维秋,刘春丽,刘丽萍,等.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失范问题及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J].新世纪图书馆,2020(3):19-23,75.
- [22] 陆康,刘慧,任贝贝,等.智慧图书馆“数据共享”与“数据隐私”的悖论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3):22-27.

作者简介: 单英迪,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运营管理; 赵丽梅,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数据管理与计量分析、图书馆运营管理。

收稿日期: 2022-12-2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 KANO 模型的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

杨 敏

(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 辽宁大连 116025)

摘 要: 文章以对C9联盟高校图书馆进行网络调研为基础,厘清我国高校图书馆当前业务实践中的主要服务项目。运用 KANO模型进行用户需求分析,识别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各服务项目的用户需求强度与服务保障优先级,以此提出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各类型需求下服务项目的服务策略及其相应能力建设路径,为高校图书馆在中断风险情境下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开展和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中断风险; KANO模型; 高校图书馆; 服务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51;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Strateg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ruption Risk Based on the KANO Model

Abstract Based on a network survey of representative university libraries (C9 Alliance),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main service item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The article uses the KANO model to analyze user needs and identify the intensity of their needs and the priority of service assurance for each service item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risk of interruption. The article then proposes service strategies and corresponding capacity-building paths for each type of service item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such a context.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f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interruption risk.

Key words interruption risk; KANO model;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strategy

1 引言

中断风险(Interruption Risk)是指因组织内外部经营条件或运营环境变化,而造成运营停顿或业务不连续的风险。引发中断风险的因素通常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在遭遇如上突发公共事件后,为控制、减轻和消除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严重社会危害,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1-2]。同时,伴随信息

和通讯网络技术在社会系统各领域的深入内嵌,由此衍生的技术性风险、制度性风险、人为不确定性等潜在社会性风险及其所呈现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复杂性、全局性、耦合性等特点,也对组织的风险管理持续运营产生着广泛的潜在冲击。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断风险已成为各类组织面临的重要风险,连续多年进入全球十大风险榜单,并在怡安《2021全球风险调研》和《安联风险指数2021》中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在此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中断风险情境下的服务策略进行研究,厘清高校图书馆业

* 本文系2020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委员会项目“风险管理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韧性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LTB202008)的阶段性成果。

务实践中的主要服务项目,明确中断风险情境下不同服务项目的优先级次序,并探讨中断风险情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策略及相应能力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C9联盟高校图书馆进行网络调研,梳理明确我国高校图书馆当前业务实践中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进一步运用KANO模型对各服务项目进行用户需求分类和优先级排序,识别中断风险情境下不同服务的用户需求强度与保障优先级。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各类型服务项目的服务策略,并提出相应能力建设路径,以期中断风险情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开展和高校图书馆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参考。

2 KANO 模型理论

KANO(卡诺)模型是质量管理控制领域中用户需求分类与优先级排序的常用工具,广泛运用于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需求研究。该模型体现的是产品或服务各项功能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在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绩效性因素,通过分析不同功能的存在性感知对于用户综合满意度带来的总体影响,来识别用户需求类别,并对产品或服务功能进行分级,从而确定功能实现过程的优先级排序^[3-4]。

依据用户对产品或服务不同功能的存在性感知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KANO模型将用户需求分为五类(见图1):①基本型需求,即高存在感-低满意度非线性需求;②期望型需求,即高存在感-高满意度线性需求;③兴奋型需求,即高存在感-高满意度非线性需求;④无差异型需求,即满意度无关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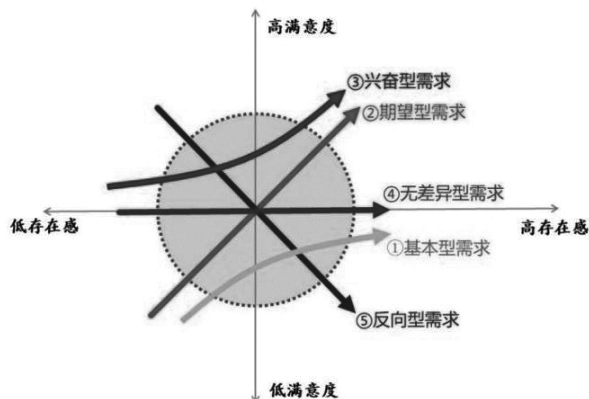


图1 KANO 模型象限图

求;⑤反向型需求,即高存在感-低满意度线性需求,指多数用户并不期待的功能需求,提供后用户满意度反而下降。反向型需求往往是由错误的用户偏好预期引致。

3 C9 联盟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调查

为准确把握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开展情况,为KANO模型运用提供符合当前运行实际的指标集,本文以C9联盟高校图书馆为对象,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对其所开设的服务项目及服务方式进行调研。调研对象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调查时间为2022年1—3月。

通过访问以上图书馆官方网站,查阅栏目设置、业务内容、新闻公告、机构设置、馆舍介绍等内容,并参考各馆馆员近年发表的业务类学术论文,梳理得到现阶段C9联盟高校图书馆所开展服务项目34项。为便于叙述,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5]中高校图书馆任务类型,分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文献信息服务、服务拓展和深化、资源共建共享四个类别进行展示。由于种类繁多,在“文献信息服务”类别中,增设文献借阅、文献获取、文献加工、文献存储4个亚类;在“服务拓展和深化”类别中,增设教学支持服务、科研支持服务、空间服务3个亚类,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3.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图书、期刊、数据库、多媒体等文献信息资源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所有服务的根本性基础,各高校图书馆都进行了着力建设。调查中,所有高校图书馆均根据本校的学科建设规划、教学科研需要以及人才培养特征等,建设了符合自身学科特点和发展水平的图书、期刊、数据库资源、多媒体资源。同时可以看到,尽管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文献库、清华大学图书馆吴冠中艺术数据库、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等特色资源库能够彰显高校独特的学科特色、文化内涵及地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图书馆馆藏的核心价值及其特有的学术积淀和人文底蕴^[6],但并非不可或缺,9所高校图书馆中有7所进行了建设。

3.2 文献信息服务

表 1 C9 联盟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开展情况

服务类别		服务内容	高校名称										
			北京 大学	清华 大学	浙江 大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 大学	南京 大学	复旦 大学	西安交通 大学	哈尔滨 工业大学		
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		图书	√	√	√	√	√	√	√	√	√		
		期刊	√	√	√	√	√	√	√	√	√		
		数据库	√	√	√	√	√	√	√	√	√		
		多媒体资源	√	√	√	√	√	√	√	√	√		
		特色资源	√	√	√		√	√	√	√			
文献 信息 服务		借阅	到馆借阅	√	√	√	√	√	√	√	√		
			阅读推荐	√	√	√			√	√	√	√	
		获取	文献传递	√	√	√	√	√	√	√	√	√	
			馆际互借	√	√	√	√	√	√	√	√	√	
			读者荐购	√	√	√	√	√	√	√	√	√	
		加工	数字加工服务					√					
			复印彩扩服务					√					
			3D 打印服务	√									
		存储	学位论文服务	√	√	√	√	√	√	√	√	√	
服务拓展 和深化		教学 支持 服务	信息素养教学	√	√	√	√	√	√	√	√	√	
			新生教育	√	√	√	√	√	√	√	√	√	√
			培训讲座	√	√	√	√	√	√	√	√	√	√
			微视频教学	√	√	√		√	√		√		
			电子教参平台	√	√			√	√	√	√		
			认证评估支持					√					
		科研 支持 服务	科技查新	√	√	√	√	√	√	√	√	√	√
			查收查引	√	√	√	√	√	√	√	√	√	√
			课题文献服务		√			√	√	√	√	√	√
			情报服务	√	√	√	√	√	√	√	√	√	√
			知识产权服务	√	√	√		√	√	√	√	√	√
			科研数据管理	√	√					√			
			机构知识库	√	√			√			√	√	√
		空间 服务	展陈空间	√	√	√	√	√	√	√	√	√	√
			研讨空间	√	√	√	√	√	√	√	√	√	√
			学习空间	√	√	√	√	√	√	√	√	√	√
			报告厅	√	√	√	√	√	√	√	√	√	√
			体验空间	√	√	√	√	√	√	√	√	√	√
资源共建共享		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	√	√	√	√	√	√	√	√	√		
		开放数据平台	√										

注：“√”表示该高校图书馆开设有此项服务内容。

以文献信息资源为依托，围绕读者对于文献的借阅、获取、加工和存储需求，高校图书馆开展一系列文献信息服务。调查显示：在文献借阅环节，9所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到馆借阅服务，7所高校图书馆还提供阅读推荐信息；在文献获取环节，所有高校图书馆都能提供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和读者荐购服务；在文

献加工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设了数字加工服务和复印彩扩服务，北京大学图书馆开设了3D打印服务；在文献存储环节，所有高校图书馆都提供学位论文服务。

3.3 服务拓展和深化

高校图书馆从教学支持服务、科研支持服务、空

间服务三个方面出发,深化和拓展服务项目,创新服务内容,参与到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中。

(1) 教学支持服务

根据新生入学培训、信息素养提升和资源使用专题讲解等需求,9所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新生教育、信息素养教学和培训讲座。同时,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用户认知行为偏好,6所高校图书馆还开设了微视频教学栏目,围绕文献检索与文献管理、数据分析工具使用、学术写作等主题,以短视频的形式方便读者进行灵活在线学习。此外,还有6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自有电子教参平台,根据学校课程开设的实时数据,向师生提供教材教参服务,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居家教学期间发挥出了极强的文献信息保障和服务支撑作用。在教学信息服务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还面向学科战略建设和本科教学评估需求,开设了专业认证支持和教学评估支持服务,为各类认证评估工作提供馆藏资源、相关学科师生借阅和资源使用数据以及其他可得数据。

(2) 科研支持服务

在科研支持上,9所高校图书馆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丰富信息资源、现代化检索手段和高素质馆员队伍,开展了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和情报服务。5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了课题文献服务。5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机构知识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8所高校图书馆成功获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开设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项目,为知识创新活动提供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和保护等支持服务。此外,基于图书馆员的专业化信息组织能力,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还开展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对科研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文档、资料等给予数据规范化建议并提供数据的整理、分类、归档等服务,推动科学数据规范管理,促进科研数据开放共享。

(3) 空间服务

此次调查中,9所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展陈空间、研讨空间、学习空间、多功能学术报告厅等服务项目,保障了师生读者对于主题展览、团体研讨、开放式学习以及大型会议、学术讲座、专题报告等各类活动的空间需求。同时,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深入推进,高校图书馆的空间智慧化程度也得到了快速

提升。调研发现,6所高校图书馆开设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新型体验空间。有的通过提供专业的解码、音响、放映等影音设备,为读者打造高品质视听体验空间,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和声厅、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音乐馆和音乐研讨间。有的运用特定文化元素进行空间设计,并融入现代化效果设备营造文化氛围,为读者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南洋书斋。有的配备了高性能服务器和专业器材,为读者提供综合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提升的实践场所,如浙江大学的系统体验空间。有的关注于呵护读者心理健康,以心理沙盘、减压音乐椅、催眠摇摆钟视频、眩晕视频等软硬件设施,为读者打造舒缓压力、释放情绪的沉浸式环境空间,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的解压体验室。这些空间服务项目的开设,进一步创新了高校图书馆的空间服务,拓展了空间功能,丰富了用户体验,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了良好的文化育人空间。

3.4 共建共享服务

在服务于本校师生的同时,高校图书馆还积极发挥信息资源和专业服务优势,参与到资源共建共享和馆际协作中去。调查中,9所高校图书馆都参与了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以及所在省份或地区的高校数字图书馆等项目建设,推动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为联盟高校学术创新和地区经济及科技发展提供信息服务支撑。此外,北京大学还开设了开放数据平台,面向国内外学者和科研机构收录优质科研数据,提供数据的管理、发布和存储服务,促进研究数据的传播、重用和规范引用。

4 基于 KANO 模型的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分析

在此基础上,运用KANO模型和Better-Worse系数分析法,对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进行用户需求分类以及用户满意度敏感性分析,用以识别中断风险情境下各项服务的用户需求强度与保障优先级,为后续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

4.1 问卷调查

对以上34个指标,依照KANO问卷形式^[3]设计调查问卷,逐一设计“提供”“不提供”正反问题,每个问题提供“非常喜欢”“理应如此”“无所谓”“不满意”“无法忍受”五种选项,以了解用户对于各项服务提供和不提供时的内心感受和满意度情况。

问卷调查于2022年10月22日至25日期间,采用校园内随机线下发放纸质问卷的形式,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42份。剔除答题不完全以及正反问题答案自相矛盾的问卷23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19份,有效率90.50%。调研对象中,男性103人(47.03%)、女性116人(52.97%);本科生114人(52.05%)、硕士生71人(32.42%)、博士生13人(5.94%)、教职工21人(9.59%)。样本特征与调研高校实际构成情况基本相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利用软件SPSS25.0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在信度上,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 值为0.799,其中,正向问卷Cronbach's α 值为0.880,反向问卷Cronbach's α 值为0.727,均大于0.7,具有较高信度^[7]。在效度上,问卷整体的KMO值为0.827,正向问卷、反向问卷KMO值分别为0.867和0.696, Bartlett球形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p < 0.001$),解释总方差为整体问卷65.150%、正向问卷69.719%、反向问卷64.418%,符合效度检验要求。

4.2 KANO 需求属性分析

根据KANO模型识别步骤^[8],将问卷结果按照KANO评价分类对照表(见表2)进行对照处理。汇总整理后,以频数最高的需求属性判定其所属KANO需求类型,高校图书馆各服务项目的用户需求KANO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表2 KANO 评价分类对照表

不提供 提供	非常 喜欢	理应如此	无所谓	不满意	无法 忍受
非常喜欢	Q	A	A	A	O
理应如此	R	I	I	I	M
无所谓	R	I	I	I	M
不满意	R	I	I	I	M
无法忍受	R	R	R	R	Q

注:A代表兴奋型需求;O代表期望型需求;M代表基本型需求;I代表无差异型需求;R代表反向型需求;Q代表有问题答案。

可见,属于兴奋型需求的有4、18、26、32;无差异型需求的有5、7、9、11、12、13、20、23、27、33、34;属于期望型需求的有10、15、17、19、24、25、28;属于基本型需求的有1、2、3、6、8、14、16、21、22、29、30、31。

4.3 Better-Worse 满意度敏感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各服务项目提供与否对用户满意度影响的显著程度,本研究运用Better-Worse系数分析法^[4]进行满意度敏感性分析。该方法以Better系数表征某项需求在得到满足后带来的用户满意度提升程度,以Worse系数表征某项需求在得不到满足后带来的用户满意度下降程度。算法如下:

$$\text{Better} = \frac{A+O}{A+O+M+I}$$

$$\text{Worse} = (-1) \times \frac{O+M}{A+O+M+I}$$

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绝对值的数值范围属于[0,1]。当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绝对值越接近于1,表示该项需求满足与否所能引起的用户满意度变化越剧烈;反之,当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绝对值越接近于0,表示该项需求的满足与否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越轻微。

根据表3中KANO模型处理结果,计算得出各服务项目的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如表4所示。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高校图书馆各服务项目的用户满意度敏感性分布,以Better值为横轴,以Worse值的绝对值为纵轴,利用Excel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并取所有服务项目Better值和Worse绝对值的平均值(0.427 40, 0.499 97)为坐标原点,绘制用户满意度敏感性分布四象限图(见图2)。

4.4 汇总分析

可知,在Better-Worse满意度敏感性分布四象限图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服务项目有9项,分别是:读者荐购、信息素养教学、培训讲座、微视频教学、电子教参平台、情报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展陈空间、研讨空间。第一象限的数据特征是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绝对值都高于均值。这意味着以上服务的提供与否,对于用户满意度的提升以及引起用户不满意程度的加剧都非常明显。若提供此类服务项目,用户满意度将会大幅提升,用户不满意程度也会显著降低;反之,若取消,则会引起用户满意度的大幅下降,同时不满

表 3 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 Kano 属性分布

序号	服务项目	A	O	M	I	R	合计	需求类型
1	图书	13	61	108	37	0	219	M
2	期刊	12	71	112	24	0	219	M
3	数据库	47	52	103	17	0	219	M
4	多媒体资源	69	37	49	64	0	219	A
5	特色资源	84	19	17	96	3	219	I
6	到馆借阅	7	11	144	57	0	219	M
7	阅读推荐	52	32	28	93	14	219	I
8	文献传递	23	81	104	11	0	219	M
9	馆际互借	41	56	35	87	0	219	I
10	读者荐购	26	98	47	48	0	219	O
11	数字加工服务	84	23	5	98	9	219	I
12	复印彩扩服务	12	4	7	147	49	219	I
13	3D 打印服务	18	6	3	150	42	219	I
14	学位论文服务	22	15	165	17	0	219	M
15	信息素养教学	46	94	52	27	0	219	O
16	新生教育	49	37	64	58	11	219	M
17	培训讲座	34	102	57	26	0	219	O
18	微视频教学	97	46	53	23	0	219	A
19	电子教参平台	63	82	46	28	0	219	O
20	认证评估支持	42	28	12	137	0	219	I
21	科技查新	11	94	97	17	0	219	M
22	查收查引	27	78	104	10	0	219	M
23	课题文献服务	36	29	34	120	0	219	I
24	情报服务	45	71	37	66	0	219	O
25	知识产权服务	62	87	31	39	0	219	O
26	科研数据管理	73	69	16	61	0	219	A
27	机构知识库	29	14	26	137	13	219	I
28	展陈空间	29	96	56	38	0	219	O
29	研讨空间	48	65	89	17	0	219	M
30	学习空间	51	53	112	3	0	219	M
31	报告厅	39	42	94	44	0	219	M
32	体验空间	87	25	19	84	4	219	A
33	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	27	16	25	151	0	219	I
34	开放数据平台	35	17	41	126	0	219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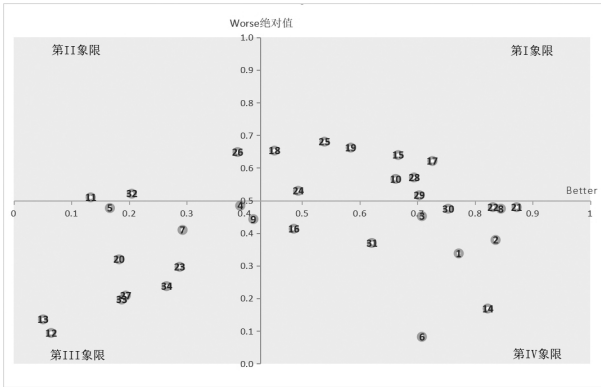


图 2 Better–Worse 满意度敏感性分布四象限图

意程度也将明显上升。结合KANO需求类型来看,除原先运用KANO模型识别出的读者荐购、信息素养教学、培训讲座、电子教参平台、情报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展陈空间7项期望型需求之外,兴奋型需求微视频教学、基本型需求研讨空间也落入了第一象限,表明这两项服务的提供对高校图书馆用户来说也是至关重要,需要予以重点保障。

位于第二象限的服务项目有3项,分别是:数字加工服务、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第二象限的数据特征是Better系数较低,但是Worse系数绝对值较高。

表4 Better-Worse 满意度敏感性分析

序号	服务项目	Better 系数	Worse 系数
1	图书	0.337 9	-0.771 7
2	期刊	0.379 0	-0.835 6
3	数据库	0.452 1	-0.707 8
4	多媒体资源	0.484 0	-0.392 7
5	特色资源	0.476 9	-0.166 7
6	到馆借阅	0.082 2	-0.707 8
7	阅读推荐	0.409 8	-0.292 7
8	文献传递	0.474 9	-0.844 7
9	馆际互借	0.442 9	-0.415 5
10	读者荐购	0.566 2	-0.662 1
11	数字加工服务	0.509 5	-0.133 3
12	复印彩扩服务	0.094 1	-0.064 7
13	3D 打印服务	0.135 6	-0.050 8
14	学位论文服务	0.168 9	-0.821 9
15	信息素养教学	0.639 3	-0.666 7
16	新生教育	0.413 5	-0.485 6
17	培训讲座	0.621 0	-0.726 0
18	微视频教学	0.653 0	-0.452 1
19	电子教参平台	0.662 1	-0.584 5
20	认证评估支持	0.319 6	-0.182 6
21	科技查新	0.479 5	-0.872 1
22	查收查引	0.479 5	-0.831 1
23	课题文献服务	0.296 8	-0.287 7
24	情报服务	0.529 7	-0.493 2
25	知识产权服务	0.680 4	-0.538 8
26	科研数据管理	0.648 4	-0.388 1
27	机构知识库	0.208 7	-0.194 2
28	展陈空间	0.570 8	-0.694 1
29	研讨空间	0.516 0	-0.703 2
30	学习空间	0.474 9	-0.753 4
31	报告厅	0.369 9	-0.621 0
32	体验空间	0.520 9	-0.204 7
33	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	0.196 3	-0.187 2
34	开放数据平台	0.237 4	-0.264 8

这意味着提供以上服务项目对于用户满意度提升上效果有限,如若取消会引起用户不满程度的较快增加。结合KANO需求类型识别结果,数字加工服务属于无差异型需求,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属于兴奋型需求。这表明,在11项无差异型需求中,数字加工服务的取消会更明显地引致用户不满意程度的加深;在4项兴奋型需求中,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的保障优先级高于多媒体资源,但低于微视频教学。

位于第三象限的服务项目有11项,分别是:多媒

体资源、特色资源、阅读推荐、馆际互借、复印彩扩服务、3D打印服务、认证评估支持、课题文献服务、机构知识库、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开放数据平台。第三象限的数据特征是Better系数和Worse系数绝对值都低于均值。这意味着以上服务的提供与否,在对用户满意度提升和不满意程度降低两个方面造成的影响都相对较小。结合KANO需求类型判定结果,11项服务中仅有多媒体资源为兴奋型需求,其余皆属于无差异型需求。这表明,在4项兴奋型需求中,多媒体资源的服务优先级低于其他;在11项无差异型需求中,在第三象限的10项服务优先级相对较低。

位于第四象限的服务项目有11项,分别是:图书、期刊、数据库、到馆借阅、文献传递、学位论文服务、新生教育、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学习空间、报告厅。第四象限的数据特征是Better系数较高,而Worse系数绝对值较低。这意味着提供以上服务项目,在提升用户满意度上效果明显,但在消除用户的不满意程度上作用有限。结合KANO需求类型识别结果,这11项服务都属于基本型需求,是高校图书馆用户最为重视的需求,属于必备性功能,不可或缺。

5 中断风险情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策略及能力建设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之一,高校图书馆不可避免地面临由图书出版发行商、数据服务商、网络技术服务商、物流承运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运营停顿而带来的供给性中断风险。在遭遇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后,处于中断风险情境下,受突发事件和环境变化影响,高校图书馆面临着业务运转所需的人员、物资、场所等资源供给受到不同程度制约,并呈现到馆率降低、现场服务减少、网络服务需求激增等变化。面对非常规、突发性的中断风险,高校图书馆要积极转变思路,将突发性风险下的应急思维转化为组织能力的常态化建设,明晰风险情境下的服务保障范围和优先级,在组织架构与常态化建设方面调整优化,加强风险综合应对能力。

5.1 基本型需求服务策略及能力建设

基本型需求服务项目是高校图书馆的核心功能,当此类功能不具备时,师生读者的满意度会急速下降。在该类型服务项目上一旦发生疏忽,师生读者基

本的教学、科研和学习需要将无法满足,用户满意度急剧下降,投诉和抱怨随之即来。同时又由于基本型需求的保健性属性更强,即使这部分功能得到继续优化,用户满意度也不会因此而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KANO需求属性分析和Better-Worse用户满意度敏感性分析结果,基本型需求服务项目中的图书、期刊、数据库、到馆借阅、文献传递、学位论文服务、新生教育、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学习空间、报告厅都处于第四象限,涉及文献信息资源、文献信息服务、教学支持服务、科研支持服务、空间服务等多个方面,被认为是高校图书馆理所应当提供的服务,这部分服务项目的保障对于用户满意度提升有着显著的推进作用。因此,在中断风险情境下,对于以上服务项目,高校图书馆应当做到基本型需求保障不缺位,迅速切换工作模式,集中可调动资源、快速布局,全力以赴地维持这些业务的稳定运行,保障师生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秩序。同时,由于基本型需求中的研讨空间位于四象限图中的第一象限,相比之下兼具更高的用户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影响力,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为此,高校图书馆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主动构筑动荡环境下迅速恢复关键服务的能力。一方面,运用移动通信和数字化技术,积极打造资源和服务的多元化服务布局。以电子资源为核心,建立起多平台、多载体、多类型、多服务互相支撑、互为补充的文献资源和服务体系,确保用户能以多种方式获取资源和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和保持行业相关主体间的良好协作关系,构建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风险抗御体系。与文献资源出版商、服务商以及图书馆联盟、行业学协会、区域协作组密切保持多样化的合作关系,践行合作共享理念,为风险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知识、经验的共享与联动构筑协作网络,强化动荡环境下的风险应对能力。

5.2 期望型需求服务策略及能力建设

期望型需求服务项目是高校图书馆用户非常希望被满足的功能需求。这部分需求被满足地越好,师生用户的满意度会持续提升;反之,若该类需求未被满足或表现不好,师生用户的不满也会不断加深。

综合KANO需求属性分析和Better-Worse用户满意度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读者荐购、信息素养教学、培训讲座、电子教参平台、情报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展陈空间这7项期望型需求服务项目全部处于四象限

图中的第一象限,也从用户满意度敏感性的角度出发,再次印证了以上服务项目在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中断风险情境下,对于这些服务项目,高校图书馆要做到期望型需求保障要到位,努力克服突发事件和不利因素的影响,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采取务实举措灵活调度,发挥好高校图书馆对于师生读者教学、科研、学习的支持和保障作用,高质量地做好期望型需求服务项目保障工作。

为更好地保障期望型需求服务项目在风险情境下的不间断供给,高校图书馆可从组织结构架设和资源冗余性建设两方面入手,增强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抗干扰能力和突发事件下的应对能力。高校图书馆可通过有效授权及相应监督,从组织结构架设和业务流程设计上,建立具备一定松散度的组织形态。适度放权赋能基层馆员,提高业务运转的灵活性,为释放馆员潜能、高效回应环境扰动所造成的冲击提供有利条件,提升风险状态下的自适应调整能力。在资源冗余性建设方面,按照适度宽松的原则,配置和保有规模适宜的风险应对资源。建立财务预算、人力配备、物资储存和空间使用风险储备体系,在风险暴露领域前瞻性地布局备用平台、备份计划和替代方案,确保中断风险情境下灵活制订风险响应决策与保障必要服务的调配及使用需求。

5.3 兴奋型需求服务策略及能力建设

兴奋型需求服务项目是高校图书馆为精进服务、提升价值而提供的超出用户预期的加分项服务项目。当具备此类功能时,用户满意度急剧提升,即使表现并不完善,用户满意状况也会改善;而当不具备此功能属性时,用户满意度也不会降低,不会因此感到不满。

在多媒体资源、微视频教学、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这4项兴奋性需求服务项目中,微视频教学处于第一象限,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处于第二象限,多媒体资源处于第三象限。这表明,在促进用户满意度提升方面,微视频教学服务项目效果更加明显,而在改善用户不满意程度方面,科研数据管理、体验空间作用更加突出,多媒体资源对用户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的改变都不明显。因此,在中断风险情境下,对于兴奋型需求服务项目,高校图书馆可综合考量引发中断风险的突发事件类型、应急响应级别、政策要求、资源调度、业务运行等现实因素,做出综合研判。在满足服务开展条件的情况下,继续以新颖便

捷的优质服务丰富用户体验,促进压力缓解,疏导应激心理障碍,减少突发事件和环境改变对师生用户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不具备开展条件,亦可根据服务供给的优先级次序采取暂停或延期措施,并不会对高校图书馆用户满意程度造成实质性影响。

这对风险情境下的领导决策力和馆员队伍的执行力及团队协作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断风险情境下,领导层对于环境变化的警觉性、突发状况下的反应速度、决策判断的准确性以及坚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能力等,是高校图书馆迅速响应突发状况、组织回应不确定性风险冲击的必要前置条件,是风险应对策略制订和组织实施的关键。同时,馆员队伍对于危机和风险的认知与应对能力、风险状况下对上级决策的理解程度和认同性、危机环境下的自身适应性及快速处置能力、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互之间的团队意识和协作意识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风险状态下响应策略的执行效率和落实效果。高校图书馆应将风险意识和韧性意识培养内容,融入日常业务运行与组织文化建设中予以培育发展,增强整体馆员队伍的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

5.4 无差异型需求服务策略及能力建设

无差异型需求服务项目是用户完全不在意的功能属性,此类功能的具备与否对用户满意度和用户不满意程度的改变不产生影响。

在此次调查中,属于无差异需求的11项服务项目在服务优先级上分为两类,特色资源、阅读推荐、馆际互借、复印彩扩服务、3D打印服务、认证评估支持、课题文献服务、机构知识库、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开放数据平台位于第三象限,数字加工服务位于第二象限,相对而言对于用户不满意程度的改善或加剧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当高校图书馆处于中断风险情境下,因内外条件所限,确已无法保证业务全面运行时,为缓解突发事件和内外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人

员、物资、设备、工具等资源紧张,对于以上服务项目可根据优先级排序,采取暂停或适度延期的服务策略,以释放有限资源,集中力量确保核心服务的持续运行。

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图书馆需要在短时间内适应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通过对服务项目和业务模式的动态重构,快速恢复关键功能与核心服务的稳态运行^[9]。因此,对于无差异型需求服务项目暂停或延期后所释放的人力、空间、设备和物资等资源,高校图书馆可预先以应急预案编制等形式,规划充实到服务优先级更高的业务保障中去。同时在日常工作中,通过轮岗交流与跨部门合作等方式,培育馆员队伍的多岗位工作适应能力,在组织文化中营造积极乐变、鼓励创新的氛围,为中断风险情境下的业务流程动态重构和灵活实施共享用工模式等创造良好条件,最大限度地中断风险情境下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学习需求提供保障。

6 结语

本研究对代表性C9联盟高校图书馆开展网络调研,厘清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当前业务实践中的主要服务项目。并运用KANO模型进行用户需求分析,识别用户需求强度及服务保障优先级,探讨中断风险情境下的高校图书馆各类型用户需求服务策略及相应能力建设路径,有助于高校图书馆针对性开展中断风险情境下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相关工作。但对于问卷指标中的服务项目,问卷调研的高校并非全部开设,特别是如3D打印、体验空间等新颖服务。尽管在问卷中对本校未开设服务的内容和形式给予了简要说明,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性偏差。同时,由于问卷调研高校为财经类院校,学科专业上以经济、管理类为主,不同专业对于高校图书馆服务项目的需求差异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Z].2007-8-30.
- [2] 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Z].2005-4-17.
- [3] KANON,SERAKUN,TAKAHASHI,et al.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J].Journal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1984,14(2):147-156.

(下转第54页)

· 探索与创新 ·

公共图书馆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初级实践应用及效果评价*

曾 舜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广东深圳 518172)

摘 要: 文章基于用户借阅数据构建了图书馆用户群体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深层次挖掘用户的借阅习惯及潜在的行为规律,为公共图书馆基于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进行图书馆阅读推广、馆藏建设、空间布局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以公共图书馆为服务主体,基于五年跨度的用户借阅数据对用户借阅行为进行细化和分类,利用聚类分析构建不同用户类别的分类标签,深入挖掘用户的行为属性,依据借阅倾向进行关联挖掘,实现群体用户画像的精准刻画,从而实现基于用户借阅行为及倾向指导书籍推荐、活动推广、馆藏建设、书架的空间布局等,以期实现未来从初级应用推进至对用户的精准服务应用。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用户借阅数据; 群体用户画像; 初级应用; 资源画像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Primary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User Portrait and Resource Portrait in Public Librar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der borrowing data, this paper constructs user portrait and resource portrait of the library reader group, deeply excavates the readers' borrowing habits and potential behavior laws, and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public library's reading promotion,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layout based on the user portrait and resource portrait. Taking the public library as the service subject, the borrowing behavior of readers is refined and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borrowing data of readers over a five-year spa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labels of different reader categories are constructed by cluster analysis to deeply mine the behavior attributes of readers, and association mining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borrowing tendency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group user portraits. So as to guide book recommendation, activity promotion,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bookshelves based on readers' borrowing behavior and tendenc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e, it has begun to take effec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it is gradually promoted from primary application to accurate service application for readers and user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ies; readers borrowing data; group user portrait; primary application; resource portrait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领域全方位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日渐感受到新兴科学技术的多元化、精准化、个性化,各大购物APP已经通过算法实现对用户的精准推送。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遭受

到巨大的挑战,图书馆丰富的数字资源、文献资源、活动资源与用户的精准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正是图书馆迈向精准服务的第一步,基于庞大的用户数据,图书馆需了解到目前各个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用户的需求是

* 本文系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20—2021年度深圳市图书情报科研课题优秀课题项目“用户画像体系下公共图书馆精准化服务研究”(项目编号: 2020311)的成果之一。

无限的,要从现阶段客观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来切实提供相应高度的服务。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指导图书馆建设的相关决策,逐渐实现从匹配大部分用户的需求到进一步满足各种精细分类标签的用户需求,再到精准服务至个体用户的飞跃。

1 图书馆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研究现状

1.1 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现状

国内在2014年开始研究用户画像,2015—2017年学术研究较少,从2018年开始,图书馆界有关用户画像的学术文献迅速增加^[1],主要围绕五大方面进行研究,分别是用户画像的模型构建、算法与技术、用户兴趣研究、精准推广服务以及情景化服务。

在用户画像模型构建方面,许鹏程等人针对数字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内涵及特征进行剖析,分析用户画像的数据来源及采集处理过程,提出数据驱动下用户画像数据化→标签化→关联化→可视化的驱动主路线,从自然维度、兴趣维度、社交维度,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化的用户画像模型^[2];陈丹等人提出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智慧服务模型框架,应用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分析和挖掘用户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以用户画像关联用户和资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智慧服务^[3]。

在算法与技术方面,目前研究最多的是聚类分析与机器学习,陈丹等人采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用户画像,实现用户和资源的精准匹配,提供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服务^[4];李晓敏等人从构建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的自然属性、兴趣属性、社交属性三个数据维度出发,借助相似度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不同维度用户和图书的相似度,实现基于相似用户和相似图书的虚拟图书推荐^[5]。

在用户兴趣研究方面,王顺箐提出将用户的需求兴趣融入到图书馆智慧推荐系统中,准确把握用户的个性化偏好与动态需求,提高推荐系统服务的精准化^[6];李宝从用户基本属性、阅读状态、学习风格、阅读偏好四个维度构建用户多维画像模型,并提出基于冷启动和用户阅读学习过程画像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策略^[7]。

在精准推广服务方面,李业根从用户画像角度分析了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信息营销策略^[8];肖海清等

人通过对参与式用户画像的构建,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实现针对不同用户(个体用户和群体用户)的阅读资源的精准推荐^[9]。

在情景化服务方面,刘海鸥等人提出通过对海量的移动图书馆数据资源进行挖掘、重组和深度融合,提出构建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移动图书馆情境化推荐系统^[10];解娜通过情景化推荐算法,根据用户偏好将周边好书推荐给用户,为用户提供全新的图书资源搜索服务方式^[11]。

从近几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图书情报领域的用户画像研究在理论上取得较快的发展,各个方面的研究不论深浅都有所涉及,但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操作研究却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除了局限于现阶段客观条件难以实现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大部分研究学者的研究目标直接定位到最终目标——即实现精确到具体用户的服务推荐,中间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何在现阶段条件下,寻找合适的路径,克服困难,将用户画像切实应用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图书馆,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问题。

1.2 图书馆资源画像研究现状

与用户画像研究相比,目前国内关于资源画像的研究成果较少。资源画像所描述的是实体图书资源与数字图书资源的基本信息、类型、热度等数据信息,在用户画像实际应用中需结合资源画像对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例如,王庆等人通过构建用户和图书资源画像模型搭建了图书馆大数据平台,将之应用于图书馆精细化用户服务领域^[12]。徐海玲等人利用资源聚合的原理,通过借鉴领域本体的方法,对数据的深层次挖掘,构建了基于资源画像的社交媒体内部资源聚合模型和外部资源聚合模型^[13]。刘芳等人探索了资源画像和用户画像的构建步骤,并分析了画像的具体表现方式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从而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用户个性化服务提供数据决策支撑^[14]。刘海鸥等人将用户画像方法引用到移动图书馆的推荐系统中,基于用户画像的思想对移动图书馆的用户和图书资源构建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接着从维度、层次和路径三个方面对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的融合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画像情境化融合在移动图书馆推荐系统中的应用^[15]。

通过对相关文献分析可以得出,现阶段对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融合应用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大多学

者主要关注如何构建和使用用户画像,而关于资源画像的研究则很少,忽略了实际应用中资源画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鉴于此,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五年跨度的用户借阅数据,根据聚类算法汇聚中心标签形成聚类中心,计算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各类标签和中心标签的相关度,聚合关联性最大的标签,构建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从而指导图书馆作出阅读推广、馆藏建设等相关决策。

2 图书馆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数据分析

2.1 数据获取

本文依据深圳图书馆之城系统,以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为主要数据源,获取用户的基本信息、借阅数据及馆藏数据,时间为2015—2019年,其中借阅数据为4 774 268条,数据信息包括用户证号和姓名(为保护隐私统一作代码转换处理)、用户证类型、性别、年龄、办证时间、借阅时间、借阅书籍条码、书名、索书号等信息;馆藏数据为2 660 047条,数据信息包括书籍条码、索书号、馆藏地址、书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日期、入藏日期、价格等信息。将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的两个唯一值——书籍条码相匹配,建立融合数据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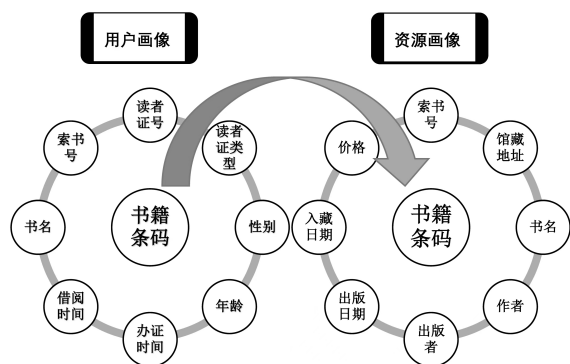


图1 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融合数据图

2.2 基于融合数据的模型构建

根据融合数据库的数据,可将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同步分析,首先将用户画像分为借阅兴趣倾向、用户流失概率两类标签模型,其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标签模型,如借阅兴趣倾向包含用户的年龄、性别、借阅书籍的索书号,根据模型标签内容分类,年龄标签可分为少儿用户、青年用户、成年用户及中老年用户;

性别可分为男用户、女用户;索书号即表示所借书籍的类别;通过借阅时间和办证时间可得知所有用户的借阅次数及活跃度,从而预测用户对图书馆的粘性以及其流失概率等,依据以上两类标签模型可绘制出初步用户画像。其次将资源画像匹配用户画像同样分为借阅兴趣倾向、用户流失概率两类标签模型,其中借阅兴趣倾向包含书籍的作者、出版者、索书号、出版日期,作者和出版者都可分为热门和高产标签;索书号同样表示书籍的类别;出版日期表示书籍是新出版书籍还是旧版书籍;馆藏地址表示该书的地理位置,是属于馆分还是分馆,可匹配用户画像的借阅次数及活跃度预测总馆与分馆在用户粘性上产生的不同效果。得出的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标签能够使得用户的特点清晰,从标签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能够快速了解用户的需求,再而根据用户需求作出各项服务及馆藏建设决策(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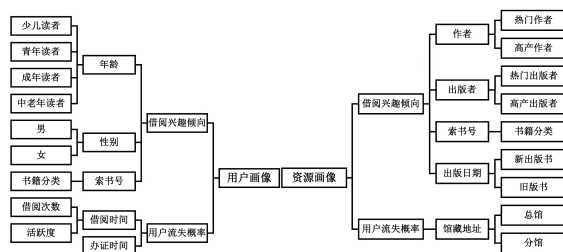


图2 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模型构建图

2.3 数据分析方法

对用户借阅兴趣与馆藏受众分析时发现其数据较复杂且数据维度较多,而且并无明确的可指导分类的规则,在此本文采用无监督算法——聚类分析对用户借阅兴趣和馆藏受众进行分类分析。聚类分析是能将样本数据,在没有“先验知识”的前提下,根据数据的诸多特征,按照其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进行自动分组,且使组内部个体的结构特征具有较大相似性,组之间个体的特征相似性较小。并且可以将有多个维度属性的数据进行无指导条件下的分组,其是由数据出发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指定分组标准,并确保同一组内的数据特征是相似的,而使不同组之间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别。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用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同时也利于真正表现出数据自身的特征,无个人的主观干扰。与此同时,由于聚类分析的结果中包含数据间的关联组合,可以更有效解释数据的关联关系,因此本文不再对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除聚类分析外,还对所有的数据(含聚类结果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通过对比不同年份的各个数值,以发现数据中的规律以及各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达到指导应用以及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作用。

3 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3.1 指导阅读宣传

3.1.1 基于用户画像借阅排行榜的实际应用

开展阅读推广相关举措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职能,同时也是提高馆藏利用率的重要措施。传统的阅读推广服务一般都采用固定的模式,针对性不强,在现代科技智能化发展迅速的大环境下,已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把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应用到阅读推广中,可以有效地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好的推广效果。在具体应用方面,国内现阶段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袁军提出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用户画像技术,根据其知识背景、阅读特点、阅读习惯、阅读历史等,把用户分成不同的群体类型,将具有相同阅读倾向和阅读兴趣的用户归为一类,使宣传、推送内容与用户需求相匹配,为用户量身打造个性化的阅读书目,针对不同用户群进行新书推荐^[16];李雅提出图书馆通过分析聚类的标签,对标签进行层次分析,全面、多层次地进行用户画像的描述,实时更新和分析用户的动态信息并建立用户群,再对用户群进行群体推广^[17]。

用户借阅排行榜为用户画像中群体借阅行为的体现,在实际应用中,为新办证用户提供首次借阅指导是切实可行的方法。新用户首次借阅的门槛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图书馆有哪些适合自己的资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哪些资源。而通过用户画像基本模型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仅通过最基本的年龄、性别信息即可向其推荐该标签下常借阅的馆藏类别,可以有效地降低新用户进入图书馆大门的门槛。

本文利用2018年至2021年每年的用户借阅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我馆所面向的用户群体的借阅倾向。通过年龄和性别筛选出10个群体,分别为0—13岁的男童、女童,14—21岁的少男、少女,22—45岁的男青年、女青年,46岁及以上的男中老年、女中老年及单独设立的家长群体。每个书单从排行榜前50的热门书籍中选择30本书籍,由于数据过多,本文筛选

出2020—2021年女童的推荐书单进行呈现,(见表1)。

表1 2020—2021年女童首次借阅指导书单数据统计表

序号	馆藏书名	2020年 借阅数 /本	2021年 借阅数 /本	2021年推 荐书目增 长数	增长 幅度 /%
1	傻瓜伊万	20	32	12	60.0
2	莎娜公主	26	29	3	11.5
3	骑士与海洋公主	18	23	5	27.8
4	臭臭蓉蓉的小世界幽默 成长日记	37	48	11	29.7
5	公主病	70	58	-12	-17.1
6	芬芳童话	20	23	3	15.0
7	糖果屋最后的夏天	15	8	-7	-46.7
8	童心城堡	30	41	11	36.7
9	女生苏丹	34	21	-13	-38.2
10	班长小大人	33	67	34	103.0
11	魔法通天塔	16	36	20	125.0
12	可爱多少钱一斤	31	48	17	54.8
13	敲门小熊	18	62	44	244.4
14	吉娜的奇妙音乐会	24	67	43	179.2
15	腹语师的女儿	11	17	6	54.5
16	小鹿斑比	81	151	70	86.4
17	小王子	174	397	223	128.2
18	小叮当奇幻国	42	69	27	64.3
19	美女与野兽	92	170	78	84.8
20	366个睡前故事	63	123	60	95.2
21	爱丽丝梦游仙境	40	96	56	140.0
22	小海蒂	13	34	21	161.5
23	淘气包日记	39	41	2	5.1
24	魔法少女的秘密心事	19	15	-4	-21.1
25	胡桃木小姐	27	53	26	96.3
26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67	134	67	100.0
27	10分钟编绳手链	16	9	-7	-43.8
28	小牛顿科学全知道	69	97	28	40.6
29	大英儿童百科全书	14	42	28	200.0
30	谁生气了	37	145	108	291.9
平均值		39.9	71.9	32	80.3

3.1.2 新用户阅读推广的效果评价

我们对用户群体的10个聚类标签的首次借阅书单数据进行了统计(见表2)。从表2中可见,近几年的用户群体是由家长及少儿占主导地位,占据了我馆大部分的借阅量;首次借阅推荐对家长及少儿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青老年的影响。可见现阶段公共图书馆所面对的用户是很多借阅目的性不强的群体,他们首次来到图书馆并不是冲着借某本书或者某一类书而来的,这样的用户群体就更加需要图书馆专业人士的借阅

表2 首次借阅指导书单数据统计表

聚类标签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推荐书目 平均借阅数	增长数	增长幅度 /%	推荐书目 平均借阅数	增长数	增长幅度 /%	推荐书目 平均借阅数	增长数	增长幅度 /%
女童	77.2	39.5	104.8	44.9	13.7	44.1	71.9	32	80.3
男童	85.1	45.1	150.0	61	19.1	77.0	107.4	53.6	111.2
少女	38.2	11.4	47.3	48.7	10.6	25.7	62.9	19.7	88.8
少年	61.9	32.3	104.8	47.8	19.1	79.6	57.3	26.5	90.9
女青年	38	9.8	45.8	29	5.6	43.0	38.2	11.2	66.7
男青年	18.9	2.9	21.4	17.6	1.5	16.8	25.4	8.9	55.7
中老年(女)	20.4	5.6	40.2	12.1	1.5	13.6	15.9	6.4	63.4
中老年(男)	12.3	0.9	8.6	10.1	-0.5	-8.3	14.3	3	28.9
女性家长	131/	49.1/	58.9	96.2	17.7	23.1	144.5	78.2	123.8
男性家长	61.1	24.6	68.6	65.5	18.2	52.7	86.7	33.4	98.1

指导。

从实际的对比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除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比较严重外,用户进行首次借阅指导书籍推荐后所有群体都呈现借阅量统一上升的情况,就算是在借阅目的性较强的中青老年群体中,都得到了较好的结果,证明首次借阅指导这一举措是可行的。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自身图书馆的定位,聚类分析无疑是了解所服务的用户对象的最低成本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据许多新用户反映,从他们收到首次借阅指导书单的那一刻,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馆对于新用户的重视,许多新用户在办理之初便对应着推荐清单进行书籍查找,开启了他们的首次图书馆之旅,这也是我馆进行该项目的初衷。

3.2 指导馆舍布局

3.2.1 基于聚类分析结果的书架布局应用

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担负着关键的作用,拥有其他专业图书馆无法比拟的丰富馆藏文献资源。现阶段的馆舍书架布局研究都是基于建设方的主观认定配合问卷调查进行决策,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而我们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要求基础上,融合了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中聚类分析体现的结果,由客观数据辅助主观决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在聚类分析研究方面,乐承毅等人通过SPSS Modeler 软件对指标进行处理,得到了两步聚类的结果,结合对聚类变量特征的描述及RFM理论,分别描述为流失用户、回流用户和活跃用户并对其进行用户画像分析^[18];徐海玲等人通过聚类分析中的关联规则算法,深层次挖掘出用户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需求和偏好特征,便于群体兴趣画

像的精准刻画,从而得出各群体间的借阅倾向,进一步构建群体用户画像^[19]。

本文基于2015—2019年跨度的用户借阅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我馆所面向的用户群体的借阅倾向。通过统计聚类描述中多数以上类别,即用户聚类核心类别的用户数占比,并与用户借阅中各类别用户数占比对比(见表3)可发现,I类图书的借阅比例居高不下,每年都有超70%以上用户会借阅I类书籍。而同样,在用户聚类核心中也显示相近的结果,借阅多类别图书的用户也大部分会借阅I类图书。可以观察到的是,用户聚类核心类别中除I类以外,B、G、K这3类在聚类核心类别占比较高,说明借阅这几类的用户都显著体现在聚类核心类别中,是聚类划分的重要依据。F、T这2类则由2015年的显著体现到2019年逐渐淡出核心类别,少量、分散地体现在其他各类聚类中。H、J这2类则刚好相反,从2015年逐年上升,到2019年体现在聚类核心类别,说明H、J类图书重要性在上升,开始进入核心类别。

再者,通过各聚类的详细核心类别,观察双核心类别的组合及其变化情况。由表4可知,双核心类别组合的组成类别主要有B、F、G、H、I、J、K、T这8类图书。其中,与T相关的组合TI、KT、TB的用户占比均有显著下降;与F相关的组合BF、FI、FK、FT的用户占比下降更是严重,几乎已经不再作为核心类别而标在聚类中,结合表3来分析,这也是F类和T类图书借阅用户占比逐年下降的又一体现。与G相关的GI,与J相关的JI,与K相关的KI,与Q相关的QI在5年内均有逐渐提升;与H相关的HI提升不多,其2018年有大量增多,但

表3 2015—2019年用户聚类核心类别占比与借阅类别占比对比表

类别	2015年借 阅类别占 比/%	2015年聚 类核心类 别占比/%	2016年借 阅类别占 比/%	2016年聚 类核心类 别占比/%	2017年借 阅类别占 比/%	2017年聚 类核心类 别占比/%	2018年借 阅类别占 比/%	2018年聚 类核心类 别占比/%	2019年借 阅类别占 比/%	2019年聚 类核心类 别占比/%
B	26.9	26.30	25.9	23.2	25.8	23.3	26.0	22.3	24.5	23.4
C	11.3	0.10	10.6	0.0	10.1	0.0	10.5	0.6	9.7	0.0
F	26.3	24.70	23.0	17.8	22.3	16.8	20.3	11.6	16.4	4.8
G	29.1	25.20	29.7	25.6	29.3	27.1	30.1	32.3	35.5	36.0
H	25.4	12.80	25.2	13.4	25.1	12.9	24.8	19.4	25.0	21.6
I	70.2	71.50	72.4	72.4	72.8	74.4	72.6	73.3	78.9	84.1
J	22.1	16.10	22.2	18.2	21.3	16.9	21.7	17.4	23.4	23.3
K	26.4	23.00	26.5	20.0	26.0	24.5	26.9	22.1	28.6	26.3
P	7.1	3.90	7.6	4.5	7.6	4.4	8.3	0.0	9.6	2.4
Q	13.1	8.70	14.2	10.1	13.7	6.2	14.6	9.5	18.7	12.0
R	15.6	0.10	14.8	0.0	14.0	0.0	13.0	0.0	12.5	0.0
T	26.6	22.50	25.6	18.5	24.3	18.8	22.3	15.7	19.3	10.6
Z	14.1	8.70	14.4	10.1	13.4	6.2	13.2	8.0	14.4	8.4

2019年占比却回落回往年水平。

如何将上述结果应用至实际的图书馆服务中,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而现阶段我们尝试的一个方向,就是调整阅览室的书类分布与书架布局:(1)减少用户在不同阅览室来回找书的时间,尽量使用户在一个阅览室内完成高效的借阅体验;(2)对于没有具体借阅目的的用户,将核心聚类组合占比较大的分类书籍放在同一个阅览室,提高借阅率;(3)相同核心聚类的书籍在同一个阅览室可完成分类上架,减少先将其分出来再运到不同阅览室上架的步骤,节约上架工作人员对书籍的分类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结合我馆的实际情况,借阅三区原为I类(见图3),即文学类图书阅览室,在阅览室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对其进行空间改造,添加其他大类的书籍。在不打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础上,我们可选择与I类图书搭配的GI、HI、JI、KI类书籍,其中GI是核心聚类中最优的匹配,KI为次优解,再接下来才是HI和JI。但同时我们仍需考虑到我馆相关分类书籍的在架总量,全馆在架馆藏总数为702 629册,其中G类图书51 014册,H类图书26 016册,J类图书30 935册,K类图书45 261册;如果我们选择GI与KI核心作为应用基础,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我们必须将空间布局布置为GHI或IJK的组合,这样的话需要的书架数量及工作量大大增加,会进一步压缩摆放阅览桌椅的空间。因此我们最终选择HIJ核心组合,H与J类两类图书的在架总数与G类总数相近,最终借阅三区的布局如图4

表4 用户聚类核心类别组合(双核心)年占比表

类别组合 (双)	2015年 用户占比 /%	2016年 用户占比 /%	2017年 用户占比 /%	2018年 用户占比 /%	2019年 用户占比 /%
BG	7.4	6.8	9.5	9.7	10.6
BF	12.5	5.8	10.5	4.9	0.0
BI	21.3	16.9	19.1	18.7	18.7
FI	15.0	12.4	9.0	5.0	1.6
FK	5.2	3.6	2.3	4.9	0.0
FT	10.3	5.9	7.1	4.2	0.0
GI	25.2	23.8	25.5	30.1	35.5
HI	10.7	13.4	12.9	19.4	13.1
JI	16.1	18.2	15.1	17.4	22.2
KI	19.6	13.9	24.5	20.5	26.3
TI	13.1	8.1	9.1	4.1	6.2
KT	4.5	2.3	4.1	5.6	2.7
QI	8.7	10.1	6.2	9.5	12.0
TB	8.1	6.1	6.8	4.0	3.4

普通图书借阅三区平面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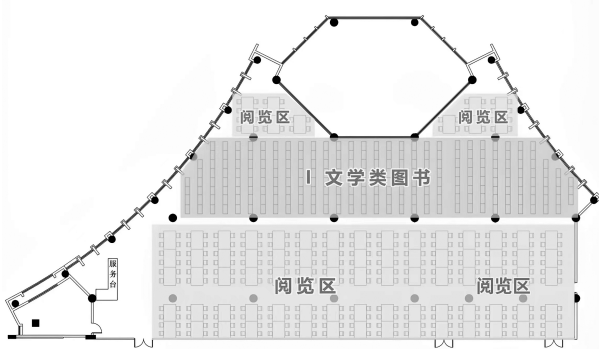


图3 借阅三区原布局

普通图书借阅三区平面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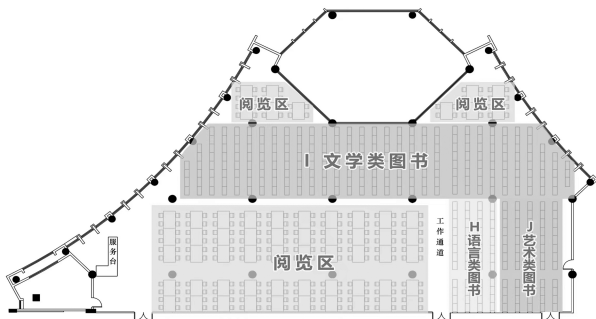


图4 借阅三区现布局

所示。

3.2.2 书架布局应用的效果与评价

为了验证借阅三区调整书架分类布局后重新开放以来的应用实践效果,我们截取了2020年及2021年的借阅数据作为主要参考指标,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该借阅组合的实际效果,我们并没有采用统计聚类核

心类别的统计方法,因该统计方法会将该组合分散在其他聚类中,比如HI的借阅类别会被分散至三核心(BHI、GHI、KHI)的聚类中(见表5),导致不能体现其实际的借阅用户占比。

因此我们选择利用全数据的统计方法,即各借阅组合类别的全部用户数(只要该用户在这一年中借阅过H与I类书籍即可计数为HI类借阅用户),统计2016—2021年的借阅组合类别占比(见表6),从表中可以得知,HI类别的借阅用户占比在6年间都保持地比较稳定,其中2021年占比最高,2019年次之;而JI类别的借阅用户占比从2019年开始呈现增长趋势;同样,HIJ组合类别的借阅用户占比呈现出2019年、2020年与2021年高于前4年的情况。基于借阅组合类别占比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因素未进行改变的情况下,根据核心聚类分析结果,调整书架分类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增加用户借阅率,对于进

表5 用户聚类核心类别组合(三核心)年占比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类别组合	用户占比 /%	类别组合	用户占比 /%	类别组合	用户占比 /%	类别组合	用户占比 /%	类别组合	用户占比 /%
BFI	9.0	BFI	4.9	BFI	0.0	BFI	0.5	BFI	0.3
BGI	9.5	BGI	9.7	BGI	10.1	BGI	8.7	BGI	8.1
BHI	7.1	BHI	7.3	BHI	5.2	BHI	5.5	BHI	4.2
BJI	1.8	BJI	2.6	BJI	5.8	BJI	3.6	BJI	2.8
BKI	7.4	BKI	4.0	BKI	8.5	BKI	7.4	BKI	3.5
GHI	11.5	GHI	15.2	GHI	19.9	GHI	18.7	GHI	20.8
GJI	11.2	GJI	13.4	GJI	15.2	GJI	16.4	GJI	17.8
GKI	12.1	GKI	9.7	GKI	13.5	GKI	12.3	GKI	11.8
KHI	9.8	KHI	9.4	KHI	13.5	KHI	12.7	KHI	12.6
KJI	8.5	KJI	5.6	KJI	10.4	KJI	11.6	KJI	10.8

表6 2016—2021年借阅组合类别占比表

借阅组合类别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用户数	占比 /%	用户数	占比 /%	用户数	占比 /%
HI	10 474	20.6	10 655	20.92	9 619	20.6
JI	9 857	19.4	9 482	18.62	8 778	18.8
HIJ	4 292	8.4	4 301	8.44	3 837	8.2
总用户数	50 853		50 931		46 717	
借阅组合类别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用户数	占比 /%	用户数	占比 /%	用户数	占比 /%
HI	12 461	21.94	10 949	21.0	13 872	23.6
JI	12 117	21.34	12 317	23.6	14 636	24.9
HIJ	5 239	9.23	4 835	9.3	5 628	9.6
总用户数	56 791		52 100		58 780	

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而言是行而有效的,未来可以尝试突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限制,依据核心聚类进一步将关联性高的分类图书进行空间布局整合,进一步提高用户借阅的便捷性。

4 结语

本文基于深圳市图书馆之城管理系统的用户借阅数据、馆藏数据构建了属于龙岗区图书馆用户的用户画像体系,初步实现了基于用户画像及资源画像的基础应用。在应用上虽然较为简单,但在现实各项客观条件及技术未成熟的情况下,初步应用也证明了用

户画像研究的可行性,侧面说明了该领域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虽各项理论成果推陈出新,但在时代的发展中必然会筛选出最适合当下实际应用的理论。如单轸等人提出的我们需要在用户画像的热潮中进行冷思考,国内智慧图书馆建设尚未达到成熟期,用户画像引入图书馆势必需要与资源系统、技术系统、服务系统、空间系统高度一致,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和精准服务才可以得到保障^[20]。我们要多审视国内图书馆相关技术发展情况,多加学习国外成熟的理论与思路,创新用户画像在国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构建和管理模式,结合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将思维转向实际应用。

参考文献:

- [1]王丽艳,郭春侠.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现状及趋势[J].图书馆界,2021(2):65-70,94.
- [2]许鹏程,毕强,张晗,等.数据驱动下数字图书馆用户画像模型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3):30-37.
- [3]陈丹,柳益君,罗焯,等.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智慧服务模型框架构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6):72-78.
- [4]陈丹,罗焯,吴智勤.基于大数据挖掘和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J].图书馆研究,2019(4):50-53,59.
- [5]李晓敏,熊回香,杜瑾,等.智慧图书馆中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推荐研究[J].情报科学,2021,39(7):15-22.
- [6]王顺箴.以用户画像构建智慧阅读推荐系统[J].图书馆学研究,2018(4):92-96.
- [7]李宝.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个性化资源推荐服务设计[J].新世纪图书馆,2021(4):68-75.
- [8]李业根.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信息营销策略[J].图书馆学刊,2014(10):7-9.
- [9]肖海清,朱会华.基于参与式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精准阅读推广模式构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6):122-128.
- [10]刘海鸥,孙晶晶,苏妍嫒,等.面向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多情境兴趣推荐方法[J].现代情报,2018,38(6):62-67,156.
- [11]解娜.基于用户画像的用户周边好书推荐服务研究[J].情报探索,2020(8):104-108.
- [12]王庆,赵发珍.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资源推荐模式设计与分析[J].现代情报,2018,38(3):105-109,137.
- [13]徐海玲,张海涛,魏明珠,等.社交媒体用户画像的构建及资源聚合模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9):109-115.
- [14]刘芳,朱沙.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精准服务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1):73-75.
- [15]刘海鸥,李凯,姜波.移动图书馆推荐系统中的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情境化融合研究[J].图书馆,2021(6):66-71,93.
- [16]袁军.大数据环境下用户画像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研究[J].图书馆研究,2019(6):22-26.
- [17]李雅.基于用户画像的高校图书馆精准化服务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12):108-111.
- [18]乐承毅,王曦.基于改进RFM聚类的高校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2):75-79,93.
- [19]徐海玲,张海涛,张泉慧,等.基于概念格的高校图书馆群体用户兴趣画像研究[J].情报科学,2019,37(9):153-158,176.
- [20]单轸,邵波.国内图书馆领域用户画像研究的冷思考:困境与出路[J].图书馆学研究,2019(5):8-13,30.

作者简介: 曾舜, 硕士,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助理馆员, 用户服务部部长, 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4-22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探索与创新 ·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功能拓展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张晓婕

(衢州市柯城区图书馆 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 在国家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抓住机遇进行服务功能拓展的尝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浙江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势,文章探讨了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服务功能拓展实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建设新型阅读空间、提升服务知晓度的对策。

关键词: 文旅融合;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xpanding Service Function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Public Libraries i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China is now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libraries must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to expand their service functions. Zhejiang is home to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boasts a well-constructe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ervice function expansion of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se include creating special cultural brands, improv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building new reading spaces, and enhancing service awareness.

Key words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function expansion

1 引言

2021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继续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1]。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指出,建设以人为本的图书馆,优化公共图书馆环境和功能,营造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品质文化空间,建设有温度的文化社交

中心^[2]。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进行服务功能拓展的探索创新不仅是贯彻落实中央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能提升、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更是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和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方式。

公共图书馆基于文旅融合的服务拓展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以“主题=‘公共图书馆’ and 主题=‘文旅融合’ or 主题=‘服务拓展’”为检索式,检索时间不限,共检索到355条记录,剔除关联度差的文献后共324篇论文。论文研究广义范围内有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研究综述、

对整体服务创新的探讨,狭义范围内针对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开展研学服务、图书馆+民宿模式、推出文创产品等专项服务的案例分析。本文基于浙江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的优势,对浙江省内公共图书馆就文旅融合方向的服务功能拓展方案、实践探索进行研究,以供借鉴。

2 浙江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的主要路径

2021年3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公共文化场馆服务功能拓展先行先试工作,省内有10家公共图书馆被列为省级服务功能拓展先行先试试点单位。笔者将这10家公共图书馆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查看图书馆的年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推文以及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功能拓展先行先试工作的申报材料、文旅融合服务功能拓展相关研究论文进行对比研究,将浙江地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方向的服务功能拓展分为拓展公共图书馆场馆功能、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空间、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数智化发展、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融合四个重点领域,如表1所示。

2.1 拓展公共图书馆场馆功能

公共图书馆结合当地人文特色,在馆内增加当地旅游资源展示、资讯发布等服务功能,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便捷适用的旅游指南性信息服务。舟山市图书馆对馆藏与旅游相关的地方文献进行筛选整理,编制了《舟山旅游文献目录索引》,以便读者能够在馆快速检索舟山市旅游景观、旅游业相关的文献信息,针对家谱、手绘旅游地图等旅游特色专题文献,

表 1 浙江地区 10 家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概况

序号	公共图书馆名称	四个重点领域			
		拓展公共图书馆场馆功能	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空间	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数智化发展	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融合
1	杭州图书馆	有旅游资料展示架,旅游文献展和推荐专架,播放旅游宣传片	在景区、酒店、民宿、地铁站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建有“良渚文化特色数据库”等自建数据库	打造“YUE 杭图”服务品牌
2	宁波图书馆	举办旅游主题书展	在景区、酒店、民宿、地铁站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明珠往事”地方文化专栏	推出“天一讲堂·读行天下”“外语角”等文旅融合服务品牌
3	乐清市图书馆	馆内打造“悦读·旅行·生活”文旅融合主题馆	构建“1+30+N”个集阅读、创意、文化、旅游便民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公共“乐读”空间	开发上线“读行乐清”数智文旅平台	培育“全民阅读·全域旅游”新型文旅“乐读”品牌
4	嘉兴市图书馆	有旅游专题图书馆,典藏并展示旅游相关的文献资源	在景区、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建有“红船数字书苑”等特色文化数据库	打造“文化行走 阅读嘉兴”阅读推广品牌
5	湖州市图书馆	设有以“文旅要素+阅读”为特色的“综合体验区”	在景区、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融“湖州数字图书馆”“云游湖州”“湖上云”数字服务平台展示服务资讯	推出“韵海”系列、“品读湖州”品牌活动
6	绍兴图书馆	设有旅游资料展示架、大屏播放旅游宣传片	在景区、文保单位、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建有“王阳明数据库”“绍兴古桥”“绍兴老照片”等特色数据库	“走读人文绍兴”文旅活动品牌
7	柯城区图书馆	设有旅游资料、文旅文创产品展示架,大屏播放旅游宣传片	在景区、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流通点	建有“柯城非遗”数据库	参与当地度假区创建,为景点取名,旅游线路制定提供文献资料和智力支持
8	舟山市图书馆	设有旅游信息发布屏和旅游阅览专区,利用公众号发布舟山旅游信息资源	在景区、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合作共建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融合海洋知识服务、海洋文化收藏等功能	举办旅游知识讲座、展览和旅游达人分享会
9	台州市图书馆	大屏播放旅游宣传片	在景区、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推出“和合e书吧”线上图书馆,嵌入景区、酒店等旅游场所	以“走读台州”立体讲座为契机同步开展文化旅游推介活动
10	景宁县图书馆	设有旅游主题图书展示架	在旅游服务中心、景区、酒店、民宿设有主题分馆和书吧、书房	建有畲族文化数据库	开展畲乡文化主题活动

城市旅游宣传影像进行分类收集,在馆舍二楼设置旅游信息发布屏和旅游资料展示架,三楼开设旅游阅览专题区,展阅舟山旅游信息资料,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每月一期发布舟山旅游方面的信息资源。

2.2 延伸公共图书馆服务空间

公共图书馆在符合条件的景区、民宿等旅游场景开辟公共文化空间,增加阅读推广等服务功能。嘉兴市依托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红船书苑”体系,在市内主要旅游景区、历史街区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可供读者和游客学习交流,展示嘉兴红色文化、地方旅游风貌的特色红船书苑。嘉兴市图书馆根据嘉兴南湖景区的特点,在景区烟雨楼前文创商店二楼建成“红船·南湖书苑”,提供万册图书,其中包含党建相关图书3 000余册,将红色教育与嘉兴旅游进行融合。该书苑既是市民休闲阅读和交流的场所,也是游客参观打卡的热门点位。

2018年12月,宁波市图书馆把一座智能借阅柜搬进了轨道交通1号线和2号线的转乘站点里。这个智能借阅柜对接第三方信用平台,芝麻信用550分以上的市民和游客通过扫描柜上的二维码就能实现柜上图书的实时借还,无需押金,无需办卡,选择喜欢的图书,扫码就能带走。在放置的第一个月,智能借阅柜的借还量就达到了2 500册次,居全国260余台智能柜单台借阅量的榜首。把阅读文化同城市出行相结合,公共图书馆高效便捷的服务随着地铁线的拓展不断延伸^[3]。

2.3 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数智化发展

公共图书馆依托“智慧文化云”平台,畅通场馆信息化渠道,搭建文旅融合“一站式”服务平台。深入开展文化基因解码,推进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乐清市图书馆于2021年6月上线推出“读行乐清”文旅数智平台,通过阅读、旅行、分享、活动、积分商城五大部分整合公共文旅信息,连接图书馆数据平台、社会化旅行平台以及喜马拉雅、三联中读等社会合作方,打通了图书馆、用户及物理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图书馆、城市书苑、景区景点等多方数据融合,搭建一站式多场景集成阅读学习平台。平台内开设的“乐音清扬”品牌电台、“人文乐清”小课播放量达10万余次,深受市民欢迎。

2.4 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融合

公共图书馆推动公共图书馆场馆建筑与周边地形地貌和当地风土人情相协调、在阅读推广服务中融入旅游元素,延伸到旅游场景中,积极参与文旅项目、节庆活动,打造文化和旅游相融合的服务品牌。杭州图书馆以人文走读的形式将馆内品牌活动拓展到景区、博物馆和品牌文旅节庆活动中,将“文澜大讲堂·走读杭州”系列活动引入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杭州低碳科技馆;将“走读东南佛国”系列活动打卡虎跑公园、净慈寺、灵隐寺;与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云文武杰太极拳禅等合作组织“世界读书日”专题活动“阅·动·历史建筑,助力文化自信”文化体验之旅活动^[4],参与“宋韵杭式生活节”并开设“宋韵书房展示体验区”。

3 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总结出,10家试点公共图书馆均在服务功能拓展中进行了探索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

3.1 重服务空间延伸轻服务内容研究

近年来,浙江省内公共图书馆随着各地公共文化标准化创建、满意图书馆创建等一系列省级层面推行的创建活动的实施,以及一批新场馆的建成,在硬件条件上有了极大的改善和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城市书房的建设作为全省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各级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各地地方财政在建设经费上给予了充分保障。各馆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财力于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和分馆的空间建设上,对基于馆藏资源内容的深度挖掘所提供的服务投入关注不够。旅游信息发布服务分散和零碎,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在基础设施提升和场馆建设时,对当地特色文化旅游要素融合体现不够,仅有少数地区建有旅游主题图书馆;在活动举办和品牌创建上,活动形式不够丰富,对地域特色文化挖掘不够深入,活动内容流于表面,文化品牌不能深入人心。

3.2 服务数智化发展水平和效果有限

浙江省是一个旅游信息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同时公共文化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但目前省内各公共图书馆与当地与旅游行业多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借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图书馆内信息和旅游业信息的公共图书馆极少,现有的信息发布也存在不及时、

不全面的短板,各图书馆之间尚未形成文旅资源信息联合平台,未能良好利用自然资源集中的良好区位红利,以及地理位置优势带来的规模集聚红利。

3.3 图书馆与旅游行业各主体融合度不高

目前,省内各公共图书馆与旅游行业主体的融合多集中于图书馆+酒店、图书馆+民宿、图书馆+景区的模式,与人流量密集、阅读量需求更大的旅游场景,例如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游客集散中心等场所的合作较为缺乏。且现有的融合模式中,多停留于简单的空间融合,即图书馆在旅游行业各主体中建设分馆、图书流通点,没有充分考虑游客在利用景区公共文化设施时利用时间短、休闲性为主的特点,灵活选取融合模式;没有充分利用景区节假日人流量大、游客对地方文化探知欲强的特点,开展系列活动。

3.4 文旅融合服务宣传度知晓度不高

图书馆长期以来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保存书籍,传递知识,缺乏创意和活力^[5]。如今随着群众的需求变化,图书馆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服务内容也日益丰富,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方面的拓展服务也正在走向社会。图书馆通过线下场馆海报展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或智慧文化云平台宣传展示这些拓展服务,但在宣传推广工作过程中,存在宣传形式单一、宣传手段简单、宣传效用不深入、宣传推广对象局限的问题,导致图书馆投入了人力、经费的拓展服务和品牌仍不能被市民读者广泛知晓,不利于服务创新的良性持续发展。

4 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拓展的思考

4.1 发挥馆藏优势,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品牌建设可以为公共图书馆创造长期优秀的服务业绩,在促进图书馆长期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6]。对信息的挖掘、整序、开发、传播的专业性和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尤其是一些特色资源、非遗资源、地方文献资源,是公共图书馆打造文化品牌最有利的优势。首先,在发布旅游信息时,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专业优势,挖掘整理出当地游客最想知道的、获取渠道少的旅游信息,为公众提供丰富、精准、常态的信息服务。其次,打造景区书房时,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不同专题的地方文献,让合适的图书走出图书馆,走进景区,构建有主题、有品牌

的特色馆藏。再次,将馆内地方文献与城市旅游景区相结合设计系列“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品牌活动。如围绕文献产生、存储、检索等各个环节设计研学内容,使公共图书馆成为研学旅游基地;利用与地方旅游文化相关的文献策划出创意文旅路线,精品文旅研学活动;在节假日时,以馆藏文献为依托,联合景区举办朗诵、歌舞快闪、非遗文化体验等参与度高、互动性强、体验感丰富的活动。最后,结合馆藏文献,融合进当地著名景点、文化、名人开发兼具工艺性、实用性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打造地方文化IP。

4.2 借数字化改革东风,提升数智化服务水平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掀开了全省数字化改革的大幕。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浙江,推进全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7]。各行业领域都在数字化改革上作出了诸多探究,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领域的数字化先行者,应该抓住这个井喷式的好时机,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线下公共文化服务遭遇了闭馆、限流、活动限额等限制的现状下,更应借助数字化手段拓展服务途径,提高服务水平。首先,深化数据归口和整合,积极与“浙里好玩”“智慧文化云”等文旅信息发布平台的数据对接,在发布文化信息的同时发布独特、精准的旅游信息,同时形成省内地域信息联动。其次,推动5G、VR/AR、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新型数字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在馆内打造虚拟体验空间,用数字技术展示文旅内容,增强读者交互感和体验感。最后,建立特色馆藏、地方文献、非遗文献、旅游资源文本资源数据库或有声数据库,并将数据库内容以数字化设备、扫码听读的方式在文旅数字平台或旅游场景中加以宣传展示。

4.3 完善参与合作机制,合作建设新型阅读空间

新型阅读空间多数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能够为居民群众提供优质阅读内容和服务体验的公益性、开放性场所,是外部颜值与内容品质、阅读与互动有机结合的新型文化生活空间^[8]。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成为今后几年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无疑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参与合作。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未来乡村景区化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完善参与合作机制,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成为“网红打

卡”的旅游点,或嵌入景区提升景区的文化品质。首先,深化与旅游业各主体的合作,除酒店、民宿、景区外,将服务触角延伸进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游客集散中心等游客休憩场所和交通服务全区域。尤其随着乡村旅游的比重日益加重,公共图书馆可以借力未来乡村建设,充分利用旧祠堂、老民居、旧粮仓等乡土建筑,将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成乡村旅游景点。其次,深化与各商业业态的合作,邀请文创企业、出版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参与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让新型阅读空间形成以阅读为核心,融合阅读、文创、餐饮、讲座、展览、体验活动等多元业态。最后,深化与各社会团体的合作,吸引文化达人、旅游达人、非遗传承人、文旅志愿者加入,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提高包括读者、游客在内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结度和粘合力。

4.4 借势宣传营销,提升服务知晓度

在网络时代,除了传统的宣传渠道外,公共图书馆还要借势借力营销,以充分凸显自身的特色服务。首先,强化网络宣传与推广,通过电子邮件、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定时的推送服务,借助抖音、小红书等高人气社交平台进行特色服务相关视频创作发布。其次,加强资源融合与宣传,与城市宣传部门、文旅服务部门合作。如借助城市交通网络,在通向景区的地铁、公交及旅游专线上,将拓展服务内容制作成可视化宣传品,通过电子屏、显示器、公益广告等形式进行宣传展示。积极参与重大文旅节庆活动,策划全民阅读进景区系列推广活动进行展示宣传。最后,建立统一化的对外宣传品牌标识体系,通过策划创意性“热搜”文化事件,进行话题性营销,形成爆点。

参考文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03-08)[2022-02-17].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3/content_5595153.htm.
- [2]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21-06-10)[2022-02-17].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3/content_5620456.htm.
- [3] 徐益波,毛婕.打造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宁波样本”:宁波市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实践探析[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9):10-12.
- [4] 石璞.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实践与思考:以杭州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42(3):7-9.
- [5] 云云,陆和建.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探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7):32-40.
- [6] 钱明辉,潘菲,李天明,等.基于服务创新视角的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文化品牌建设研究:面向省级公共图书馆管理者的调查[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1,30(5):83-90.
- [7] 袁家军: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 努力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EB/OL].(2021-02-18)[2022-02-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030826153062742&wfr=spider&for=pc>.
- [8] 刘志芳.昆明市公共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新阅读,2022(2):61-64.

作者简介: 张姚婕,衢州市柯城区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4-21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具体规定及实施进展^{*}

邢张睿¹ 赵锦涛²

(1.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2.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我国台湾地区在2020年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试办计划在两个试办图书馆进行，该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创作者和出版者创作和出版的纸质图书作品进行补偿。随着第一年试办期的结束，补偿金总体发放过低的实施结果反映了该年度试办期存在申请手续过于繁琐、认定标准存有异议以及借阅图书偏好明显等问题。通过分析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下的“立法”模式、补偿规则、具体规定和实施进展存在的不足，以此为今后协调大陆与台湾地区开展公共借阅提供相关经验。

关键词：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补偿金；台湾地区

中图分类号：G259.2758

文献标识码：A

Public Lending Right in Taiwan Region: Pilot Programs,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Abstract A three-year public lending rights pilot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Taiwan, China in 2020. The scheme was conducted in two pilot libraries. It compensates eligible creators and publishers for works created and published in paperbacks. As the first year of the trial period came to an end, the resul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underpayment of compensation reflected problems such as overly burdensom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disagreements over the criteria for recognition, and a clear preference for lending books during the trial period.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egislation" model, compensation rules,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under the program for public lending rights in Taiwan,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harmonization of public lending right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Key words public lending right; pilot program; compensation; Taiwan region of China

公共借阅权，也称公共出借权（public lending right, PLR），是一项旨在补偿作者因图书馆出借馆藏书籍造成损失的财产性权利，世界范围内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该制度^[1]，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于是否设立公共借阅权处于观望态度，认为未来有可能会设立公共借阅权以保证作者的应得利益。但是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对待公共借阅权则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良好的版权例外和限制基础，贸然开展公共借阅权将有违该制度设立的意义和目的^[2]。随着电子书等数字版权作品的发展，电子书是否可以作为公共借阅权的补偿客体存在争议，欧洲联盟也在相关判决中肯定了拓展电子书的现实意义和衡平关系^[3]。放眼我国台湾

^{*} 本文系2022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的版权清算研究——以第三次修订著作权法实施为视角”（项目编号：YCSW2022253）的研究成果之一。

地区,自2020年起针对两所试办图书馆的纸本图书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意图通过“先试办,再‘立法’”构建具有良好制度导向的公共借阅权。

1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的发展历程

1.1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产生的现实背景

公共借阅权早在1991年就在我国台湾地区被首次提及^[4],后在2008年台湾地区出版业面临经营困境时被提出,建议台湾当局引入公共借阅权以酬劳补贴著作权人或其他版权拥有者^{[5]68},提出此项建议的原因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势头减缓,而图书馆的借阅数量却在上升。台湾地区出版产业销售值从2013年的616.7亿新台币逐年衰退到2017年的460.64亿新台币,不过公共图书馆的借阅册数却从2011年的5 700万册上升到2017年的7 656万册。公共图书馆的借阅册数逐渐上升,大众的阅读习惯逐渐以“借书”取代“买书”^[6]。因而,补偿作者因图书馆借阅行为造成的潜在损失使得台湾地区构建公共借阅权具有现实基础。

1.2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立法”尝试

随着出版界对于公共借阅权讨论度的提高,2017年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委托相关人员进行“推动台湾出版品公共借阅权之法治作业、实施机制及其效益评估”的研究计划,该研究计划对后续提及的2019年公共借阅权“立法”和三年试办计划具有推动作用^[7]。2019年4月25日,台湾行政部门同意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展为期三年的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并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整体的规划设计^[7]。2019年5月22日,台湾立法部门提出修订“台湾图书馆法”并将公共借阅权入法,意在使图书馆出借图书后支付作者一定的补偿金,从而避免他们的著作权益受损。但现实并未完成公共借阅权的“立法”。

1.3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虽然未能完成实质性“立法”,但是被允许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试办计划。2019年12月31日,台湾文化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共同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试办公共借阅权^[8],试办地点为台中市的公共咨询图书馆和新北市的台湾图书馆。根据该试办计划,设立公共借阅权的目的在于,落实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鼓励文化创造

力,并在公共图书馆提供借阅服务过程中保障创作者权益。最终在试办结束后,将视具体情况决定公共借阅权的未来走向,评估是否建立适当的公共借阅权制度,以及考量在其实施中的一系列规则问题^[4]。

2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具体规定

2.1 补偿主体资格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补偿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创作者(如创作者已故,法人或民间团体解散则不具有资格);另一类是出版者(政府机关及公立学校不列入补偿金发放范畴)。对于创作者而言,包括绘本的绘者、编者、改编者、口述、撰稿、采访、记录等,创作者的姓名需要记载在版权页。

不同作品类型的创作者认定也有不同规定。第一,对于上述八种类型的作品版权页有所记载的主编或编辑,可以弹性认定为创作者。第二,对于文集、选集类创作者,如果版权页所载的创作者为数人时,那些不在版权页上的作者需要提供佐证资料(如目录页),以此认定各篇文章的作者为创作者。若主编或编者选文及论述具有贡献度但版权页没有记载上述八种作品类型的创作者时,可弹性认列主编、编者为创作者。第三,对于类杂志书的创作者,既可以选择出版社记载的创作者,也可参考CIP(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图书在版编目)咨询进行认定。第四,对于古文类创作者,校译者、注释者、注解者等可视为创作者。如涉及外译,编译者可视为作者。

如出版者与创作者、创作者间或创作者与试办图书馆之间对于创作者的认定有出入时,将交由试办图书馆所成立的工作处理小组审议,审议结果将作为试办图书馆判定的参考。

2.2 补偿客体资格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指出,享有该计划补偿的主体资格适用于具有台湾地区户籍的居民、依法设立登记的法人或民间团体,以中文或外语创作且在台湾出版具有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国际标准书号)的纸质图书。由于该试办计划仅在两所图书馆进行,因此,在该试办计划内仅限于试办图书馆有借阅记录的纸质馆藏资源。

2.3 补偿(酬)金发放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中将发放给出借

图书作者的经济利益称为“补偿酬金”，国际社会对于公共借阅权所支付的经济利益大都称为“补偿金”，除无特别说明，以下称为“补偿金”。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补偿主体既有创作者也有出版者，两类主体的补偿金需要按比例分配，创作者占70%，出版者占30%，且补偿金不得让与。补偿金按照借阅次数（年度借阅次数）为计算基准发放，并排除续借次数，单次借阅发放新台币3元。

补偿金发放依据登记资料并计算创作者和出版者具体的补偿金额，补偿金发放下限为30元新台币，达到拨付补偿金下限者将于2021年5月开始发放。如果本年度补偿金未达到该标准的主体将累积至下一年度计算，待试办期满则会全数发放。

创作者为两人以上的图书，补偿比例以均分为原则，此分配比例不涉及出版合同中有关著作权衍生利益分配的问题。换言之，出版合同中如果已经含有版权等此类利益分配规定的，该规定不影响公共借阅补偿金的分配。

2.4 登记流程

创作者和出版者采取事后登记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整理两所试办图书馆的借阅统计资料后，于每年的2月1日公告符合补偿资格的书目清单，并开放出版者及作者的登记系统。登记期间分为两个阶段，都需要出版者代创作者登记申请。以2021年度为例，第一阶段自2021年2月1日至3月31日，第二阶段自2021年4月1日至4月30日。出版者及创作者须于公告期限内进行线上登记，逾期未登记者视同放弃，开放现场登记时间另行公布。出版者及创作者需要在公告期内登记确认。

2.5 受理方式

受理登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受理出版者登记，由出版者代创作者登记，交由相关部门检具双方所需的申请文件，创作者不能自行申请登记。如为个人出版者，也可于第一阶段进行登记。第一阶段登记作业结束后，就未进行出版者登记、或因出版者切结书^①等原因未能联系上的创作者，开放这些作品创作者于第二阶段进行登记。出版者代创作者登记时，应当以该出版图书版权页中有记载的主体为限，出版者应在登记时出具所有创作者签署的同意书。如创作者未能联系上或拒绝签署同意书，出版者则需要出具切结书。

2.6 申请流程

创作者和出版者应登陆<https://plr.nlpi.edu.tw/>网站，由出版者统一进行申请。申请流程分为6个步骤：

（1）注册账号；（2）查询书单；（3）代注册创作者账号，签署并上传委托书；（4）整理暂存清单及检附文件；（5）于登记期内送出申请；（6）签署无委托切结书并上传完成。其中1—4步在全年皆可进行，但申请补偿金仅能在每年的2月1日至6月30日之间进行。

3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实施进展

3.1 试办第一年实施结果

2020—2021年度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的试办计划已经结束。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总计有77家出版者及1 049位创作者登记申请，核发补偿共40万1 673元（出版者15万8 580元、创作者24万3 093元），平均每家出版社获得2 059元、每位创作者获得232元补偿金^[9]。但在试办计划实施之初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曾预估需要发放的补偿金约为每年1 000万^[10]。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曾做过统计，两所试办图书馆符合登记范围的书目约11万余种，2020年度累计借阅逾79万册次^[11]。本文根据台湾媒体实验室发布的部分借阅数据制作了2020年台湾出版者及创作者公共借阅数量前10排名（见表1）^[9]。

表1 2020年台湾出版者及创作者公共借阅数量前10排名

2020年出版者借阅数前10				2020年创作者借阅数前10			
排名	出版者	书目数量	借阅次数	排名	创作者	书目数量	借阅次数
1	远流	1 672	18 761	1	笑江南	28	11 890
2	时报文化	1 817	17 044	2	金庸	85	7 880
3	狗狗图画	139	13 568	3	王文华	217	6 702
4	风云时代	837	12 572	4	月关	146	3 872
5	小兵	459	12 411	5	李光福	130	3 712
6	亲子天下	303	11 977	6	黄易	23	2 980
7	天下杂志	594	10 322	7	李国靖	32	2 897
8	商周	1 140	9 763	8	哲也	60	2 866
9	文房文化	384	9 382	9	郑宗弦	83	2 702
10	远见天下文化	514	8 756	10	林哲璋	57	2 519

3.2 试办存在问题

3.2.1 登记和申请流程过于繁琐

台湾地区发放公共借阅补偿金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繁琐的申请手续。由于台湾地区的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处于探索阶段,即便是公共借阅权登记网站推出了使用者操作说明以及多场操作课程,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实质解决申请流程繁琐的问题,加之不同的群体递交的登记及申请材料有所差异,因而在实施层面降低了试办计划的补偿效率。表1所列处于借阅数量的前几名多不符合补偿资格的条件,且除了这些已经具有一定人气的创作者之外,其他的个人创作者可以领到的补偿金也都偏低。同时,如果同一创作者出版的书籍归属不同的出版者,此种情况则需要向每一家出版社获取切结书,导致版本数量和借阅数量都处于高位的创作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准备材料。

有学者对于台湾地区施行公共借阅试办计划进行满意度调查^[12],结果显示,创作者普遍认同该计划的实施,认为有助于奖励创作者并激励他们持续创作,创作者也会因此了解到自己的作品被实质借阅后而获得精神慰藉。但是目前的状态是,繁琐的申请流程降低了创作者和出版者的申请意愿,从而不利于公共借阅权的整体实施。

3.2.2 认定标准存在异议

除了繁琐的申请流程之外,严格的补偿主客体认定标准进一步降低了创作者和出版者的申请意愿。首先,补偿主体主要限于台湾地区的规定限制了出版者和创作者的身份,许多热门借阅图书不能得到应有的借阅补偿,尤其是对那些不属于台湾地区的创作者而言。其次,补偿客体的认定标准存在异议,主要是纸质图书的认定标准与实现情况的不相适应致其存在争议。其一,年份久远的纸质图书不易获得补偿,此类图书资源在进行创作者和出版者认定时受制于版本久远、作者难以找齐和不易保存的问题。其二,不同图书的ISBN号会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认定困难,如重复书目、不同版次图书沿用ISBN或是套书共用ISBN等情况。例如,同一版同一印刷的纸质图书会因是否带有赠品而有所不同,如果证明属于同一创作者则需要附加佐证材料。

3.2.3 借阅图书偏好明显

公众对于借阅图书的偏好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的补偿金差异过大。读者在对不同种类和主题的纸质图书进行选择 and 借阅的过程中,在客观层面导致了补偿差异过大的结果,可以预见,这种补偿差异过大的

趋势将会持续。根据表1所列的创作者为例,借阅数量第一名的笑江南主要从事漫画创作,而第二名金庸和第三名王文华则是以小说著称,公众对于借阅图书的受欢迎程度、主题、类型等因素将会客观引导创作者进行创作活动,相应地,出版者也就在公众对于创作者作品的被动选择中拉开了热门图书与一般图书的借阅差距。

4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评价

4.1 “立法”层面

4.1.1 先试办模式有助于后续“立法”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正处于试办阶段,公共借阅补偿实践仍有不足之处,由于是试办第一年,不管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具体实践方面都有待提升。但是这种先试办的模式对于公共借阅权的后续展开以及如何展开具有良好的参考意义,相较于先“立法”后实施的模式而言,此种模式更能在一开始“立法”时有针对性地把握“立法”细节,并在后续更大的实施范围中解决具体问题。

4.1.2 公共借阅补偿规则需要完善

(1) “立法”模式需要改变

台湾地区现行的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属于政策性活动,此前台湾的立法部门意图通过增订“台湾图书馆法”使公共借阅权“入法”,但是最终选择从试办计划入手。从世界范围内已有公共借阅权的立法模式来看,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时期的特点偏向于文化政策模式^②,文化政策模式的特点之一便是将公共借阅权纳入图书馆法之中。台湾地区在提出公共借阅权入法时并未首先考虑将其纳入“台湾著作权法”,而是纳入“台湾图书馆法”,将其纳入图书馆法的行权强度要弱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模式。同时,根据台湾地区已经公布的补偿规则来看,构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创作并以此促进台湾地区出版业的整体发展,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体现在补偿条件严苛、补偿类型较少、保护力度较弱,因而已经逐渐被版权模式所替代。

(2) 补偿规则有待改进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规定限制了符合条件的权利人获得补偿的能力。首先,补偿主体的严格规定限制了某些借阅数量较高的主体获得补

偿。这种具有明显地域限制的规定虽然有利于当地的创作者,但是过于限制身份将不利于台湾地区出版业的整体发展。其次,补偿客体的类型有待细化。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明确了补偿图书为纸本图书,排除了类似于录音录像制品、电子图书、有声图书等类型的非纸质借阅作品,因而这些作品将无法获得补偿。最后,补偿计算方式有待多元化。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补偿基准按照借阅次数计算,在已经实施公共借阅权的国家中,有超过一半采取该种补偿基准^{[13]68},但是随着图书馆馆藏资源逐渐增多,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技术的应用,采用混合制^③的补偿计算方式则可以扩大对馆藏图书的补偿力度。那些没有被经常借阅的图书也可以纳入补偿系统中,有利于改善补偿金额过低的整体局面,如果后续补偿金差异过大,则可以规定补偿金的上限。

(3) 补偿金性质不明确

在实施公共借阅权的国家和地区内,对于权利人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大都称为“补偿金”,而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制定的规则中将其称为“补偿酬金”,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是反映出公共借阅权的权利来源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此种表述对补偿金的定位存在歧义^[4],按照公共借阅权的发展趋势,主要从“补偿金性质(补偿金)”逐渐演化为“权利金性质(专有权)”,在此过程中绝不排除较低层次的“使用报酬(补偿酬金)”,三种概念的使用反映了不同语境下获得金额的不同。但是试办计划却将该种经济利益以“补偿”和“酬金”相混,“补偿金”通常金额不高,而“酬金”是专有权的对价,金额通常较高。公共借阅权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损失填补性质,本质是由于图书馆的运作,对没有责任的特定人,存在经济上的特别损失或加以损失之时,国家以补偿其财产上损失的目的,所负公法上的给付义务^{[5]109}。台湾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在权利来源上属于行政规章,此种立法模式更加偏向于对“补偿金”概念的适用。补偿金是实施该制度的主要目的,而酬金则曲解了补偿概念的本质,两者相混不利于公共借阅权的权利定位。

(4) 试办区域范围有限

先试办的计划虽然对后续“立法”活动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但是该计划仅在两所试办图书馆施行,覆盖的场所和地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所选取的两所图书馆具有代表性,但可能在后续立法实施的过

程中存在更多不确定情况。因此,可以在试办期内扩大一定的试办范围,以此收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实践信息。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体系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为台湾地区一级图书馆,包括台湾图书馆和台湾公共资讯图书馆二所。第二级为市立图书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第三级为县市级图书馆,即目前的县市文化局(处)图书馆、县市立图书馆。第四级为乡镇市区图书馆,乡镇市区图书馆在行政组织隶属于乡镇市区公所管辖,但由乡镇市区所在地的县市文化局(处)图书馆负责监督辅导^[14]。现在实施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图书馆为第一级图书馆,按照四级分类可以分别选定第二、三、四级图书馆作为扩大试办区域的图书馆。根据台湾媒体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如果把试办区域扩大至台北市,补偿金或能增加2至7倍^[14]。

(5) 明确侵犯公共借阅权的责任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中没有规定侵犯该权利将有何救济途径。放眼世界,对于侵犯公共借阅权的责任有三种,分别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澳大利亚规定了侵犯公共借阅权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埃及规定了行政责任,法国则是规定了最为严重的刑事责任^{[13]74}。台湾在试办结束后进行“立法”,如果是修订“台湾图书馆法”则明确行政责任为宜,如是修订“台湾著作权法”则明确民事责任更佳。明确侵犯该权利的责任将有利于保障权利人获得补偿金。

4.2 实践层面

4.2.1 简化公共借阅补偿登记和申请流程

简化公共借阅补偿登记和申请流程是优化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当务之急。虽然细致的登记和申请流程可以有效减少权利人因未授权等问题引发的纠纷,但是同样也为权利人增加了麻烦。简化相关流程可以建立在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利用之上,台湾公共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包括HyLib(凌网)、ToRead(艾迪讯科技)等^[14],各大系统现有的借阅统计功能皆可完全支持公共借阅补偿金计算所需材料和数据。台湾公共图书馆系统在整体上已经具备且支持开展公共借阅权工作的自动化系统。因此,在信息和数据收集方面,可以简化权利人申请流程,利用图书馆设备对相关数据提前筛选,减少权利人申请时间和图书馆审核时间。

4.2.2 赋予图书馆更多争议处理权限

赋予试办图书馆更多的争议处理权限有助于改善公共借阅登记繁琐的局面。试办图书馆对于创作者、出版者及其之间的争议可以通过成立的工作小组进行审议,并将审议结果作为试办图书馆判定的参考,但是尚未明确补偿金有无实质发放等问题是否可以纳入审议范围。因此,为尽可能降低各馆的工作成本及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在后期“立法”时赋予图书馆对于主体、客体和补偿金等问题上更多的处理权限。在台湾公共图书馆第一年试办期间,就曾存在书目资料著录不全影响判定、共用ISBN增加判定难度等问题,就这些问题而言,图书馆也有义务和能力对此进行处理^[15]。

4.2.3 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公共借阅权相结合的活动

加强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公共借阅权相结合的活动有助于盘活馆藏资源。公众对于借阅图书的选择具有一定主观意愿,趣味性、连载性以及娱乐性成为选择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些趣味图书或是连载漫画等经常被大众借阅,相较之下,图书馆一些晦涩难懂的图书可能沦为无人问津的局面。一方面,出借量较少的图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出借量差异过大将会导致补偿金差异同样过大,处于高位补偿水平的创作者可因此激发动机和兴趣,而处于低位补偿水平的创作者则会因为低于制度惠益的平均水平而丧失信心。加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公共借阅权相结合的活动有助于使公众了解到自己的借阅行为不仅可以获取知识,还能帮助创作者和出版者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

5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未来协调

5.1 “立法”:由试办计划过渡至具体权利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实施可以收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立法”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试办计划尚未说明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属于何种“立法”产物,但是如果试办效果良好,公共借阅权大概率会被引入。此前台湾立法部门曾提出增订“台湾图书馆法”引入公共借阅权,笔者赞同台湾立法部门的观点,即通过“台湾著作权法”引入公共借阅权。首先,增订“台湾图书馆法”关于公共借阅权的规定。“台湾图书馆法”第7条已经揭示图书馆权利

宣言,第7(2)条也说明图书馆权利受到著作权合理使用保护的。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第7(3)条对公共借阅权进行定性。“政府应编列预算,补偿出版作品相关权利人其出版作品供公众无偿借阅的补偿,补偿对象、范围及办理方式,另以法律规定。”^{[15]10}其次,公共借阅补偿金应当交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管理。由于公共借阅权涉及补偿金等问题,交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统一管理有利于整体实施,因此,可以完善“台湾著作权法”第81条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15]106}。

按照“先试办,再‘立法’”的构建策略,我国未来在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的协调上可以仿照台湾地区“先试办,再‘立法’”的策略,最后统一管理。我国大陆地区可以从东部沿海向内陆,经济发达省份向经济欠发达省份推进,选定省属图书馆作为试点图书馆,如市级图书馆达到可供开展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也可增设为试点图书馆。试办期同样设置为三年,第一年由经济发达省份率先开展尝试,第二年由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省份展开,第三年则视情况决定是否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实施,以每一年度起止计算为一个试办年度。综合三年试办期后再视总体开展情况决定如何立法,并对适用范围和补偿金额等实施问题进行综合考量。最后,协调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对于公共借阅权的立法衔接及综合实施问题。

5.2 实践:减少繁琐的登记和申请程序

繁琐的登记和申请程序降低了创作者和出版者对于小额补偿金的申请意愿。因此,在实践中应当尽量减少事前、非必要的信息登记及申请流程。在技术保障的前提下,针对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反映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简化。第一,相同作者不同版本及不同ISBN号的情况。在认定出借作品是否属于同一作者之时,首先可以将材料递交至公共借阅权登记系统,利用馆藏系统查询是否具有该种图书,相关佐证资料的递交可以延缓至审核通过之后,以此减少登记期间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第二,减少出版者代创作者申请的登记作业。出版者需要代创作者进行登记和申请,但是出版者仅能分到三成的补偿金,减少出版者的登记作业有助于保持出版者和创作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5.3 顺应发展:由纸本客体过渡至数字客体

欧洲法院在2016年对VOB v.Stichting Leenrecht—

案的裁决肯定了电子书纳入公共借阅权客体的现实性,但前提仍是“一用户一副本(one user one copy)”及其类似的借阅模式。英国也在2017年通过《数字经济法案》(The Digital Economy Act),将英国公共借阅权的实施范围扩大至电子书和有声书^[16]。

新冠疫情加速了人们对电子书的借阅需求量,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的增长趋势明显。台湾地区在2020年电子借阅数量达到363万册,相较2019年大幅增加108万册,增幅高达42.35%^[17]。英国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图书馆在线会员人数增长了6倍之多,大众对电子书和有声读物的需求是其主要驱动力之一^[18]。大陆地区在疫情期间图书馆借阅量同样也呈上升趋势,以湖南省为例,2020年湖南图书馆数字资源访问量为145 807 945次,同比增长61.9%;网借数量达86 677册次,同比增长161.5%^[19]。技术进步使得电子书的发展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将电子书纳入公共借阅权的客体范围存在现实基础,但也有学者认为电子书按照授权的商业模式进行营销,没有给予补偿的必要^[4]。笔者认为随着阅读习惯的改变,将电子书纳入

补偿客体将会是公共借阅权发展至数字环境下的必要举措,我国在今后的公共借阅权协调时也可考虑将电子书等数字作品纳入公共借阅权的补偿范围之内。

6 结语

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三年试办计划已过大半,随着第一年试办年度的结束,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也开始注意到试办期间存在的问题:在“立法”层面,台湾地区在试办期间的公共借阅权一直恪守传统的文化政策立法模式,严格的权利主客体限制导致补偿金发放不能到位,排除了许多居于高位借阅数量的图书及作者。在实施层面,层出不穷的新情况使得原有的补偿规则需要与时俱进,同时,过于繁琐的申请和登记程序降低了权利人的申请意愿,补偿金发放与预期设想不一致。因此,通过检视台湾地区公共借阅权试办计划的规则及实践存在的问题,可为今后协调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对于公共借阅权整体立法和实施予以应对。

注释:

- ① 类似于承诺书、保证书、证明文件等,具有多个含义。
- ② 不同立法模式下的公共借阅权可以按照权利归属以及入法类型将其划分为文化政策模式、准版权模式以及版权模式。
- ③ 按照借阅次数、馆藏量、文献购置经费的固定比例等模式。

参考文献:

- [1] 陈星.邢张睿数字环境下公共借阅权问题的思考[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5):64-72.
- [2]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The IFLA Position on Public Lending Right(2016)[EB/OL].[2021-02-01].<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the-ifla-position-on-public-lending-right-2016/>.
- [3] 赵力.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新进展:以VOB v.Stichting Leenrecht案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7(2):105-112.
- [4] 章忠信.公共出借权制度之试办与未来发展刍议[J].检察新论,2020(28):2-11.
- [5] 骆平沂,廖又生.当代图书馆利用的法律问题[M].台北:台湾五南出版社,2020.
- [6] 国语日报.保障作家权益 台湾立法部门促公共出借权入法[EB/OL].[2021-05-03].https://www.mdnkids.com/search_content.asp?Serial_NO=%20111743.
- [7] 邱炯友,吴秋霞.台湾公共出借权之试办:研究者的实务观察[J].台湾出版与阅读,2021(4):42-49.
- [8] 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尊重及感谢创作出版者[EB/OL].[2021-12-31].https://www.moc.gov.tw/movie_262_3957.html.
- [9] 台湾地区通讯社.公共出借权试办首年只发了40万 出版社疾呼简化流程[EB/OL].[2021-12-22].<https://www.cna.com.tw/project/20211222-public-lending-right/>.
- [10] 台湾地区通讯社.公共出借权元旦起跑 台湾领先东亚各国[EB/OL].[2021-12-31].<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2310115.aspx>.

- [11] 联合新闻网.公共出借权出版人：诱因不大[EB/OL].[2021-02-02].<https://udn.com/news/story/6885/5223845>.
- [12] 柯皓仁.公共出借权试办计划之回顾、实践与展望[J].文讯,2022(4):48-52.
- [13] 傅文奇.公共借阅权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14] 邱炯友,曾苓莉.台湾公共出借权图书馆系统运作刍议：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之观察[EB/OL].[2021-02-11].<https://joyochiu.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html>.
- [15] 张燕琴.台湾公共图书馆试办公共出借权执行实务概述[J].台湾出版与阅读,2021(4):4-9.
- [16] 张惠彬,吴柯苇.英国公共借阅权及其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J].图书馆建设,2018(12):37-43.
- [17] 祝本尧.以出版社与数位之观点探讨公共出借权的实施现况与未来[J].台湾出版与阅读,2021(4):52-58.
- [18] The Guardian.Library ebook lending surges as UK turns to fiction during lockdown[EB/OL].[2020-10-23].<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oct/23/library-ebook-lending-surges-as-uk-turns-to-fiction-during-lockdown>.
- [19] 新湖南.湖南图书馆2020年度阅读报告新鲜出炉! [EB/OL].[2021-04-24].<https://m.voc.com.cn/xhn/news/202104/14259218.html>.

作者简介：邢张睿，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赵锦涛，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数字化。

收稿日期：2022-10-18

本文责编：郑秀花

（上接第33页）

- [4] BERGER C,BLAUTH R,BOGER D,et al.Kano's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customer defined quality[J].Center for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1993,2(4):3-36.
- [5]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Z]. 2015-12-31.
- [6] 祁兴兰.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J].图书情报工作,2018(16):111-119.
- [7] ULLMAN J,BENTLER P.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M].NewYork:John Wiley&Sons Inc.,2003:297-358.
- [8] KURT M,HANS H.How to mak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by integrating Kano's model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to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J].Technovation,1998,18(1):25-38.
- [9] GERBEN S,ESSENS P,WAHLSTROM M,et al.Managing risk and resilie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4):971-980.

作者简介：杨敏，硕士，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2022-09-23

本文责编：郑秀花

· 工作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述略*

黄秀娟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迅速发展,在推动文献资源建设、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深入推进时期、新时代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等成立以来,图书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迈向新的台阶。未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应构建绩效评估体系、与国家各类文化合作政策深度融合、积极开展数字出版物交换,从而提高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质量。

关键词: 改革开放;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

中图分类号: G259.26; G253.1

文献标识码: A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ry resourc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eriod of the in-depth promotion, and the new era. Especially sinc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Library Alliance, libraries have given full play to their role as a bridg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to a new level. In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should build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deeply integrate with various 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policies, and actively carry out digital publication exchang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图书馆作为国家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具有服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因此,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急

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补充馆藏的有效途径之一,尤其是在经费紧张、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出版物国际交换对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外文文献资源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图书馆间合作交往日益频繁。图书馆发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自身的优势,与国外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单位之间相互交换出版物,实现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也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出版物交换赠送与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BTQ038)的阶段性成果。

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1]。1979年以后,图书馆国际书刊交换得到了长足发展^[2]。所以,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出版物国际交换的优势,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找准定位、确定方向,从之前的不计成本为主、对外文化宣传为主的交换原则逐步转化为“以我所有、换我所需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既要注重自身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又要做好对外文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做到灵活、务实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根据政策方针的变化一直在不断调整、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所以,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历史进行梳理,实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和规律,发现缺点和不足,不仅对还原、回顾历史有价值,对当下及未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通过知网进行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对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事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学术视角:

一是域外文献资源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需求增加,现有的文献已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图书馆域外文献资源建设路径急需向跨机构合作、多元化共建、各方优势互补的模式转变。郑贵宇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协作协调组织,从单一机构建立模式向机构间合作转型,为文献资源共享提供了组织保障^[3]。马静、黄曼丽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图书馆^①的书刊国际交换工作状况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在网络环境下,电子书刊的交换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4]。

二是域内外图书情报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图书情报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人员往来、业务交流等活动愈发频繁,得益于人员交往的发展带动,交换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逐渐被重视。龚蛟腾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图书馆界国内外交往合作日益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图书馆界建立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国际联系,开展人员交换、书刊交换、资源共享等多种合作,书刊交换纳入国际交流的范畴^[2]。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国际交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拓展和深化,现在形成双向、多形式、大规模的交流合作局面。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的交流促进高校间交流合作开始活跃,从而带动双方交换工作的开展^[5]。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国际间图书情报机构的合作交流频繁,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教育界也通过人员交流、举办会议、合作教学的方式携手合作推动学科教育发展,海峡两岸各高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物国际交换事业的发展,现有成果在外文文献资源建设路径和图书馆国际交流交往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中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但上述研究的主体视角仍以文献资源建设和国际合作为核心,出版物国际交换作为论证过程中的案例,并未得到系统性、全景化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物国际交换进行专题式的研究,进而梳理得出相关实践的特点和经验,对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径创新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可分为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末)、深入推进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2012年)和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

3.1 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国家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北京图书馆外文文献采访工作却面临资源缺乏、渠道不畅的局面。一方面,国家财政拨款给北京图书馆可用于进口文献的外汇额度十分紧张;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伊始,国家虽然成立了专项贸易进出口图书总公司,但图书进出口工作与其他物资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进口从渠道到模式均处在摸索阶段。因此,为了使馆藏外文资源的规模和数量尽量与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社会生产、生活及信息的需求相匹配,北京图书馆决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为我国图书馆出版物国际

交换工作带来了机遇。一是对外开放,外交工作取得了突破,为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78—1992年,我国同4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7]。二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为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及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的保障。1979年,国务院文件指出,对外进行书刊交换是与国外进行科技交流的一种形式,也是了解国外科技发展动向和水平的渠道之一,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8]。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图书馆工作汇报纲领》,它对恢复和兴办图书馆等产生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9]。

北京图书馆主动与需求侧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后通过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同交换单位进行出版物交换,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一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例如:1980年5月4日,北京图书馆与德意志国家图书馆交换《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资料汇编第一卷》,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服务;1985年1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交换资料一份,为国家档案局服务;1990年5月14日,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交换一种书籍,以满足文献采访的需求。二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例如:1978年2月15日,北京图书馆同英国图书馆亚非文献采访部联系,交换内蒙古集宁区医院需要的资料一份;1978年9月11日,北京图书馆为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服务,为其交换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校刊、年报;1983年3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联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交换所需资料一份。

北京图书馆实行“节流”与“开源”齐头并进的举措:一方面,将有限的进口文献的外汇额度用实用细;另一方面,利用业务平台提高创汇能力,为我国获取宝贵的外汇资源。1983年9月19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动要求将交换给贵馆的部分中文书装订成硬皮本,但我国当时出版业刚刚恢复发展,装订水平、纸张质量等无法达到精装水平,所以北京图书馆自主解决问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硬皮本书籍,其中加工费每本2美元^②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承担,每本书增加的邮费0.5美元由北京图书馆承担。

1978—1992年,北京图书馆与49个国家和地区的308家单位建立了出版物交换关系,交换到馆图书大约64 850种,期刊每年平均3 000多种。

3.2 深入推进时期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动文化建设。1998年12月20日,江泽民主席到北京图书馆视察,指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强调大兴学习之风^[10]。这对我国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高度重视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建设,财政拨款给北京图书馆的经费额度逐年提高,但外文文献资源的建设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此北京图书馆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积极推进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开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2.1 共建共享趋势下的交流与融合

20世纪90年代后,共建共享成为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潮和新方向。1996年8月,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其副主题之一就是“资源共享:地区、国家和国际都普遍关注的问题”。出版物国际交换是共建共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跨国际、跨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国家图书馆逐步深入推进与国外图书情报机构的出版物交换关系,实现文献信息的共建共享。2008年2月,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率团访问埃及和以色列。在埃及期间,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开罗大学图书馆分别就图书互换和信息共享等方面进行交流并达成意向^[11]。2012年3月,国家图书馆与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文献交换、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积极合作。至此,国家图书馆与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这三家公共图书馆都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了两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2]50}。

3.2.2 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传统图书馆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以及读者获取文献的需求,图书馆急需向数字化转型。面对新变化、新挑战,国家图书馆采取新措施、新方法,打破传统的工作方式,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发展。

一方面是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形式的转变。2011年,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平台正式使用,实现了网上自助选书,由原来的点对点的服务方式转变为点对面的服务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该平台的特点:

一是交换书目滚动呈现。平台上的书目会定期进行更新,更新后最先上传的书目被自动替换的同时还会向交换单位发送邮件,通知对方新的交换目录已经上传可以进行采选。每期上传的交换目录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包括部分重要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获得国内出版奖项的出版物,如获得“文津图书奖”的图书以及政府出版物等。二是按需分配原则。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图书馆经费逐渐减少,双方的出版物交换量已无法达到平衡,国家图书馆寄出的文献量远多于收到的量,但为了保证一些重点图书馆的中文重要文献的入藏和宣传推广我国优秀出版物,国家图书馆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采取相对灵活的按需交换原则进行额度分配,不再强调双方数量上的对等^[13]。三是完备的检索功能。国家图书馆用于交换的出版物都是财政专项经费购买的新书,对方在检索交换目录时无法获取到书目信息的MARC格式数据,因此国家图书馆事先对相关字段进行录入,交换单位可以输入检索词,如书名、ISBN、作者、出版社等进行检索,查询到所需文献的数据格式。

另一方面是出版物交换内容的变化。数字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的交换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010年国家图书馆修订《国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时,进一步扩大采选范围,将数字资源正式纳入馆藏;进一步拓宽文献采选渠道,引入网络信息采集和数字化转换等方式;还对数字资源采选及网络信息采集、数字化转换等采选方式作了相应规定^[14]。目前,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已经将其拥有版权的部分电子期刊向交换单位提供访问权限^[1];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因为经费缩减,无力承担国际邮费,因此不再提供纸本期刊的交换,而是向交换单位定期提供电子期刊^[15]。

国家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切实推动了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深入开展,仅2012年一年就交换到各类型文献共计6 942种15 264册件,其中图书4 757种4 793册;期刊1 481种8 744册;缩微平片561种1 401张等^{[12][208]}。

3.3 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愈加紧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极大地增进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及文明互鉴。国家图书馆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的倡议,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加强合作,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2014年6月,国家图书馆与伊朗国家图书与档案馆、塔吉克斯坦国家图书馆分别签署中伊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塔合作协议书,此次协议的签署为双方文献交换等领域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16];2015年9月,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率代表团访问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与对方国家图书馆加强合作,共建共享“丝路文化”,并与阿塞拜疆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在文献交换等领域开展合作^[17]。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国家图书馆倡议成立的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通过联盟缔约的方式,发挥图书馆在文化传播中的纽带作用,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促进图书馆间在文献交换等领域的合作,这使得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由以往交换单位之间点对点的工作模式转变为有组织、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模式,提高了双方合作的稳定性。2019年,国家图书馆分别与伊朗德黑兰大学图书馆、缅甸国家图书馆、土耳其总统府图书馆、塞舌尔国家图书馆建立出版物交换关系。双方重点交换各自所需的政府出版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文献、中国学、对象国研究文献^[18]。

新时代,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发展稳中有进,推动域外文献资源建设与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综合平衡发展,一方面在利用业务优势增进与已有交换单位交流合作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交换合作机构,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加强国家图书馆的域外文献资源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出版物交换单位间已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以及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提供我国的优秀出版物,发挥国家图书馆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一是海外供给侧。海外合作单位因疫情的影响导致间歇性闭馆,交换出版物积压不能及时寄出;由于预算削减,部分图书情报机构可用于交换业务的经费短缺,文献购置量逐渐下降,使得交换业务不得不暂时中断甚至停顿。二是流通渠道。为避免疫情通过流通渠道扩散,海关加强了防疫措施,邮件要静置消杀后才可以清关,这就导致大量包裹在港口积压,不能及时运送。整个流通环节总体时间延长、成本增加,甚至有时由于各环节未

能有效衔接,造成部分邮件丢失的现象发生,大大降低了海关清关的时效性、连续性。反观我国的抗疫工作,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动态清零”“联防联控”,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使得我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小,经济率先复苏,邮路恢复畅通,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正常开展,逐渐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新常态下,海外图书情报机构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恢复需要时间,短期内双方的出版物交换量可能存在不平衡,但从中长期来看,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仍然向好发展,所以要全面地分析当下局势,综合研判,不能过度强调双方出版物交换数量上的对等,而是要维系好双方的友好合作,保持长期稳定的文化交流,充分发挥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职能。

4 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发展建议

4.1 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国家财政每年拨付相应的经费用于出版物国际交换,促进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以及双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了使这笔经费功能最大化,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应构建负责任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对国家财政负责。实际工作中,要根据情况灵活、合理分配经费,精打细算,将有限的经费用实用细,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对合作单位负责。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合作单位涉及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类型,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所以要及时、全面了解对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做到需求与供给相匹配,促进图书馆真正实现“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实现阮冈纳赞所说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19]。

为了将负责任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效用,更好地提高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效能,就要改变以往粗放型、大水漫灌式的工作模式,向节约型、精细化方向转变,根据实际业务特点建立一套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估体系,并贯穿于整个实际工作当中,将其切实落到实处,同时定期对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定量观察,发现不足,提出改进方案,改

进工作模式,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实现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科学化、有序化管理^[20]。

4.2 与国家各类文化合作政策深度融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图书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相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国际图书馆间的交流平台相继建立,比如“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图书馆联盟”等,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图书馆联合体^[21]。这些文化合作政策加强了国际间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双方在业务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为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虽然各图书情报机构间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出版物交换关系,但现在这项工作仍是各自为营、自我封闭的状态,各机构间相互缺乏联系和统一的管理。为了改变这种脱节的状态,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应与国家的文化合作政策深度融合,借助战略合作协议、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等合作平台,扩大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业务范围,带动其成为落实落地的举措,随之逐步拓宽成巨大的网状结构,建立国际性的出版物交换中心,使之成为有规模、有组织、统一管理的机构,成为国际间图书情报机构合作的品牌名片,实现国际间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文化互通互融。

4.3 积极开展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数字出版物在传递过程中的诸多优势以及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使传统的出版物形式逐渐转化为数字形态。新形势下,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创新新的交换模式,利用数字平台的技术,实现交换载体、交换技术等全方位的转型,以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变化,从而提高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质量^[13]。

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要真正实现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在处理好版权保护、安全防护、数字资源保存等问题的前提下,首先各图书情报机构间应建立国际统一标准,避免各自为政;其次各图书情报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建立相关规则,提高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效率;最后应建立数字出版物国际联盟体,为合作单位间提供数字出版物交换的平台。

注释:

- ①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为1909年成立的京师图书馆,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51年6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文所述的北京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的机构沿革名称保持一致,不再重复说明。
- ②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1973年2月至1985年12月:1983年平均汇价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1.975 7元(<http://changsha.pbc.gov.cn/changsha/130060/2927600/130064/2360799/index.html>)。

参考文献:

- [1] 李伟,马静.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出版物国际交换策略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5(3):169,171.
- [2] 龚蛟腾.改革开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与开拓(续)[J].图书馆,2015(3):35-36.
- [3] 郑贵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的回顾与展望[J].图书与情报,1997(2):62.
- [4] 马静,黄曼丽.国家图书馆书刊国际交换发展史浅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90,122.
- [5] 温阳,倪萍,肖希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国际交流的回顾与前瞻[J].图书与情报,2019(5):30,36.
- [6] 温阳,卢彤,肖希明.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图书馆学教育交流[J].图书馆论坛,2020,40(8):34,40.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EB/OL].[2022-08-20].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200812/t20081221_9284708.shtml.
- [8] 刘兹恒,朱荀.当代中国图书馆的国际交流(1949-2009)[J].图书馆杂志,2010,29(1):5.
- [9] 潘燕桃.《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及其历史作用与重要影响:纪念《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通过30周年[J].图书馆论坛,2010,30(6):107.
- [10] 肖东发.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
- [11]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2009[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21.
- [12]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年鉴:2013[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3] 黄亮,李伟.中美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比较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5,35(5):129-130.
- [14] 毛雅君.国家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5):15.
- [15] 刘洁,李伟.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困扰与对策[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6):120.
- [16]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年鉴:2015[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193.
- [17]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年鉴:2016[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227-228.
- [18]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年鉴:2020[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76.
- [19]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夏云,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177,243.
- [20] 李伟,徐茁.出版物国际交换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与描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6):31.
- [21] 饶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经验与转型发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5):19.

作者简介:黄秀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国际交流与合作。

收稿日期:2022-09-29

本文责编:孙晓清

· 工作研究 ·

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实践探析

——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张希慧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623)

摘要: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是顺应时代发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全力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阐述在新形势下广州图书馆创新公共交流空间社会共治的思路, 从治理主体、理念、制度、效果等方面展开分析, 总结其实践管理的特点, 探讨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中实现社会共治的有效路径,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交流空间; 社会共治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in Public Library Communication Space: Taking Guangzhou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novat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Taking the Guangzhou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new path of public library communication space to achieve social co-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governance subject, concept, system and effect, and summari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ractical management.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paths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achieve social co-governance in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The goal is to create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management and sharing,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ommunication space; social co-governance

1 引言

随着现代图书馆的不断转型发展, 图书馆的空间服务理论逐步被业界及大众所认同及接纳。在国内新一轮的公共图书馆新馆建设浪潮后, 图书馆交流空间的服务功能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公共图书馆社会角色转变的多方面价值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肯定。同时, 公众亦对图书馆空间管理, 特别是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益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决定了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公众的关联度极高。作为“社会的连接器”, 公共图书馆如何根据自身的空间资源情况, 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规范的公共空间服务及使用政策, 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面交流的需要,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国内公共空间资源相对紧缺且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发挥社会治理效能, 创新公共服务的管理理念, 优化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资源管理, 打造多元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不失为一条高效且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1];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2],这也为广东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亦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3]。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何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关键的一步。具体到图书馆行业,2015年5月起施行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第一章第八条里提到,“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共图书馆建立和运行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理事会等法人治理机构”^[4]。2018年10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章第二十三条亦规定,“国家推动公共图书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参与管理”^[5]。可见,推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完善公共文化治理体制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公共图书馆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能。

针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广州图书馆积极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途径新方法。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以“实际行动”回答好“共建”何以达成、“共治”怎样有效、“共享”如何实现这三方面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总结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管理的社会共治实践经验,为其他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管理和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2 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的研究现状

截至2022年10月26日,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主题词SU=‘公共图书馆’and‘社会治理’为表达式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相关记录30条,通过筛选和整理,最终得到匹配文献18条。笔者又以主题词SU=‘公共图书馆’and‘社会共治’为表达式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相关记录4条,通过筛选最终得到匹配文献3条。学者专家主要从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文化治理等角度

开展了相关研究,如王飞娟等人就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进行调查,从政策引导、供给主体结构、服务实践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策略^[6];刘艳从顶层设计、表达机制、城乡一体等方面对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图书馆转型提出建议,倡导构建社会治理视阈下的全民阅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7]。由上可见,目前业界学界关于图书馆社会共治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该领域研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今社会赋予图书馆汇聚世界智慧、增进社会交流的职能,公共图书馆应当强化其公共交流空间的功能,优化空间资源利用,扩大社会参与,为公众及社会层面创造更加丰富的交流机会。作为图书馆的“主人翁”,社会力量更应积极参与到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的建设与管理当中。笔者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治理角度,以广州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的实践为例,探索公共图书馆共治路径,冀此能够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共治共建提供裨益,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3 广州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实践

3.1 背景

广州图书馆坐落于广州的新城市中心、有“城市客厅”美誉的花城广场,具有便利的区位条件;总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图书馆之一;无障碍设计、适合交流的各种不同功能、大小、风格形态的空间可以满足公众不同层次的交流需求。凭借优越的空间资源优势,日均接待公众访问2.7万人次,创造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纪录。同时,广州图书馆亦积极策划丰富多彩的讲座报告会、读者培训、展览等阅读推广活动,形成传统服务与交流服务并重的格局。近年来,广州图书馆举办交流活动的数量及活动参与人次年年攀升(见表1),服务效益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

广州图书馆举办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主要集中在负一层的报告厅、展览厅和交流培训室等,场地使用分为三种类型,即本馆自用、与社会合作及对外出租,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服务主体。近年来,在交流活动举办频率和活动参与人数逐年增多、活动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广州图书馆“有限”的公共交流空间资源就显得十分“抢手”了,时常会出现活

表1 广州图书馆2017—2021年交流活动情况统计表

年份	展览		讲座		培训		其他活动		合计		合作伙伴 数量/个
	场次	人次/万人	场次	人次/万人	场次	人次/万人	场次	人次/万人	场次	人次/万人	
2017	101	156.09	311	8.5	974	2.50	1 245	17.79	2 631	184.9	171
2018	112	201.98	275	7.22	871	2.88	2 530	15.22	3 788	227.3	190
2019	137	182.68	648	12.83	759	2.44	2 816	13.59	4 360	211.5	288
2020	79	56.75	147	76.95	125	38.38	2 380	251.73	2 731	1 116.4	262
2021	127	107.40	153	64.09	797	4.51	2 592	53.29	4 029	1 285.74	309

动场地预约不上或活动“撞期”的情况。以广州图书馆负一层的展览厅为例。广州图书馆负一层有大、小两个展览厅,分别约为630平方米和330平方米,能满足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展览举办。按照平均每两周为一个展期,全年展览不间断举办的情况估算,两个展览厅每年最大限度可举办展览48场。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展览场地的使用申请每年逾60场,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除此之外,广州图书馆其他的公共交流空间,如报告厅、交流培训室等活动场地亦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决策、优化公共交流空间的资源及结构配置,择优举办各类交流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优质、最专业的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就成为了广州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

3.2.1 成立目的

公共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恰逢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社会共治共建的契机,广州图书馆着眼于维护公众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于2018年开始筹划成立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希望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建设专家咨询平台,进一步甄选和引入优质的社会资源,规范广州图书馆交流场地、空间、设施设备等公共资源的利用,完善公共交流平台建设,提升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活动专业化管理水平及社会治理水平,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责。

3.2.2 委员会职责及人员构成

广州图书馆通过馆际调研、收集专家及读者意见,经多次会议研究,对成立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认为实施条件成熟,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利于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于2018年12月实施《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

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章程(试行)》,建立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开启探索利用社会专业力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众利用图书馆公共交流资源的管理机制。

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是评审社会主体(机构或个人)向广州图书馆提交的免费使用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举办与公共图书馆功能和服务相关的活动申请,从馆外人士的角度为广州图书馆提供专业、中立、公平、公正的使用建议。考虑到公平性和专业性并重,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每两年为一届任期,委员由热心公益事业,公道正派,具备较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且具有高级职称或在其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5名代表组成(见图1),专业需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领域,及人文历史、科学普及、专业策展等领域,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定位相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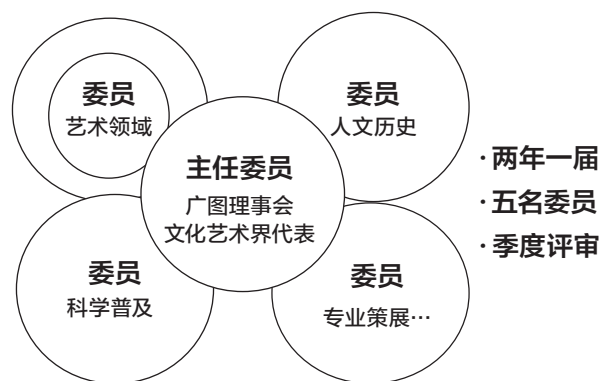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专家咨询委员会人员构成图

3.2.3 评审标准及流程

非广州图书馆组织策划并申请无偿使用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举办的展览、讲座、培训、阅读推广等活动均纳入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评审范围。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

委员会每季度组织一次评审会议,从活动的合法性、公益性、准入标准、活动效益、活动影响力和目标群体六大维度(见图2)对收集到的活动申请方案及活动信息进行评审,形成委员会统一意见后供广州图书馆参考。审批通过的活动将由广州图书馆统筹安排场地档期供申请方免费使用。



图2 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标准

合法性和公益性是活动通过评审的最基本条件,委员会主要考察的是申请的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各方面安全、信息等政策要求以及活动是否与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相关,在不影响用户对图书馆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对公众免费开放。其次是评审活动规模、策划组织、邀请嘉宾、拟展示作品等方面是否达到在广州图书馆举办的水准。如同一时段内有多个主体申请的,则在通过准入条件的基础上,对特殊群体、慈善组织等目标群体及绩效优先的活动倾斜。

活动通过审批后,由广州图书馆与合作方签订场地使用协议,免费向其提供活动场地。在使用过程中,图书馆有权向合作方了解活动的管理及使用情况,根据合作实施的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调整具体安排。活动举办后,合作方需要将有关活动现场的视频、照片、参与人数、活动报道、读者满意度、经

费投入等材料反馈给图书馆,由图书馆统一纳入统计数据及跟踪。

4 广州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的特点

2018年广州图书馆成立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之后,在交流空间的管理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管理模式由图书馆自治向社会多元参与转变(见表2),成为了推动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力实践。

4.1 由机构治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新时代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当今我国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的管理制约因素复杂,涉及的范围广泛,建设和管理均要以专业化为前提、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建立一套与图书馆适配度高、有效可行、透明及公众参与度高的管理制度尤为重要。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完美诠释了如何有效实现交流空间的“社会共治”。图书馆不再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而是将“话语权”交给了各个领域的“馆外专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行业标准、生活体验、文化感受、社会需求等层面出发,参与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使用决策,有效保障了社会公众享有公平、公开使用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权利,强化了公共图书馆为公众提供交流机遇的职能。

4.2 由机构管理向专业、透明、规范管理提升

既然公共图书馆的交流空间是展开社会交往、培育人文氛围的必要场所,与公众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等有着共同且深层的关联,那么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的治理就必须体现其合理性及专业性,既要权衡空间资本中的公益部分,亦要保障公众享有优质公共空间服务的权利。以展览厅的利用情况为例(见图3),自从2018年成立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后,广州图书馆的展览主题更加丰富,策展规划更为科学合理,展览质量进一步提升,这离不开公共交流服务

表2 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治理模式对比

年份	治理主体	治理理念	治理目标	管理制度	治理效果
2018年前	广州图书馆	机构治理	开放、管理	机构管理	普遍实现交流功能
2018年至今	广州图书馆、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公众等多元主体	共治、善治	推动、提升	公开、透明、规范	提升空间利用合理性、优化使用结构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努力。委员会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行业标准出发,图书馆再结合其行业特点,在双重专业优势的加持下,不仅能保障多元的社会主体享有图书馆公共空间资源的权利,更有助于系统梳理、整合和优化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的资源结构,完善和规范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空间的使用及管理政策,助力打造具有图书馆特色和人文品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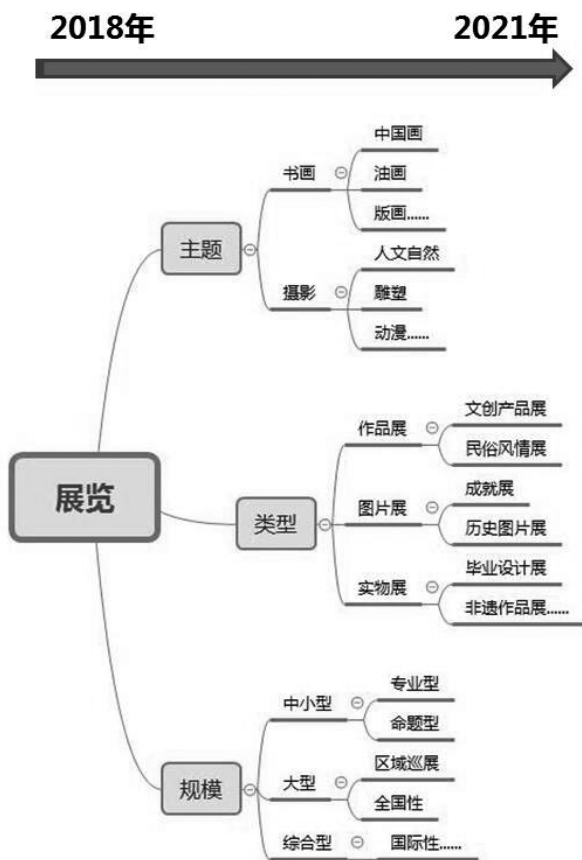


图3 广州图书馆展厅利用情况

4.3 由普遍实现交流功能向优化空间资源利用转变

既然广州图书馆赋予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人翁”的权利,那么委员会亦以“自家人”的身份为广州图书馆的公共交流活动严格把关,筛选具创意的活动、优质的社会资源和富潜力的合作伙伴,以期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经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的活动无论从活动质量、服务绩效到活动影响力等方面均较有保障,交流服务结构得以优化,社会合作及投入产生良性循环的效果。以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为例,笔者对比了广州图书馆2018年和2019年的公共交流服务数据,发现广州图书馆2019年

与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的交流活动场次达1 906场,较2018年有所增加,合作伙伴亦从2018年的190个增加到288个,合作类型丰富、范围广泛,涉及本土文化、多元文化、都市文化、重点群体服务等。经对合作伙伴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的不完全折算统计,2019年广州图书馆社会合作共投入约1 908.9万元经费,约占年度总经费的7.6%,相当于广州图书馆活动经费每投入1元,带动社会投入4.5元,充分体现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在丰富广州图书馆交流活动主体、优化交流活动结构、实现公共交流平台共建共享的作用。

5 对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社会共治的思考

5.1 创新管理理念,提升空间资源保障能力

从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实践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交流空间的建设和打造多元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不失为一条有效且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我们不妨将这种有效的社会共治管理模式拓展到如图书馆交流空间系统规划、主题空间建设、交流空间的资源化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利用社会力量在专业角度、行业标准、生活体验、文化感受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图书馆空间利用的合理性和用户的交流体验,提高及优化图书馆在公共空间资源服务的保障能力。

5.2 细化管理准则,进一步规范空间管理及使用

公共图书馆无论以何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交流空间的使用服务,均应向公众明晰交流空间的使用政策,做好空间管理工作。结合广州图书馆公共交流服务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实践案例,笔者认为图书馆在交流活动准入标准、空间使用指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除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交流活动的审核之外,不妨进一步结合图书馆的行业特点,细化交流活动在各领域的准入标准、实施细则,如艺术作品的质量水平、活动音量控制、安全管理、绩效评价等标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共交流空间的使用及管理政策。

5.3 深化空间资源,实现空间服务升级

在深化管理和拓展公共图书馆交流空间资源的过程中,图书馆应突破自身原有的资源、人员、技术等方面的局限,积极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开展协同

合作,不仅要着力对空间资源的优化管理,更要对空间资源进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深入开发和共享,如与政府机关、专业协会、文化企业及文化志愿者等合作,共同对展览厅、主题图书馆等多元交流空间进行改造,不断创新空间改造的方式,持续提升图书馆交流空间的服务质量和效益。

5.4 明确社会治理职责,完善空间服务体系构建

在图书馆界,采用馆际协同模式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智慧数字平台建设等的成功案例多不胜数。我们不妨借鉴广州图书馆在公共交流空间实现社会共治的成功经验,将其拓宽至“图书馆之城”或公共图书馆联盟合作体系的空间资源建设当中,创新管理方式,扩大社会参与,发挥各馆空间资源优势的同时明确社会治理职责,加强统筹规划布局,形成多元开

放的图书馆交流空间服务体系,建立社会融合发展的文化大格局,全面提升“图书馆之城”公共空间服务效能。

6 结语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的连接器”,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在人际交流、社会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创新图书馆空间服务及管理模式是实现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的必要途径。只有坚持树立社会治理、融合发展的理念,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到图书馆空间资源建设当中,才能有效实现政府主导、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提升图书馆空间资源的服务价值与效能。

参考文献:

- [1]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EB/OL].(2018-04-18)[2022-08-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8067746592720256&wfr=spider&for=pc>.
- [2] 广东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EB/OL].(2022-04-22)[2022-08-01].https://www.gdzz.gov.cn/zdzt/ddh/dlfjzwn/content/mpost_15476.html.
- [3]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EB/OL].(2019-11-09)[2022-08-0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695779905486553&wfr=spider&for=pc>.
-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EB/OL].(2022-02-24)[2022-08-01].http://www.gd.gov.cn/zwgk/wjk/zcfzk/content/post_2531782.html.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18-11-05)[2022-07-19].<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ec.shtml>.
- [6] 王飞娟.基于社会共治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探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42(6):110-113.
- [7] 刘艳.文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图书馆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2):29-34.

作者简介: 张希慧,广州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2-10-27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阅读文化 ·

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邓李君¹ 杨文建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重庆 400031)

(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 重庆 400067)

摘要: 数字阅读素养是大学生在数字时代完成知识建构的关键之一。虽然大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字阅读素养,但纷杂的数字环境对大学生提升数字阅读素养的影响也愈加明显与多样。文章通过解析大学生数字阅读现状,分析影响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因素,从规范数字阅读环境、内容、途径,以及加强技术保障和推广数字阅读教育五个角度入手,构建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提升策略,意在为相关研究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学生; 数字阅读素养; 数字环境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bstract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is one of the keys to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mix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Although they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diverse.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read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from five perspectives: regulating the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content, and channel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promoting digital reading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digital environment

针对数字化对阅读带来的影响,早在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辛(R. Engelsing)提出“阅读革命”概念时,就引发了社会对“阅读危机”的反思,且随着数字环境便利性、多源性、丰富性的大幅度提升,在增强个体阅读体验的同时,也逐渐使大学生将阅读从获取知识为主的认知过程转为掺杂娱乐目的的多目的行为。面对信息量剧增的数字环境,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认清数字环境繁荣表象下对个体阅读素养的负面影响,如何治理数字阅读环境并提升大学生的数

字阅读能力,是实现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

1 大学生数字阅读现状

当代大学生具有对数字阅读较强的亲和力,在接受网络新鲜事物、面对信息传播方式转变、以及适应阅读消费等问题上具有优势。但在多种多样的网络资源和海量信息内容的冲击下,我国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行为也表现出如下特征。

*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数字时代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教育现状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021-GX-359)的成果之一。

1.1 信息伦理认识到位

当前,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信息伦理意识,能够基本遵循网络的管理要求,具有较强的网络安全和规范意识,尤其对于涉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版权问题的数字内容普遍具有清晰的认识^[1];特别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大学生普遍具有相对较强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但少部分大学生还是会出现信息伦理失范问题^[2]。具体表现为:部分大学生遵守伦理规范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后续需要加强培养并规范大学生的数字化阅读行为^[3]。

1.2 数字阅读能力较强

当代大学生对数字设备的操作具有优势,较为熟悉常见数字阅读设备的操作方法。具体表现为:基本能熟练操作计算机、智能手机、KINDLE、PAD等数字阅读设备,其中利用智能手机和PAD进行阅读是大学生常用的方式,对常见数字内容格式如PDF、CAJ、DOC等的利用较为熟悉^[4]。同时,据研究,大学生群体的同伴阅读形式,能够促进团体和个体阅读能力的整体提升,这也是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较强的原因之一^[5]。

1.3 数字阅读意识较强

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与生活环境,其基本上对数字阅读较为认可,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数字阅读意识,并能够基本了解数字阅读与纸媒阅读之间的效果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数字阅读与纸媒阅读的选择上,大多数大学生会倾向于数字阅读,尤其是在深度研读、科学研究、论文写作方面,普遍倾向于使用数字阅读方式^[6]。

1.4 基本认可付费阅读

作为数字阅读的伴生模式,付费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7]。但总体上,由于大学生群体尚未实现经济独立,其付费阅读整体比例和能力还不高。具体表现为:有付费阅读经历的大学生超半数,付费行为频率也与大学生自身的日常消费能力密切相关,同时女性略高于男性^[8]。在付费动机上,超半数学生愿意为学术内容付费,版权意识较强,但由于消费能力的影响,其对盗版内容也体现出较低的抵制能力^[9]。

1.5 网络沉迷倾向突出

在教学节奏、教学形式、作业内容与高中环境具有巨大差异的大学环境中,由于学校对个人学习行为

的约束降低,大学生群体出现了数字阅读娱乐化倾向,网络沉迷现象明显,具体表现为:大学生数字阅读的内容首选从高到低依次为网络资讯、小说、电子邮件,首选专业知识阅读的个体占比不到1/4^[10]。

1.6 明显依赖网络搜索

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能使大学生从纷杂的资源中找到所需的知识点,省去了传统阅读模式下的研习、思考和辨别的过程,省时省力,但大学生也表现出明显依赖网络搜索的问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1年末,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达8.29亿,较2020年增长5 908万,搜索引擎用户占网民整体的80.3%,搜索依赖明显;同时,大部分大学生都主要依赖搜索引擎获取知识信息,创新能力较低^[11]。

1.7 缺乏阅读计划且动机粗浅

当代大学生仍然缺乏明显的阅读计划,除作业和项目研究等需求外,大学生数字阅读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基于休闲娱乐和个人兴趣爱好,非课业需求诱发的学习动机较少^[12];同时,其阅读计划即时目标、短期目标多,中长期阅读计划少,且缺乏一定的自控能力^[5]。

1.8 阅读效能相对不高

相较于社会公众,大学生阅读信念感较强^[13],且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学习能力相对较强。但由于网络环境的多元化和强诱导性(弹窗、背景、链接、信息推送等),大学生普遍阅读意识强但阅读效能不高。尤其对低年级大学生而言,具体表现为对专业数据库、网络资源平台的数字阅读工具不够熟悉,阅读效能、学习效率不高^[14]。

1.9 习惯于浅阅读

由于数字阅读的便捷性以及网络媒体的“大数据杀熟”技术的营销,大学生普遍习惯于“快餐式”浅阅读,随意跳转、求新求快求多、多读少思现象明显。具体表现为过半数大学生只阅读最为重要的内容,习惯于灌输式、投喂式信息推送方式,只有两成的大学生会选择深入阅读和辩证思考^[15]。

2 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影响因素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

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9.6%,较2020年增长0.2%,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国民获取信息、知识的重要方式^[16]。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行为表现出对数字阅读介质极大的依赖性,偏向于通过搜索引擎查找主观认为最为接近阅读目的的内容,体现出浅阅读多、功利性强,以及在数字环境中自控能力弱等问题^[17]。究其原因,除了数字阅读态度与意向、数字阅读能力基础等主观因素,数字内容的信息网状组织、知识多源链接、大量的网络噪音和非受控信息,以及数字环境下文本内容没有固定边界等因素^[18]导致的数字阅读环境治理困难,也是影响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重要因素。

2.1 数字阅读态度与意向

阅读态度能够明显影响个体的阅读能力、认知与理解,且阅读态度与个体数字阅读效能感呈正相关关系^[19],具体表现为阅读态度影响阅读活动开展、阅读成绩高低^[20]。虽然数字阅读具有碎片化、随意性大、用户易沉迷等不利因素,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电子书的可检索、跳转和内容上的强关联等特性能够帮助学生端正阅读态度和提升阅读理解能力^[21],但前提是个体能够沿着数字链接理性阅读。其概念基础源于Ajzen I等人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体的态度、主观规范会直接决定个体行为意向及其实施^[22]。结合理性行为理论,产生阅读行为的基础在于个体基于解决问题的预期所形成的阅读目标。对于阅读态度,Broeder P等人指出,积极的阅读态度会诱发更强烈阅读意向从而产生阅读行为,个体也会基于阅读目的产生更高的阅读频率^[23]。同时,主观上对阅读内容的评估、比较以及实施策略能够帮助个体更主动地调节数字阅读行为,并利于个体形成持续的阅读意愿,而持续阅读行为就是良好的数字阅读素养的外显形式,能够与阅读态度共同影响个体的数字阅读成效。但在数字阅读环境下产生的阅读行为的目标中,以娱乐、休闲等为目标的阅读需求比例较传统阅读明显偏高。

2.2 数字阅读能力基础

2.2.1 信息搜集与获取能力

对大学生而言,从数字网络环境中获取知识信息,搜索、评估、整合、比较等能力是关键^[24]。但这些能力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知识传递获得,需要大学生在

不断的信息检索、网络应用和数字环境认知过程中习得。部分研究者也指出,中小学教育过程习得的数字阅读经验、检索与获取、摘录与分析理解等能力,是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的重要基础^[25],其中信息搜集与获取能力对大学生保持检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到了大学阶段,关键词与检索目标的匹配性对大学生通过数字网络完成知识建构或结果映证具有重要价值,然而通过关键词来缩小搜索范围仍非大学生普遍擅长的能力,且仍有部分大学生并不能正确解读关键词与检索目标的内涵之间的关联^[26];同时,认知、辨识、修正关键词也是影响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重要因素^[27]。

2.2.2 信息评估、辨别、推理能力

作为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是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数字阅读需要大学生群体具备扎实的评估、辨别和推理能力,既包括对自身知识体系、学科背景、资源信息与阅读目的的相关性的评估,也包括对数字内容可信度、权威性的认知^[28],以及包括对是否要进行延伸阅读的理性判断^[29]。对相关性的评估可基于所获知识与阅读目的在内容上、体系上、学科上的相近性、可用性、客观性的客观解析与总结。

大学生利用数字资源时大多也会主动进行相关性和可信度评估,尤其在进行可信度评估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利用字面一致性来进行可信度和相关性判断的几率会逐渐降低,也即是表明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多地会利用文本信息的实际意义而非是字面意思来判断其与阅读目的的关系^[30]。常规的推理与阅读理解中,信息整合与反思能力是个体能够进行评估和判断的基础,并以此进行基于个体知识与外来知识的类比和知识构建^[31];而伴随特定阅读目的的深度阅读则需要辅以精细化推理来完成知识建构^[32]。同时,部分研究者还指出,虽然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与知识整合行为并不会受到阅读介质的过多影响,但随着阅读习惯的变化,个体会更倾向于在数字环境中寻找与阅读更为接近阅读目的或包含完整答案的阅读材料,自控能力不足、辨识能力不足是导致大学生倾向于不整合信息而直接用于解读阅读目标的主要原因^[33]。

2.3 数字阅读环境治理难度

数字阅读是大学生实现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形式,而数字阅读内容是否正向、客观、公正,传播途径

是否权威并遵守信息发布规范、数字内容审核监管是否到位等,都是影响数字阅读环境客观性、公正性和正向性的主要因素。首先,对于数字阅读资源,大量的客观、真实的信息资源夹杂着部分主观、不实内容,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体而言,限于管理能力和标注速度,不能对所有的数字内容的正确性与客观性进行定性,需要将其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来进行综合判断。其次,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智能手机就能随时获取数字资源,信息发布主体也从早期网络时代的特定媒体、少数机构发展成为接入互联网的所有人。虽然国家对于网络信息发布主体有明确的规范和准入要求,但不实、虚假、噱头信息往往能形成恶性传播态势,难以全面管控信息发布主体就成为数字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最后,数字媒体以自身的技术特征和优势重建和改造文本的信息内容,个体在进行数字阅读时不得不遵循数字技术的相应规则并使用既定工具,所以数字阅读对个体的促进属于有限制的促进,在拓宽大学生阅读视野的同时又禁锢了其思维。所以,数字阅读环境对个体数字阅读素养的影响既是多方面、长时限的,也可以是非显性的,难定性、难监控和易反复等问题也导致数字环境治理难。

3 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有效治理数字阅读环境,引导大学生正确获取阅读目标、去冗去伪且少受负面因素的影响,才是提升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关键。所以对个体数字阅读素养的培养,既需要注意对于数字环境的有效监管和规范治理,还需要对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行为、意识和动机进行引导和干预,提升其规避数字阅读环境中负面因素的能力,实现多方共同促进。结合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3.1 有效治理数字阅读环境

净化数字环境、规范出版行为、整顿信息渠道等对于消解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具有根本性作用。

3.1.1 明晰数字阅读法理依据

2020年,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央网络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及国家“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都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数字阅读环境治理的重视,为治理与规范数字阅读环境提供了法理依据,也为大学生认识和利用数字阅读环境提供了基本遵循依据。

3.1.2 净化数字阅读环境

由政府、各网络平台共同加大对数字内容的实时监管,实现对当前部分网络平台发布内容审核不严、发布者身份审核不力等突出问题的治理,净化数字阅读环境。尤其要重点治理“重视阅读点击率而忽视内容健康性”的问题,避免“信息茧房、投喂式推广”问题,对新闻、论坛、博客、在线评论等舆情重点领域进行针对性管理,降低低俗内容和网络弹窗对大学生的干扰。

3.1.3 强化出版审核

强化出版审核,一是科学强化对数字出版的治理,进一步健全数字出版生态环境的监管体系,尤其针对不正当、不合规、不真实、不健康的出版行为,加强审核力度;二是加大追责力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等据实查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健全出版问责机制。

3.2 加强数字阅读内容监管

结合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养成环境,构建有效的数字阅读内容监管体系需要高校和社会协作推进。

3.2.1 拟定负面数字阅读内容分类办法

制定适合大学生群体的数字阅读内容分类体系,实现对不良生活资讯、失德失范、封建迷信、低俗庸俗、谩骂恶搞、传播他人隐私等内容的有效治理。结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限制不良网络文学、不实新闻资讯、恶意炒作信息的传播,将内容把关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借助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和群众监督消弭负面内容。

3.2.2 加强数字阅读引导

随着大学生数字阅读需求的变化,智能推送、听书、智慧阅读形式也创新性地满足了大学生的数字阅读需求,部分缓解了读者的无限需求与合理内容有限增长间的矛盾,但网络环境下的自由状态使大学生难以自控,需要实现有序引导。一方面,国家、社会、高

校都需要促进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产出;另一方面,增强数字阅读引导,对阅读意识差、辨识能力较差的个体从教师、同学的角度予以帮助。

3.2.3 加强对数字阅读内容的动态监管

一方面,结合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数字阅读素养与数字内容辨识能力的特征,吸纳大学生参与对“标题党”、趣味型、文不对题数字内容的治理,引导其积极参与社会监督与引导,提升大学生在数字阅读内容监管中的参与感与成就感。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应用,增强对网络舆情监控系统方法的应用,利用决策树、K均值聚类算法、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与K-近邻分类等方法,对虚假信息、恶意信息、信息迷雾进行甄别。

3.3 统筹管理数字阅读传播途径

3.3.1 加强对网络平台的规范管理

为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2020年底欧洲联盟发布《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并开出高达百亿欧元的罚金以遏制互联网寡头垄断文化产业侵害数字阅读环境的行为可为我国的网络平台管理提供思路。我国首先要加强对渠道平台的监管,制定具有强制性、引导性和多方审核的数字发行渠道核查机制;其次可依托“互联网+”新业态,推广数字阅读内容与优秀文学、电影、电视、体育、广播作品的融合产品,依托政府媒体打造优质数字内容推广渠道;三是加强高校与学习强国、微信、微博等优质媒体的合作,引导大学生群体使用优质媒体。

3.3.2 引导大学生群体参与数字阅读内容的生产与传递

接触数字内容生产和传递,能够加深大学生对数字阅读的理解,拓展大学生对数字阅读内容的人文艺术价值、政治思想引领意义和数字阅读传播途径、制作要求、法律规范的认识。因此,一是从高校的学术研究入手,加大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优秀文化产品、经典文学作品的展播释读,净化数字阅读环境;其次,加强对校园内负面数字阅读内容、不良作品的惩戒力度,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力度,加重处罚生产、推广、恶意传播不良作品的大学生。

3.3.3 制定数字阅读内容传播途径三层控制机制

从数字出版途径的不同层级入手,明确不同层级对于负面数字阅读内容的控制措施、效力与范围。一是从数字内容产出层面,由高校信息中心联合党委宣

传部,中断负面内容、信息迷雾、虚假信息的校内传播,遏制校园大数据杀熟和恶意推送;二是从数字内容传递层面,以平台审核、舆情监控为主要方式,在校内进行宣传、展览,引导大学生远离负面数字内容;三是从大学生自身层面,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和消极心态,引导其主动参与数字内容的传播监管,营造良好的数字阅读生态。

3.4 全面保障创新技术应用

3.4.1 加快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

当前国家大力推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新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发展,5G、VR/MR、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等创新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数字阅读的场景呈现、展示能力和知识传递速度,促进数字阅读向智能化阅读、智慧化阅读发展,这种形式也有利于消解因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不足导致的个体数字阅读效能低下的问题。

3.4.2 解决数字环境下的阅读鸿沟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阅读设备、条件、方式也不断升级。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提供计算机、PAD、KINDLE等设备,解决家庭困难学生的数字阅读困境;另一方面,可以以高校图书馆为依托,开具假期阅读书单、假期数字阅读计划,帮助大学生不断提升数字阅读素养,助力其做好中长期阅读规划。

3.4.3 构建智慧阅读空间

由高校图书馆建设智慧阅读空间,吸纳大学生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可以借鉴浙江温州布置在小区周边的“城市书房”,上海嘉定依托居民小区公共空间构建的“我嘉书房”,苏州姑苏区整合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公共馆+校园馆”整合服务等模式,大力推进面部识别、无感支付、智能选书等智慧空间技术应用,消解社会数字阅读环境中的技术薄弱因素。

3.5 增强数字阅读素养教育

大学生对数字阅读行为的全面把控能力还不够强,容易受到数字阅读负面影响,需要其不断提升自身的认识能力,将自身从沉溺网络、耽于娱乐、自我控制力不强的状态中剥离出来,不断提高数字阅读素养。

3.5.1 加强数字阅读基础能力教育

可以从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行为、意识、能力3个角度来提升个体数字阅读能力,引导大学生通过积极的阅读方式、阅读计划,形成以个体带团队、团队带班级、班级带年级的数据素养能力提升机制,使大学

生从不能全面有效辨识虚假信息与伪舆情的无可操作状态发展为可规避或者举报相关违规数字内容的主动施为。

3.5.2 拓展数字阅读素养教育形式

对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教育,可以借助类似交通安全教育中常用的负面场景教育、网络诈骗教育中的案例教育形式,对数字阅读水平不高的个体采取典型案例教育、场景教育、法制教育等形式,以“价值引导”“产品涵养”等特殊教育机制提升个体素养水平。如以案例的形式,让大学生了解“冷暴力信息的形成机制”“网络极端行为的产生机制”“网络约束失衡所导致的系列问题”等,引导大学生改进阅读行为,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与数字阅读能力。

3.5.3 开展数字阅读专项推广

群体行为的感召力和带动力是能够对大学生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并促使能效仿的主要原因。可以借用当前国家对阅读行为的大力促进和推广形式,效仿“中华诗词大会”“阅读推广会”“读书沙龙”等方式开展数字阅读推广;利用校园网络等大学生常用网络平台,发布提醒信息,引导大学生正确利用数字资源。如借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和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开发的数字阅读游戏“阅读树”,利用一套精心设计的积分墙装置,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数字阅读价值观。

3.5.4 着力提升大学生适应智能阅读的能力

随着创新技术的融入,语音朗读、自然语言转译、智能咨询机器人等也不断出现,在提升了大学生

数字阅读的“速度”和“进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大学生对数字内容的辨识、理解和系统思考,且导致大学生习惯于数字阅读平台的推荐。所以,引导其适应数字阅读技术的发展、加强自我约束,对发展大学生的数字阅读素养、规避负面问题仍有积极意义。同时,大学生个体还应当在快速接受数字阅读内容所涵盖的知识内容时,强化自身的批判意识。

3.5.5 加强评估、辨别、推理能力教育

针对大学生的数字阅读素养教育,要注重培养其形成积极正向的网络阅读态度,引导其主动评估、辨别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同时,指引大学生从分享、讨论和进行特定主题内容阅读的过程中养成知识信息总结和提取的习惯,或是通过互动交流提升大学生深入思考和总结阅读内容的能力,引导其对知识、信息进行评估、辨别、推理,继而提升大学生的数字阅读素养。

4 结语

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水平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在碎片化、浅阅读、沉迷网络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数字阅读主要负面表征的当下,需要整合国家、社会、行业、高校的力量,消解大学生在数字阅读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从规范数字阅读环境、内容、途径的角度,积极推广数字阅读经验,以创新技术为保障,净化大学生的数字阅读环境,不断提升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

参考文献:

- [1] 周丽红.自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信息伦理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20.
- [2] 聂曲哈,刘昱杉.大学生信息伦理失范行为调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14):190-192.
- [3] 李香勇,王艳.大学生数字化阅读素养的现状研究:基于四省五校的调查[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2,27(2):228-234.
- [4] 张传真.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8.
- [5] 魏巧玲,李欣.大学生数字阅读现状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天津高校为例[J].图书馆研究,2021,51(2):120-128.
- [6] 周帅帅.贵州省大学生数字阅读调查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20.
- [7] 郑垒.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数字阅读付费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20.
- [8] 刘澜,陈晨.大学生数字阅读付费行为实证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5):110-114.
- [9] 李敏,程钱.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大学生移动数字阅读付费影响因素调查[J].图书馆学研究,2018(13):55-61,96.
- [10] 胡苗芬.“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数字阅读趋势及其对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挑战[J].兰台内外,2019(2):42-43.
- [11] 欧继花,罗紫初,李科生.大学生数字阅读供需鸿沟探析:基于数字阅读的实证调查[J].图书馆学研究,2016(4):94-101.

- [12] 杨芬霞,李牧虹.大学生数字阅读平台使用情况调查[M]//孙江,罗朋,王俊荣.传媒法与法治新闻研究(2017年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410-415.
- [13] 周惠敏.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及其个体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8.
- [14] 周惠敏.大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9,37(1):55-61.
- [15] 巩林立,王倩,李志刚,等.移动互联时代大学生数字阅读行为特征及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对甘肃五所高校大学生的调研[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2):49-54.
- [16] 新浪财经.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EB/OL].[2022-07-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032889240119950&wfr=spider&for=pc>.
- [17] 张春蕾.数字阅读时代大学生阅读研究与思考[J].编辑学刊,2017(5):117-120.
- [18] 王军,卜书庆.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规范研究与设计[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4):39-45.
- [19] 黄先蓉,张竊.数字阅读研究热点与动向:伦理、行为与应用[J].出版科学,2020,28(2):5-16.
- [20] 刘坤锋,赵元斌,王文韬,等.双路径视角下数字阅读行为影响规律研究[J].情报科学,2018,36(10):143-149.
- [21] 袁曦临.网络数字阅读行为对阅读脑的改造及其对认知的影响[J].图书馆杂志,2016,35(4):18-26.
- [22] AJZEN I, FISHBEIN M. Attitudes Behavior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7, 84(5): 888-918.
- [23] BROEDER P, STOKMANS M. Why Should I Read?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to Adolescents' Reading Socialization and Reading Attitud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13, 59(1): 87-112.
- [24] D'AMBRA J, RICE R E. Emerging factors in user evalua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1, 38(6): 373-384.
- [25] 陈柏霖,洪兆祥,余民宁.网路阅读态度、网路阅读行为及网路阅读素养之横断面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期刊,2013,58(3):23-50.
- [26] 韩玉亭.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的阅读障碍研究热点[J].绥化学院学报,2014,34(4):104-109.
- [27] 郑天奇.基于关键词分析的微博群体阅读特征分析[J].图书情报研究,2018,11(2):60-68.
- [28] JUDD V C, FARROW L I, TIMS B J. Evaluating public web site information: A process and an instrument[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06, 34(1): 12-32.
- [29] 华小琴,郎杰斌.文化自信视阈下宋代群体阅读意识、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探究[J].图书馆,2021(9):64-69.
- [30] 苟灵生,刘儒,杨军.推进新时代青年群体数字阅读行为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8):150-155.
- [31] 李海龙,贾利锋,叶海智.信息素养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影响:基于PISA 2018国际排名的实证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21,48(10):98-116.
- [32] 李燕,王雪梅.国际阅读能力研究发展态势:基于WOS数据的知识图谱分析(1900—2018)[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8):226-232.
- [33] 温红博,梁凯丽,刘先伟.家庭环境对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影响:阅读投入、阅读兴趣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16,48(3):248-257.

作者简介: 邓李君, 硕士, 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 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素养教育、信息行为; 杨文建, 硕士,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素养教育、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

收稿日期: 2022-12-21

本文责编: 王晓琳

数字阅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以宁波图书馆为例

华东杰 何东凝

(宁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66)

摘要: 针对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和用户多元化、多层次的阅读需求,宁波图书馆在不同阶段相继推出了网络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电视图书馆三大数字阅读平台和集线上阅读与线下图书交换于一体的“悦读书亭”服务平台,推动了数字阅读服务高质量发展,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产生了积极作用,提升了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关键词: 数字阅读; 高质量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 宁波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Services: Taking Ningbo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reading needs of users, Ningbo Library has launched three digital reading platforms, namely, online library, mobile library and TV library, as well as the service platform of "Reading Pavilion (Yue Du Shu Ting)" which integrates online reading and offline book exchange at different stages. This has promot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services. These platforms have produced positive effects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enhanced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digital r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ingbo Library

1 引言

数字阅读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正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要的阅读方式和知识信息获取来源。据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数字阅读分论坛暨第八届数字阅读年会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5.06亿,相比2020年增长了2.49%,人均电子阅读量为11.58本^[1]。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服务社会的主力军,理应承担起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数字文化资源和高效服务推广的职责,特别在当今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推进数字阅读服务,对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相关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数字阅读服务和推广的理论和学术探讨。笔者以CNKI中国知网为数据源,时间截至2022年8月10日,以“数字阅读”为主题词,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 490篇;以“数字阅读+公共图书馆”为主题词,共检索到相关文献674篇,以“数字阅读+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词,检索到相关文献2篇。数字阅读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相关专家学者在数字阅读的推广服务、内容供给、体系建设、平台支撑、行业发展等方面作了充分阐述。毛文思、王飏^[2]着重研究了建设高质量数字阅读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楼白宇^[3]从

区块链技术角度对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资源管理策略进行了探讨,刘梦璇^[4]对未成年人数字阅读精准推广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魏巧玲、李欣^[5]通过调研大学生数字阅读现状,提出了推动大学生数字阅读推广路径,但对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案例解析和内容推介的并不多。本文以宁波图书馆开展的数字阅读平台建设和推广服务为例,分析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以期为业界提供相关参考与借鉴。

2 宁波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的探索实践

面对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变化,如何向公众提供丰富多元的数字资源?如何让公众更自由、更便捷地获取文献信息?如何将线上、线下资源融合推介,向公众提供更优的服务体验?这是近年来宁波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和阅读推广方面思考的问题,同时也做了大量针对性的探索和实践,相继推出了以网络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电视图书馆和“悦读书亭”为主体的数字阅读服务模式,较好实现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不同环境下的全覆盖,努力践行着“有屏幕的地方就有图书馆”的美好愿景。

2.1 网络图书馆——线上阅读导航站

2002年,宁波图书馆网站运营上线,设置了书目检索、数字资源、特色馆藏等内容,网站虽然有书目检索系统和一些馆藏特色数字资源,但不成体系、内容单一、操作繁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数字文化阅读需求,读者纷纷要求图书馆增加数字资源数量和种类,提供数据库的远程查询和下载服务。2008年,宁波图书馆开始筹划建设集数字资源统一检索、实时查询、远程下载于一体的集群化、数字化网络服务平台。恰逢宁波图书馆网站改版,网站建设理念从单一的传统业务介绍、信息发布转向集服务推送、资源推介为一体的多元化信息平台,这与筹建集群化、数字化网络服务平台的建设理念和初衷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宁波网络图书馆应运而生。

为体现公益性、区域性特点,宁波网络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向宁波全市读者免费开放,使用群体由一馆向全市拓展,相关经费由市财政保障。宁波网络图书馆整合了原宁波图书馆网站“我的图书馆”“特色

馆藏”“书目检索系统”等资源内容,以读秀为检索平台,建立起集统一检索界面、单点身份认证、远程下载、原文传递于一体的数字阅读服务平台。2008年刚投入使用时只有OPAC书目检索系统、读秀资源库、万方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等10余个数据库,主要满足读者的学术研究需求。

为体现网络图书馆宁波地域特色,宁波图书馆开始建设本地特色数据库。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对馆藏的宁波地方老报纸加以整理和数字化加工,2006年开发了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报纸(1899—1999年)检索系统数据库。该数据库也是宁波图书馆依托馆藏自主开发的首个地方文献专题图文数据库,系统整理了宁波图书馆馆藏的刊发于1899年至1999年间的29种地方老报纸,包括《甬报》《甬江日报》《四明日报》《时事公报》等,用户可以选择报纸种类、出版日期、作者、文章标题等条件进行组合检索,查找近百年发生在宁波的新闻轶事。此外还利用图书馆每周举办的“天一讲堂”,在征得演讲嘉宾同意的基础上,拍摄制作了天一讲堂视频库资源,让读者在网上也能看到各大名家、学者的精彩讲座和分享。目前,宁波图书馆已建有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报纸(1899—1999年)检索系统数据库、《申报》宁波史料(1872—1949)数据库、《四明丛书》全文数据库、《宁波文史资料汇集》数据库、天一讲堂视频库5个本地特色专题数据库。

经过多次平台改版,宁波网络图书馆的首页更加友好、简洁,同时更加贴近基层用户。首页中有常见问题说明和公告提示,如详细介绍了如何登录系统?网络速度很慢,影响使用,怎么办?使用数字资源是否需要安装阅读器?读者能利用该系统使用哪些资源?数字资源认证系统能为读者提供哪些帮助等问题。这对首次使用网络图书馆的用户有较大的借鉴帮助作用。在“我的图书馆”栏目里增加了个人资料、借阅查询、新书通报、财经历史、网上续借、图书荐购、预约取消、预借查询、RSS订阅、网上挂失、标签管理、我的书架等功能,一站式的服务界面更加方便读者操作应用。截至2022年12月,宁波网络图书馆建有电子图书、电子报纸、电子期刊、视听多媒体、综合数据库五大类数字资源和40个数据库,资源存储总量达到200TB。其中外购数据库35个,构建了如万方数据库、CNKI学术期刊、读秀知识库等文献保障类数据库,中

国典藏古籍库、中国数字方志库、瀚堂近代报刊等文献研究类数据库,国研网、慧科、北大法意等决策参考类数据库,神州共享展览、龙源电子期刊、云图有声等休闲娱乐类数据库,乐儿科普、贝贝国学、中华连环画等少儿教育类数据库。

宁波网络图书馆践行了“政府出资,市民共用”的建设初衷和“以人为本,资源共享”的服务理念。目前凡持有宁波市公共图书馆借阅卡,包括宁波10个县(市)区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无论是在馆内或在馆外,都可通过用户单点认证,免费阅读、下载各类数字资源。目前宁波网络图书馆用户已达50余万,2022年用户点击量5200万次,下载量163万次,已成为宁波市民的24小时网上书房。

随着宁波网络图书馆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要求利用网络图书馆资源,目前网络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已接入宁波市委组织部宁波干部党员学习网、宁波报业集团内网、宁波文化网、文化宁波公共服务平台等,这也是向互联网用户推送资源的有益尝试,推动了数字阅读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了网络图书馆服务效能。

2.2 移动图书馆——掌上信息接收站

为解决网络图书馆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宁波图书馆开始建设移动图书馆,2012年开通微博服务,将天一讲堂网络服务阵地搬到新浪微博;2014年开设官方微信公众号,并推出了“甬图君”拟人化形象;2016年开通“书香甬图”APP,支持移动端书籍、报纸、期刊、视频的阅读和下载。宁波图书馆微博、微信、APP服务推动着移动图书馆服务的高速前进。同时努力做到业务功能和用户黏性的双提升,促进了数字阅读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纵深推进。

一是升级传统业务。用户在移动图书馆客户端不但可享受馆藏查询、参考咨询、意见反馈、借阅管理、帐号绑定管理、密码管理、逾期缴费、图书续借等传统业务,也可以办理入馆预约、小程序办证、免费连接WiFi、场地预约等提升服务。

二是拓展新功能。在宁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中增添了与图书馆“你选我买”服务相对应的“扫码荐书”功能。读者在与宁波图书馆合作的新华书店门店通过“扫码荐书”功能就能准确获取所借图书信息,进一步缩短了借书流程,提升了读者借阅体验度。目前通过“你选我买”活动,共有1.4万余名读者从新华

书店借走了近12万册图书。

三是实现在线阅读推广。目前,宁波移动图书馆的数字阅读平台内有视频讲座、电子书、少儿多媒体、报刊资源、在线展览、有声听书等20余个数据库资源,用户可在微信和手机APP上实现在线读报、读书、欣赏展览、观看讲座和少儿视频等,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特别是2019年底宁波图书馆拍摄了一组新馆建筑和活动的全景视频,剪接完成了3分钟的“VR看新馆”数字资源,内设简介、导图、音乐、解说、旋转、场景等多个模块,以360°全景漫游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图书馆的服务项目和功能定位,并命名“一键穿越”放置在微信公众号甬图悦读板块的首页,读者在云上也能看图书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广宣传功能^[6]。

四是开展阅读品牌建设。通过客户端定期推送好书推荐、书评、阅读推广类文章,形成品牌优势。宁波图书馆于2020年在微信端推出了“天一云读”品牌,每期设定主题,精选电子书,向社会公众推荐,同时开展微书评比赛,每期选出精彩读者阅读感言,对其进行奖励,进一步增加与读者的互动。截至2022年12月,“天一云读”系列活动共推出41期,累积阅读量超过10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2020年9月,“到图书馆去”新媒体创新服务案例荣获“最佳图书馆新媒体创新服务案例”一等奖。2021年1月,宁波图书馆微博荣获“浙江十大文旅系统微博”称号。2021年5月,宁波图书馆微信端推出的品牌栏目“明州往事”荣获“最佳图书馆新媒体创新服务案例”二等奖。

2022年,宁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粉丝近40万,同比增长30.5%,全年阅读量169万。微博阅读总数1059万。据《全国公共图书馆微信微博监测月报》显示,2022年宁波图书馆微信微博在全国同类城市公共图书馆微信微博影响力排名中均为前十。

2.3 电视图书馆——家庭知识加油站

网络图书馆解决了部分高校师生和学者为开展学术科研找资料难的问题,移动图书馆帮助青年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快速获取信息资源,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老年读者既不会上网,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也需要最新的信息咨询和数字化文化享受。面对读者需求和图书馆业务拓展需要,2015年,宁波图书馆与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宁波电视图书馆。宁波图书馆负责相关视频资源的采

集,并专人负责视频资源剪辑和转码,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对视频资源进行审核和日常更新,并负责每年更新电视图书馆主页面。双方定期开展业务交流和工作对接,根据点播量对版块栏目进行优化升级和淘汰删减。

目前宁波电视图书馆设有1个主视频窗口和15个版块:读者须知、图书续借、你选我买、新书推荐、天一约书、天一展览、天一讲堂、天一音乐、少儿天地、听书有道、朗读宁波、丝路文化、特色资源、老宁波、艺术鉴赏,共有视频资源4 000余部,图文1 000余篇,为市民提供不一样的数字阅读体验。电视图书馆还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市民可以随时随地点播查阅,实现视频播放的暂停、回看、快进快退等个性化功能。同时市民不仅可以通过电视点播观看数字资源,还可以直接在电视上进行图书续借,查询个人借阅信息。

宁波电视图书馆把数字电视作为图书馆24小时开放的服务窗口,将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和传播推入一个全新的可视化信息时代,方便了广大老年读者使用操作,也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学习知识、陶冶情操的窗口。宁波电视图书馆目前已覆盖宁波市海曙区、鄞州区、高新区和东钱湖旅游风景区为主的90万高清用户家庭,日均访问量在1万人次左右。

2.4 悦读书亭——社区文化黏合剂

2015年,宁波图书馆与宁波市文明办合作,开始宁波版“漂流书亭”的创建,首先将宁波版“漂流书亭”的服务人群定位为基层普通市民,以社区为基点进行创建;其次主要功能明确为数字在线阅读与纸质图书交换的结合,将线上的数字资源搬到百姓身边,将图书交换、共建共享、绿色环保的理念引入群众中,实现文献资源线上扫码阅读与线下图书交换的O2O模式;最后确定将宁波版的“漂流书亭”命名为“悦读书亭”。

“悦读书亭”的主要结构是一屏一架。“一屏”是液晶显示屏,核心功能是APP安装和图文展示。现有的“悦读书亭”中,包括适合基层群众阅读的大众性、普及性电子图书、电子报刊APP和适合少儿启蒙的绘本读物和视频故事APP等,图文展示模块定期推送宁波本地的热点文化资讯和公益广告展播。“一架”是图书交换书架,倡导市民“带一本书来,换一本书走”的理念,让图书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流通、传递和利

用。在“悦读书亭”推广建设中,宁波图书馆和书亭落地单位共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落地单位负责书亭硬件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宁波图书馆负责数字资源采购、维护、更新和推广宣传。双方责任明确,在把“悦读书亭”建起来的同时,也把“悦读书亭”真正管起来,用起来。

目前宁波全市已完成15台“悦读书亭”的落地安装和地面推广,因推广宣传力度不一,社区居民文化程度和阅读需求不一,安装地理位置不一等原因,有些书亭门庭若市,有些则门可罗雀。为改变这种情况,根据各个书亭运营情况,宁波图书馆联合落实落地单位开展书亭的分层推广活动,通过讲座培训、现场指导、安装APP有奖活动等形式,引导居民发现“悦读书亭”的丰富资源,树立图书交换的理念。

3 新冠疫情时期的特殊价值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也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宁波图书馆在闭馆期间,积极利用网络数字资源开展线上阅读、信息传递和在线参考咨询服务,为疫情防控贡献了特殊时期的图书馆的文化力量。

2020年1月24日起,宁波图书馆因疫情闭馆。同时,宁波图书馆以图书馆网站、手机图书馆、电视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为主阵地,结合图书馆服务工作,加强融合宣传。2020年1月26日起,连续3天举办线上“春节民俗专辑展”,为传统年注入书香;举办2期“过春节 读好书 品书香——甬图邀您看电子书”,推荐优质电子书资源;做好防疫专题图书、经典纪录片推介,满足读者文化享受的需求;利用数据库资源,举办“宅家课堂”,以专题形式普及文化知识;上线甬图数字展厅文化大餐,让读者足不出户看展览,体验博物馆的全景3D;创新推出“天一音乐馆”微信线上直播活动5期,平均每期在线读者达5万人;在微信公众号、网站上开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答题”等竞赛,普及防疫知识。大量的线上活动提高了数字阅读用户黏度,成为了疫情期间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主阵地。据统计,2019年宁波网络图书馆日均点击量25.34万次,而在2020年1月24日至3月24日闭馆期间,总访问量达到了4 105.8万次,日均将近70万次^[7]。在此期间,宁波图书馆还利用国研网、慧科数据

库等数字资源推出“天一文荟”抗疫专辑,为政府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参考价值,在特殊时期发挥了数字资源的特殊作用。

4 结语

据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6%,较2020年的81.3%提升了0.3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9.6%,较2020年的79.4%增长了0.2个百分点,总体上呈不断上

升趋势^[8]。可见,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宁波图书馆推出的网络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电视图书馆和悦读书亭等数字化阅读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全民数字素养,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促进了全民精神富有。在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阅读发展中还需结合社会需求和自身特点,精准发力,精品供给,精细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智能化、体系化、便捷化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发布[EB/OL].[2022-08-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150293338508327&wfr=spider&for=pc>.
- [2] 毛文思,王飏.“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数字阅读服务体系建设探析[J].出版广角,2022(8):21-26.
- [3] 楼白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资源管理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6):63-68,85.
- [4] 刘梦璇.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数字阅读精准推广模式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2(3):59-63,94.
- [5] 魏巧玲,李欣.大学生数字阅读现状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天津高校为例[J].图书馆研究,2021(2):120-128.
- [6] 徐岚.公共图书馆开展VR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与思考:以宁波图书馆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3):83-86.
- [7] 徐益波,万湘容,华东杰,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图书馆实践与思考:以宁波图书馆为例[J].图书与情报,2020(2):39-42.
- [8]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EB/OL].[2022-08-11].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6980.htm.

作者简介: 华东杰,宁波图书馆资源采编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与阅读推广;何东凝,宁波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馆员,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7-0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上接第17页)

- [42] 覃晓,廖兆琪,施宇,等.知识图谱技术进展及展望[J].广西科学院学报,2020,129(3):242-251.
- [43] 李纲,王施运,毛进,等.面向态势感知的国家安全事件图谱构建研究[J].情报学报,2021,40(11):1164-1175.
- [44] 刘晓娟,李广建,化柏林.知识融合:概念辨析与界说[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3):13-19,32.

作者简介: 高国伟,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电子政务、知识融合等;康涔,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知识融合等。

收稿日期: 2022-12-2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阅读文化 ·

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提升策略*

慎一虹 余百海 吴小娟 沈望舒 吕霞 李政

(湖州市图书馆 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 文章阐述了立足传统文化对于阅读推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以湖州市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为例,充分梳理当下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大平台机构在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中的现状以及困境,提出了全局性把握、品牌化运作、系统性策划、协作性共建、专业化凝聚、全媒体传播、全信息归档的阅读推广质量提升策略,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做好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 传统文化; 阅读推广; 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2.1

文献标识码: A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Cultural Reading Promo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The article takes the reading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uzhou as an example, and fully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 of the city's organ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nd major platform institutions in the reading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high-quality reading promotion with a big-picture perspective, brand-based operation, systematic planning,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profession-oriented teamwork, all-media dissemination, and information-based archiving.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good traditional culture reading promo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reading promotion; public library

1 引言

2022年4月23日至25日,我国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我国书香社会建设以及全民阅读推进取得的丰硕成果,通过多元化形式,持续推进全民阅读走实走深,全民阅读正式开启新时代^[1]。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阅读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个人成长的极端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当前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之下,湖州市图书馆社科课题小组对湖州全市范围的阅读推广工作展开了相关调查及分析研究,提出了立足传统文化提升阅读推广服务质量的解决路径。

2 立足传统文化开展阅读推广的意义

2.1 为阅读推广高质量提升确立新的方向

近几年,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

* 本文系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足传统文化 唤醒文化自信——湖州阅读推广高质量提升研究”(项目编号: 22hzghy096)的成果之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央要求,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正式拉开了序幕。阅读推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顺应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与趋势,从立足传统文化出发提升阅读推广高质量,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2.2 为阅读推广高质量提升注入新的动力

在新时代信息技术冲击下,新媒体平台迅速发展,读者习惯碎片化、快餐式阅读,能够静下来进行阅读的时间大量减少,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正处于难以突破的瓶颈期。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找到阅读推广的新动力和支撑点?2022年央视春晚出圈爆火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给了我们极好的启示。《只此青绿》是“让文物活起来”理念运用的典范,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作为背景,采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诗剧”结构,跨界融合舞蹈和绘画等艺术门类,彰显中华文化的历史光辉和创新活力。《只此青绿》将传统文化以更适应现代人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保留了文化精髓,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案例的成功提示我们传统文化背后的爆发力,启发我们将立足传统文化作为阅读推广的核心内容,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寻找传统文化资源融入阅读推广的契合点,促使读者从传统文化阅读中了解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进而追本溯源,提升自身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素养。

2.3 为阅读推广高质量提升带来新的突破

全民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使阅读变成民众的主动需求与自觉行为,并养成行为习惯。这无疑需要阅读推广的质量足够高,内容足够吸引人,形式足够新颖。立足传统文化开展阅读推广,可以为阅读推广带来质的飞跃、新的突破。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以挖掘出相当多精彩而耐人寻味的内容,更让人难以忘怀,更能陶冶人的情操。其次,当前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浙江省宋韵文化传承工程等传统文化传播活动的成功已经说明,传统文化传播要懂得利用新媒体、新技术,选择合适

的传播平台,融合多元的模式载体来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这样更具吸引力,更能提升阅读推广的影响力,进一步完成阅读推广工作的迭代升级。

3 湖州市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湖州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类文化体育中心、市民文化广场、公园、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民营书店等公共文化场所不断改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趋完善。截至2021年底,湖州市公共图书馆(含分馆)数量达到102个,城市书房数量达35家,面向读者开放的书院和藏书楼6个,实体书店(含文化类书吧)495家,农家书屋805家,职工书房900余家,各类研学中心和民宿书房也在不断崛起,阅读阵地的不断扩大为阅读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根据浙江省委宣传部发布的《2021年浙江省居民阅读调查报告》统计结果,湖州市2021年居民综合阅读率为90.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1.0%。与全省各地横向比较发现,湖州市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特别是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仍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

3.1 受众群体固定,广泛性参与不足

自湖州市提出“书香湖州”建设以来,全民阅读工作始终稳步推进,而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的推进则较为缓慢。多数阅读阵地举办的传统文化主题阅读活动往往受众固定,读者多为老年群体或专研学者,社会大众参与程度不高。一方面,传统文化囿于自身特性,内容过于抽象,生涩难懂,主题活动距现实生活很远,群众多数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如今生活节奏太快,公众阅读更倾向于“实用主义”。

3.2 协作机制缺乏,系统化设计不足

要做好湖州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工作,必须深入挖掘湖州特色文化的精髓和内核,通过阅读推广活动这一载体和形式向全社会传播湖州优秀文化,这不单单是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机构等个别阅读阵地的使命和责任,而亟需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现如今,全市层面虽搭建了较为完备的组织架构,但在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实践中,各阅读阵地间的协同联动依然不足,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无法形成多

点联动、集中宣传的浩大声势。虽然不少阅读阵地在传统文化体验类服务项目方面与社会团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但因其自身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活动组织策划方面缺乏专业能力,使得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内容深度不足,活动品质得不到保障,往往只能维持短期宣传热度,无法赢得长期的口碑和关注度,项目的服务内涵和延续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3.3 宣传形式单一,立体化传播不足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新媒体应运而生,社会大众对社交媒体的媒介依赖越来越强,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碎片化、浅阅读为特点的快餐式阅读成为读者的主流选择,“娱乐文化”盛行,传统模式下的线下阅读推广活动对读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2]。同时,由于线下场地和覆盖人群有限,其服务范围也极其有限,不具备线上新媒体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轰动性。目前全市多数阅读阵地,如各级公共图书馆、读书会组织、民营书店等,在开展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时,因线下活动互动性高、体验感强的现实优势,多采取线下实景体验模式,如专题讲座、阅读分享会、真人读书会等,即时性强而持续性不足。部分活动虽通过网站、视频号和网络直播等形式开展线上传播,但收效甚微,群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

4 湖州市传统文化阅读推广质量提升策略

4.1 全局性把握,深挖传统文化地方特色

传统文化是流淌在民众血液中的记忆,是根植于民族骨骼中的品格,是架构一座城市不凡的灵魂。湖州,作为坐拥5 000年文明史、近2 300年建制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无数先人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众多文化巨匠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丝绸文化、湖笔文化、湖商文化、湖茶文化、书画文化等成为湖州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教育上,胡瑗和他主持的湖学,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也奠定了宋韵文化的思想基础,成为宋韵文化的源头;书画上,赵孟頫、吴昌硕等大家成就了“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美誉;文学上,诞生了与贾岛并称“郊寒岛瘦”的孟郊,以“诗囚”之称写世态炎凉和民间苦难,等等。这些具有湖州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是湖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也是组成湖州历史文

化闪闪发光的缕缕星辉。因此,解码特色鲜明的湖州文化基因,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激发当代新老湖州人对这座城市历史人文的浓厚兴趣,成为当前阅读推广的重要突破点。通过加大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力度,能够进一步展现湖州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让“诗”和“远方”深度融合,利用得天独厚的地方文化优势,为建设人文新湖州注入更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力量源泉。

4.2 品牌化运作,营造阅读推广参与氛围

树立“品牌”思维,打造有特色、有内涵、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推广品牌,是提升群众“追捧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多阵地、多形式,提供多元阅读服务产品,为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行业领域的市民提供各类阅读文化需求,提升受众对传统阅读文化品牌的黏合度和参与深度。

首先,在文旅系统方面,作为全市阅读推广工作的中坚力量,湖州市公共图书馆不遗余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品牌活动,湖州市图书馆在2022年推出“宋韵”系列展览及专题讲座,引领“宋韵”风尚;以“街头图书馆”品牌在端午节、中秋节等时节推广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湖州市文化馆、湖州市博物馆、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也相继推出“苕上十二时辰——宋代湖式生活”特展、“苕霅探源”——湖州文保研学营等特色活动。各类文旅公益活动,为广市民读者了解传统文化打开了新的视觉窗口,提升了市民读者参与传统文化的热情和期待。

其次,在教育系统方面,全市中小学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打造传统精品项目。湖州塘甸小学探索“湖剧”项目,用湖剧跳课间操,既个性创意十足,又让传统湖剧文化唱出了“新声”,同时组织社团,将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课本教材和小故事,改编创作成湖剧小品排练演出,掀起了学生学湖剧的热潮,是让“老底子”文化焕活的经典案例;湖州埭溪镇上强小学致力于山歌的保护传承,从学生和学校实际出发,研究编写了包含多种类型山歌在内的《吴韵山歌》校本教材,每周开设山歌传承课,聘请山歌传承人进校开展教学,让上千名学生人人会唱湖州山歌,大大提升了学生群体传承非遗文化的兴趣。

最后,在媒体宣传方面,由学习强国湖州平台主办的文化栏目“湖州味道”,经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州市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稿,于2020年10月3日

发布第一期,迄今一共发布84期,固定在每周六晚间由“湖州发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推送。栏目旨在通过个人记忆及研究还原城市现场,体现湖州在历史各阶段的风物、风味、风气和风度,让市民对湖州的历史文化有别样的感悟。湖州广播电台开设的吴味、湖味十足的湖州话栏目“湖州山海经”、湖州电视台开设的吴语湖州话节目“阿奇讲故事”等,致力于深度挖掘和传播湖州文化,坚持用原创表达湖州,引领新老湖州人热爱和守护湖州“老底子”。

4.3 系统性策划,推动传统文化纵深传播

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是长期而持久的工作,需要运用专业性、体系化思维,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利用全市各行业、各平台在阅读推广、文化传承方面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找准共建共享的切入点和融合点,这样才能推动传统文化纵深传播、可持续发展。湖州市将最优化整合资源和力量,在最近五年持续推出阅读推广与“湖学”研究、阅读推广与宋韵文化、阅读推广与方言保护传播、阅读推广与非遗文化传承、阅读推广与古籍活化利用五个阅读推广重点项目。这些项目有些是当下颇受社会关注,急需重视并传承传播的传统文化,如方言保护传播、非遗文化传承等;有些来自地方政府根据国家传统文化复兴战略推动的重大项目,如浙江省有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湖州市有“湖学”研究项目。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具有一定体系性,其阅读推广策划必须要有系统性、持续性,不能零碎、分裂地宣传某一个文化符号,也不能偶尔地、突发性地去做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小活动,只有宏观地、系统地、不间断地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才能让民众从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发扬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正使阅读推广高质量发展与提升。

4.4 协作性共建,实现平台优势资源合力

利用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提升市民思想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需要全市范围内多条线、多部门、多力量之间统筹协调、主动融合,推动实现资源数据共享,打通各阵地之间数据和资源壁垒,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更实合作上形成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深度共识和强大合力^[3]。一是借助政府部门力量,形成阅读推广浪潮。利用重要节点,如全民阅读节等,由湖州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湖州市全民阅读工作联席会议,涵盖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市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市统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女联合会、市科学技术协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作家协会、市新华书店等20余家单位,在全民阅读工作推进过程中形成合力,营造起书香满城的浓厚氛围。借助政府宣传部门的公信力,加强各单位联动,能有效为阅读推广提供方向引领和思想主导。二是文化品牌强强联合,发挥平台协同效应。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部门等,都有其对应的专业职能和资源优势,通过整合“南太湖人文大讲堂”“胡瑗大讲堂”“韵海大讲堂”“菰城大讲堂”及各区(县)阅读讲堂等优质阅读服务资源和文化品牌,建立湖州全民阅读讲堂联盟,可为各级阅读推广主体单位搭建服务联动、资源联建平台,充实阵地服务资源,扩大受众群体范围。此外,由湖州市图书馆携手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湖州“心享吴兴”教师公益团联合开展的“宋韵奇妙课”成为暑期市民为孩子选择的热门项目,通过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资源,教师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和带队,媒体部门提供招募发布和宣传报道,深入探寻湖州深厚的宋韵文化底蕴,将沉浸式探研专业知识与城市的文化底蕴联通,实现1+1>2的服务推广协同效应,有效提升阅读推广服务项目的影响力、传播力和市民认可度。

4.5 专业化凝聚,增强人才能力素质

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必须依靠具备相关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明确具体的活动主题、决定推广对象、决定活动形式、确定活动名称、安排活动时间及地点、设计活动内容等,活动形式是否新颖,主题内容是否具有高度和深度,在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前和结束后都需进行怎样的媒体宣传,这些项目要做到环环相扣,与之对应的责任人显得非常关键。不仅如此,活动负责人需要对相关成果进行综合评估,做到创新性与实效性相结合,广泛性与精准性相结合,轰动性与持续性相结合。这就要求阅读推广策划主体积极构建服务标准体系和人才培育体系,出台关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的服务标准和考评指标细则,对每一场活动开展量化评测,同时,要建立专业的人才队伍和人才培养计划,让阅读活动组织者充分了解和學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利用好非遗传承人、古籍研究学者

等传统文化研习人员资源,壮大传统文化阅读推广队伍,让专业人才真正为传统文化的阅读推广提质升档。

4.6 全媒体传播,打造宣传推广矩阵

当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水平得到飞速提升,传统阅读方式、阅读活动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纸质文献也不再是人们进行阅读的唯一媒介,新媒体、电子化成为了市民群众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面对读者日益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和文化需求,阅读推广部门需要及时转变服务思路,不仅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核,更要切实用好大数据等技术资源,运用全媒体手段与互动方式,依托VR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形成更为新颖多元的传播模式^[4]。在进行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宣传和信息发布时,除了传统服务窗口、公告栏、报纸、电视台等宣传方式外,还可以创新运用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短视频、AR/VR 服务等方式,借助“网红”资源以及“流量”力量,让阅读推广活动实际效果得到进一步放大,让更多市民群众通过线上线下双重媒介,持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拉长对活动关注的时间跨度。

以湖州市图书馆为例,在2022年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结合时下群众热议的“元宇宙”概念,推出线上预热宣传片,通过新元素、新载体、新渠道收获市民读者广泛的关注度和超高的话题度。除此之

外,湖州市图书馆还推出“宋韵流芳 书香湖州”古籍文化艺术展VR线上版本,实现在线观展功能。目前,全市各级阅读阵地在开展线下阅读推广活动的同时,普遍增设线上直播功能,进一步扩大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力和辐射面,以新载体、新模式,打造高效全媒体传播链。

4.7 全信息归档,促进活动成果展示

信息爆炸时代,“走红”现象热极一时。如何让优秀的阅读推广成果不至于成为“过眼云烟”?这就需要做好信息资料归档工作。首先,可以建立线上“成果展示”档案仓,对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形成的档案数字化,丰富档案资料资源储备。将具有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档案归集,将图片、文稿、视频或语音等资料进行归类,它既是活动组织方的永久存放“档案馆”,又是读者可以随时“回顾”精彩瞬间的展示窗,一举多效。其次,可以建立特色活动体验入口,利用现代“VR”体验技术实现其“参与”功能,用“720全景+全媒体阅读”等新方式,实现精彩画面“可看、可读、可听”,营造氛围,让读者可以有“身临其境”的角色参与感,进而提升活动的持续关注度和热度。最后,根据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的“受热”程度,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选择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公众兴趣的展览主题,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成果展览,进一步深化活动效果。

参考文献:

- [1] 党云峰.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加强阅读引领 培育阅读新风[N].中国文化报,2022-04-28(1).
- [2] 杨静.公共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现实困境与策略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6):37-39.
- [3] 林婷.公共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研究[J].传媒论坛,2020(3):110-111.
- [4] 杨荔雯.全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探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8):17-19.

作者简介: 慎一虹,湖州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地方文献;余百海,湖州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吴小娟,湖州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中外文学;沈望舒,湖州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活动策划;吕霞,湖州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传播学;李政,硕士,湖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图书资料管理、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2-09-07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文献学研究 ·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毛伟林 杨 峰 尹 飞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49)

摘 要: 文章基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撰写的前提,将它们放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综合考察其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突破直接资料匮乏的瓶颈,明确了它们的编成时间范围:《续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初,《续艺文略》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初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章借此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

关键词: 艺文略; 经籍考; 《四库全书总目》; 史志目录; 古典图书分类法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The Research of the Time to Complete the "Three Tong"'s "Jingjikao" and "Yiwenlve" Codified by Qing Dynasty Officials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nuscrip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books *Xu Wen Xian Tong Kao Jing Ji Kao*, *Xu Tong Zhi Yi Wen Lve*, *Qing Chao Wen Xian Tong Kao Jing Ji Kao*, and *Qing Chao Tong Zhi Yi Wen Lve* were compiled. Based on this premis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ir classification and included books was conducted by integrating them into a sequence of texts that includes the *Siku Quanshu Chuci Jincheng Cunmu*, the manuscrip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hel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the *Wenyuange Siku Quanshu*, and the *Siku Quanshu Jianming Mulu*. This breakthrough overcame the bottleneck caused by the lack of direct materials and clearly defined the time range of their compilation: the *Xu Jing Ji Kao* was compiled around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46th year of Qianlong(1781), the *Xu Yi Wen Lve*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second month and the last month of the 46th year of Qianlong (1781), the *Qing Jing Ji Kao*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49th year (1784) and the end of the 50th year of Qianlong(1785), and the *Qing Yi Wen Lve*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last month of the 50th year (1785) and the end of the 52nd year of Qianlong(1787). This process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more complete sequence of texts for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Key words Yi Wen Lve; Jing Ji Kao; *Siku Quanshu Zongmu*; historical records catalogue; classical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1 引言

史志目录是中国古典图书目录的重要类型,主要

包括正史艺文志、经籍志,《通志·艺文略》(以下简称《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下简称《经籍考》)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中的艺文、经籍部分,地方志艺文志、经籍志和补正史艺文志、经籍志。《艺

* 本文系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2022年馆内课题“《四库全书总目》对古典图书分类法的继承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一。

文略》《经籍考》在分类体系方面,《经籍考》在解题体例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对古典目录学产生了较大的贡献和影响。清朝官修《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下简称《续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以下简称《续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下简称《清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以下简称《清艺文略》),是对《艺文略》《经籍考》的续作,也是古代史志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钟翰最早系统地研究了清朝官修“三通”,包括其纂修过程、体裁、取材等^[1],韩李良进一步考证了清朝官修“三通”的编成时间^[2]。由于“续三通”“清三通”门目众多、体量庞大,纂修时间跨度长达十几二十年之久,《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的具体编成时间与其全书肯定不一致,但却又是利用它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前提。迄今为止,只有韩李良对《续艺文略》的编成时间进行了考证^[3],其结论却还有待商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资料的匮乏。这就要求我们另辟蹊径,从其他间接资料及其相互关系中,探寻《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编成时间的相关证据。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清朝官方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开三通馆纂修“续三通”(《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三通”(《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开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开始,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七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明目录》)、“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渐次成书。这反映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总目》与“续三通”“清三通”的纂修时间存在相当长的重合。实际上它们的纂修人员也有不少重合。在此背景下,《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与《简明目录》《总目》同为图书目录,它们的纂修很可能存在相互的影响和借鉴。

笔者浏览《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发现,其分类体系分别在整体上继承《艺文略》《经籍考》的同时,又都受到《总目》的很

大影响。郭艺鸽^[4]、李成晴^[5-8]、刘晓胥^[9]、韩李良^[3]的相关研究,都确证了《总目》对《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的影响。并且《四库全书》和《总目》对古典图书分类的一些类目进行了创新,而这些创新又是在不断修改中完成的,是动态的过程。一些《总目》有较大创新并且颇为复杂的类目,《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所呈现的状态都不一样,考虑到它们的编撰进度和完成时间并不一致,因而可以认为是它们参考和借鉴的《总目》文本并不相同所导致的。反过来也就是说,处在不断调整中的不同阶段分类类属和收录图书情况各不相同的《总目》文本,分别对《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的分类体系尤其是具体类属产生了影响。

因此,通过综合考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总目》和《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的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构建《四库全书》和《总目》一些类目的形成过程,确定《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在这些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可以推论出它们编成的时间范围。

3 《续经籍考》的编成时间

《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初稿完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①,被乾隆皇帝命令“古今分帙”重加增辑,最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至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间成书^[2],是清朝官修“三通”中最早开始纂修的,也是最早成书的。因此,《续经籍考》的编成也极有可能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为早。《续经籍考》与《经籍考》《总目》一样,只分类编录现存图书,其断限为南宋理宗朝以降至1644年明朝灭亡。

《续经籍考》不仅依据《总目》稿本补入《经籍考》未收录而当时仍存世的宋代图书,其辽、金、元、明四个朝代的图书也完全是根据《总目》稿本来“按次编录”的^[10]。《续经籍考》的二级分类折衷于《经籍考》与《总目》稿本之间,三级分类则完全依据《总目》稿本。

《总目》编纂的起点,即所著录和存目图书提要稿的撰写,而《总目》文本的形成,则开始于诸纂修官

员分工撰写的大量提要稿的第一次结集汇编——《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11-12]。尽管《初目》收录图书种数不及《总目》的五分之一，但却是“最早给提要稿进行完整系统分类的”，《总目》“就是在《初目》所建立的图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经过部分调整而形成的”^{[13]4-7}。而《总目》的大部分分类创新，也是对《初目》分类体系的重要调整，包括创设诏令奏议类、霸史类、伪史类改名称载记类，小学类、传记类、地理类、目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艺术类的三级分类，在《续经籍考》中即已经基本完成。并且，《续经籍考》收录图书共计6 155种^[4]，是《初目》收录图书1 870种^{[13]2}的三倍有余。由此可见，《续经籍考》的编成，应当是在《初目》编成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之后很久。

同时，《续经籍考》史部却沿用了《经籍考》和《初目》的故事类，其小序称故事有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营建六属，主题是“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然而因为收录图书“部卷甚少”，故不再进行三级分类。但是实际上，《续经籍考》故事类以时间为序收录图书达100种左右，较《初目》故事类的31种有了很大增加，几乎达到《总目》政书类著录图书57种的两倍，是《总目》政书类著录和存目图书总量的五分之三，其内容涉及综合性典制、朝庙礼仪、赋税、民生、科举、年号、谥法等方面，并无法典律令，也极少军政和工程建设。所以，《续经籍考》故事类小序因为“部卷甚少”而不分属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合理的解释是，《续经籍考》的故事类在编撰之初本就未进行三级分类，面貌与《初目》较为接近，只是收录图书的数量有了较大扩充。其小序中分六属和“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的说法，是后来修改时才依据《总目》稿本追加上去的。

存世的诸家《总目》稿本中，《初目》外只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总目》稿本（以下简称“国博稿本”）保存有故事类的部分。国博稿本故事类亦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营建六属，与《续经籍考》故事类小序所述完全一致。可见，《续经籍考》修改完善时撰写小序所凭据的《总目》稿本，即便不是国博稿本本身，也一定与国博稿本同源。研究表明，国博稿本极有可能与上海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为同本，其抄写时间应如刘浦江和韩李良所论，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3,14]。因此，《续经籍考》的初撰完成

应该是在国博稿本编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之前，而其修改完善则约略与国博稿本的编成同时或稍后。概而言之，《续经籍考》的编成，应该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份前后。

4 《续艺文略》的编成时间

《续通志》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告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二月，是“续三通”中最晚完成的，不过也仍然早于“清三通”。至于《续艺文略》的编成时间，仍有待做具体考察。《续艺文略》摒弃《艺文略》“通记有无”的做法，以宋初迄1644年明朝灭亡为断限，只收录存世图书，实际上是全部取材于《总目》稿本，并参照《总目》区分“著录”与“存目”。《续艺文略》沿用《艺文略》的十二个一级分类，但二、三级分类则多参考《总目》，或折衷于二者之间。

国博稿本故事类著录的若干种图书，与《简明目录》《总目》颇有出入，如《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被《简明目录》《总目》著录在史部传记类，《元典章》被《总目》降为政书类通制属存目，《礼部志稿》《太常续考》被《简明目录》《总目》著录在史部职官类^[15]。笔者还发现，《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元典章》《礼部志稿》《太常续考》亦皆见载于《续经籍考》故事类，但《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已被《续艺文略》著录在传记类，《元典章》已在《续艺文略》中被降为政书类通制属存目，《礼部志稿》《太常续考》已被《续艺文略》著录在职官类。也就是说，《简明目录》《总目》对国博稿本故事类上述诸书的调整，在《续艺文略》中就已经完成。由此可见，《续艺文略》编成时间的上限，诚如韩李良所论是在国博稿本编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之后。

韩李良认为《续艺文略》编成时间的下限，是在《简明目录》完成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之前，理由是体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进呈《总目》稿本基本面貌的《简明目录》，已经创设了纪事本末类，而《续艺文略》却还没有纪事本末类^[3]。但是，如下文所要述及的，编成时间晚于《简明目录》的《清经籍考》也并未设立纪事本末类。究其原因，应该是尽管《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

艺文略》的分类受到《总目》稿本的很大影响,但是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保留了《经籍考》和《艺文略》分类体系的缘故。因此,纪事本末类的设立与否,并不能成为判断《续艺文略》编成时间的依据。韩李良还疏忽了的是,存世文献中除国博稿本外,最早设立纪事本末类的是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其图书分类和排序,依据的都是《总目》相对成熟稳定的稿本。而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故事类被首次改名为政书类。所以,仍旧保持了故事类的《续艺文略》,其编成时间应该早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完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综上所述,《续艺文略》编成的时间应该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十二月之间。

5 《清经籍考》的编成时间

《清文献通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之前未“古今分帙”的《续文献通考》,其独立成书,则与《清通典》《清通志》一样开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于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前的工作基础,《清文献通考》可能是“清三通”中最早编纂完成的。《清经籍考》的二级分类折衷于《经籍考》与《总目》之间,三级分类则完全依据《总目》。

《清经籍考》中,故事类已经被更名为政书类,分属也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简明目录》完全一致,表明其编成时间肯定晚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完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

由于《清经籍考》收录图书的断限为清朝入主中原确立正统迄于其编撰的当时,因此考察其收录图书的最晚成书时间,可以帮我们明确《清经籍考》编成时间的下限。《清经籍考》收录的成书最晚的图书是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钦定礼部则例》《钦定三流道里表》,并且《清经籍考》也并没有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那样,在成书后又不断增补进清朝官方新修成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钦定千叟宴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旬万寿盛典》(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十月)等书。因此可以进一步确定,《清经籍

考》的编成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及之后。

同时,本文还发现,《清经籍考》在图书解题中数次提及编撰中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但是却不收录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成书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16]。这说明《清经籍考》的成书时间早于《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应当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

6 《清艺文略》的编成时间

《清通志》的编撰开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但其真正的推进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二月“续三通”全部成书以后,并最终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完成^[2]。《清通志》省去纪传体的本纪、列传、世家、年谱部分,仅撰写二十略,因而成书甚速。

《清艺文略》亦摒弃《艺文略》“通记有无”的做法,只收录存世图书,实际上也是全部取材于《总目》,并参照《总目》区分“著录”与“存目”。《清艺文略》同样沿用《艺文略》的十二个一级分类,但在二、三级分类上则更加接近《总目》。《清艺文略》与《清经籍考》一样,收录图书的断限始于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确立正统,迄于其编撰的当时。

从收录图书的情况来看,《清艺文略》收录的最晚成书的图书是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千叟宴诗》《钦定石峰堡纪略》,甚至是编成时间可以具体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并且,《清艺文略》跟《清经籍考》一样,也没有收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成书后又不断增补进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钦定千叟宴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旬万寿盛典》(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等书,说明《千叟宴诗》《钦定石峰堡纪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并非《清艺文略》在成书以后所补入。由此可见,《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又因为《清通志》的修撰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全部告成,所以《清艺文略》的编成时间应该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年间。

7 结论

本文基于对《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受《总目》不同稿本影响的认识,将它们放在《初目》、国博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通过对它们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的综合考察,探究它们的编成时间,得出如下结论:《续经籍考》的编成应该是在国博稿本编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底前;《续艺文略》应当编成于国博稿本编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竣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的编成应该是在《钦定礼部则例》《钦定三流道里表》成书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成书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应当编成于《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成书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清通志》编纂完成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

明确了《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的编成时间范围,在广泛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总目》存世的各种稿本和文本,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学界所呼吁的更加完整的《总目》文本形成序列来^[17-18],其大致如下:《初目》(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农历七月),《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续经籍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底前),上海图书馆藏《总目》稿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总目》稿本/国博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18],《续艺文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十二月之间),南京图书馆藏《总目》稿

本(以下简称南图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十二月之间)^[19],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20]150-15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至七月之间)^[21],《简明目录》(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20]150-153},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22],文源阁《四库全书》提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冬)^{[20]150-153},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20]150-153},《清经籍考》(乾隆四十九年至乾隆五十年,1784年至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5年至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20]157},浙本《总目》(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殿本《总目》(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除此之外,尚有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总目》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总目》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总目》抄本、天津图书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为无人确切地考证出其编成或抄写时间^[23],故而未能纳入到本序列之中,尚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总目》文本形成序列,确定《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分别与《总目》各种稿本或文本成书时间的先后关系,是评判它们各自的图书分类和收录等文献学价值的重要前提。而将《续经籍考》《续艺文略》《清经籍考》《清艺文略》纳入《总目》的文本形成序列,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总目》的编纂过程这一重要课题^[18, 23]。

注释:

- ① 《续文献通考》的编纂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即已开始,并在三通馆开馆前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完成初稿,但乾隆皇帝旋即命三通馆臣改纂此书,除将清代部分全部改入新修的《清文献通考》外,清以前的内容也做了大规模删改。
- ② 夏长朴认为,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也应与国博稿本为同一文本的不同部分。
- ③ 夏长朴认为南京图书馆藏《总目》稿本应该编纂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三十日之前,但又晚于上海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本文发现南京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以标注的形式增补入《钦定词谱》《钦定曲谱》及提要,而此二书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即已经被著录,因此南京图书馆藏《总目》稿本的编成还早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

参考文献:

- [1] 王钟翰.清三通之研究[J].史学年报,1939,2(5):195-230.
- [2] 韩李良.乾隆朝“清六通”成书时间考[J].历史档案,2021(1):136-141.
- [3] 韩李良.《续通志·艺文略》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新考[J].中国四库学,2020(2):73-85.
- [4] 郭艺鸽.《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与文献价值[D].长春:吉林大学,2011.
- [5] 李成晴.《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5):95-98,105.
- [6] 李成晴.《清文献通考·集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J].图书情报知识,2016(1):51-56.
- [7] 李成晴.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2):68-72.
- [8] 李成晴.《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因革《四库全书总目》析论:以子部为样本[J].图书情报研究,2016,9(3):87-90,97.
- [9] 刘晓胥.中国古代《通志》系列政书目录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 [10] 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141[M]//永瑤,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2.
- [11] 方鹏程,俞小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凡例”七.
- [12] 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J].中华文史论丛,2014(3):295-330,397-398.
- [13] 江庆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概述[M]//江庆柏,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14] 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J].文史,2014(4):163-184.
- [15] 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J].中华文史论丛,1991,48:199-219.
- [16] 清高宗实录:卷1245[M]//清实录: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732.
- [17] 毛伟林.《四库全书总目》的佛教佛学观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39-48.
- [18] 夏长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卷编纂时间及其相关问题[J].中国四库学,2020(2):33-52.
- [19] 夏长朴.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编纂时间初探[J].中国四库学,2020(1):33-50.
- [20]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21] 夏长朴.试论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的编纂时间——兼论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残卷的关系[J].中国四库学,2019(1):56-79.
- [22] 夏长朴.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6):8-20.
- [23] 琚小飞.材料与议题:四库学研究的思考[J].清史研究,2020(4):112-124.

作者简介: 毛伟林,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文献学、图书馆学史、阅读推广; 杨峰,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 尹飞, 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收稿日期: 2022-12-09

本文责编: 李芳

· 文献学研究 ·

钱泰吉题跋辑考*

林才伟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99)

摘要: 钱泰吉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钱氏观书有得,则撰首尾题跋,此类题跋是研究其生平经历及交游的原始材料。近来《甘泉乡人题跋》汇编成集,尤为可观。然钱氏藏书甚丰,交游尤广,其题跋之整理难免有遗珠之憾。文章收集了作者各处得见钱泰吉集外题跋数则,结合《甘泉乡人稿》等相关著述,考补钱氏流离上海、寓居安庆期间的生平经历,并钩沉其与吴云、六舟、蒋光燾、蒋光煦、孙衣言等名家之交游,以饕学界。

关键词: 钱泰吉;题跋;《甘泉乡人题跋》;交游

中图分类号: G256.4

文献标识码: A

A Critical Compilation of Qian Taiji's Postscripts

Abstract Qian Taiji was a famous book collector, textual critic, and bibliographer in the Qing Dynasty. When Qian read a book and found it worthwhile, he would write postscripts. These kinds of writings are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his life and travelling. Recently, a collection of Qian's postscripts entitled *Ganquanxiangrentiba* has been compiled and is particularly worth seeing. However, despite Qian's extensive book collection and travelling wide, there are still some missing postscripts. This article collects various postscripts by Qian that were not included in his published works, and supplements Qian's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during his time in Shanghai and Anqing by combining them with related writings such as *Ganquanxiangrengao*. It also delves into his travelling with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Wu Yun, Liu Zhou, Jiang Guangyan, Jiang Guangxu, and Sun Yiyuan, to provide a feast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Qian Taiji; postscripts; *Ganquanxiangrentib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钱泰吉(1791—1863年),字辅宜,号警石,浙江嘉兴人,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著有《曝书杂记》《甘泉乡人稿》《史记校勘记》等。钱氏藏书印有“警石”“泰吉印”“钱泰吉印”“嘉兴钱氏泰吉字辅宜号警石”“闲心静居”等。其素喜藏书,靡不博校,“于四库名籍几遍”^[1],假人善本,则“勘校数周,一字之外,旁求众证”^[2],实乃有清一代一硕儒也。钱氏学养深厚,观书有得,则撰首尾题跋,或考证版本,或品评鉴赏,或记录与藏书名家的书事往来。此类题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研究其生平

行历多有裨益,更为考证其与同时代藏书名家的交游提供了原始材料。近来,钱泰吉题跋之整理犹以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的《甘泉乡人题跋》最为完备,其在整理《甘泉乡人稿》《甘泉乡人述言》《甘泉乡人遗稿》诸书的基础上,辑录了钱泰吉《跋西汉会要》《跋杜工部草堂诗笺》《跋昌黎先生集》等题跋,尤为可观。然钱泰吉继承先世遗书颇丰,后历其数十载之聚集,藏书数万卷,其题跋之整理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今于各处得见钱泰吉集外题跋数则,颇具价值。故特详加考释,以就正于方家。

* 本文系2022年度山东大学文学院科研项目“《史记》钱泰吉批校辑录与研究”(项目编号: 202250250121)的阶段性成果。

1 《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不分卷 (清)

吴云辑 清咸丰六年(1856年)归安吴氏刻本 四册 钱泰吉跋

归安吴平斋观察,文章政事,众所推重。经世余暇,讲求金石之学。收罗宏富,考证精博,足与阮文达积古斋相伯仲。往岁海昌萧文学迺甲以观察所藏广明元年《老子道德经》石幢拓本见贻,论为目所未覩,宝爱不能释。避乱转徙,携之篋中,儿子应溥未知为观察旧物也。兹来沪上,因以投赠,观察谓石幢已失,拓本亦罕存,见之喜甚,乃以所刻《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属题,盖亦从姻家姚君子真索得者。观察自跋不胜烟霞过眼之叹,然《记》文传世,则按图可索,故物重还,当在旦莫间。观察名闻天下,人不爱宝,必不胥而至,吾知所积日多,金石之记,卷帙必日富。惜衰朽之质,未能相助编纂,附名册尾,亦所厚幸云。咸丰辛酉仲冬朔,甘泉乡人钱泰吉谨识。时年七十有一。

《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封面有“咸丰六年丙辰归安吴氏开雕”牌记,书名为许莲题。钤有“吴云私印”白文方印、“平斋”朱文方印、“知非盦主”朱文方印、“知非盦主人”朱文方印、“吴云平斋”白文方印、“抱甕子”朱文方印、“吴平斋五十岁小景”朱文方印、“吴云平斋考订金石文字之印”朱文长印、“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庚申后之印”白文方印、“二百兰亭斋”朱文长印、“归安吴氏两叠轩藏书印”白文方印等。首有咸丰六年(1856年)叶志洗序,末有钱泰吉、姚燮跋语,以及勒方锜、潘遵祁、李鸿裔、顾文彬、彭慰高、潘曾玮、沈秉成观款。钱泰吉跋语后钤“世业书田”白文方印、“闲心静居”白文长方印、“钱泰吉印”白文方印、“辅宜”朱文方印、“生于乾隆辛亥”白文长方印。此书现藏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馆,索书号为PL2448.W831856。

吴云(1811—1883年),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别署愉庭、醉石、松叟,室名二百兰亭斋,浙江吴兴人。屡试皆困,援例任常熟通判,历知宝山、镇江,咸丰间擢苏州知府。其好古精鉴,辑著有《两叠轩彝器图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等。钱泰吉于此跋中赞吴云“收罗宏富,考证精博”,认为他足以与阮元的积古斋相伯仲。于此可见钱泰吉与萧迺甲、吴云等

人之交游往来,从钱泰吉“文章政事,众所推重”“名闻天下”等评价可见时人对吴云之赞誉。“《记》文传世,则按图可索,故物重还,当在旦莫间”是对《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存古价值的赞许,钱泰吉相信吴云“所积日多,金石之记,卷帙必日富”。

钱泰吉之跋语作于咸丰辛酉仲冬朔,即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年七十一岁。据钱应溥《皇清敕授修职郎浩封朝议大夫显考警石府君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十一年七十一岁”条载:“九月,贼围杭州,破绍兴,将及慈谿,火光彻夜,仓卒登海舶由宁波达上海,再乘轮舟至九江,易小艇,越潘阳湖而西,至大塘程氏,卸装时已十二月矣。”^{[3]604—605}考钱泰吉《文端公临兰亭卷后附临一通跋二则》云:“先曾祖文端公,乾隆丙子八月病起时,临《兰亭序》。归安吴平斋观察云:‘收藏有年矣。’平斋好搜金石文字,兰亭尤夥,有《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行世。寇乱之后,所藏多失,此卷幸存。咸丰辛酉十月既望,儿子应溥侍余避乱至上海,与平斋相遇,因举以赠。先公临此帖时,年七十一,泰吉幸及先公临帖之年,得见遗墨,窃不自量,拟于卷尾亦临一通,附以示后。”^{[4]558}综合此二跋可知,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钱泰吉与儿子钱应溥为避难曾途径上海,得与吴云相见。钱应溥知道吴云素喜收藏鉴赏金石,故将萧迺甲赠予钱泰吉的唐广明元年(880年)《老子道德经》石幢拓本转赠给吴云,殊不知此为吴云旧物,反倒物归原主。时石幢原物已失,拓本亦为罕存,吴云得之颇为喜爱,以所刻《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属钱泰吉题。同时,吴云赠予钱泰吉先祖文端公所临《兰亭序》。文端公即钱陈群,字主敬,号香树,又号集斋、柘南居士,浙江嘉兴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中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加尚书衔,卒赠太傅,谥文端。钱泰吉于行途中撰成《文端公临兰亭卷后附临一通跋二则》。

2 《陈香泉太守手录李笠翁尺牋》不分卷 (明)李渔撰 (清)陈奕禧钞本 一册 钱泰吉题识

年来寓于陈文简双清草堂,额为香泉太守所书。闻堂址实太守旧宅也。文简元孙少山貳尹藏太守遗墨多精美。余时得展观七兄六公所藏之册,小楷数万字,始终不懈,宜其出之败瓮中而登于几席,为墨王楼增一宝玩

也。咸丰丙辰七月朔，钱泰吉拜识。

此钞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二字。无格。全书共七十六页，收录信札一百四十余通。此书为陈香泉手录汇编李笠翁尺牍而成。陈香泉，即陈奕禧（1648—1709年），字六谦，又字子文、文一，号香泉，晚号葑叟，海宁盐官人，历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贵州石阡知府、江西南安知府等职，著有《金石遗文录》《葑叟题跋》《绿荫亭集》等。李笠翁，即李渔（1611—1680年），字谿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别号湖上笠翁等，浙江金华人。《陈香泉太守手录李笠翁尺牍》钤“嘉兴钱泰吉印”白文方印、“六舟”白文方印、“墨王楼”白文方印、“海昌释达受六舟珍藏之印”朱文方印、“小绿天龕”朱文方印、“淳溪管子”朱文方印、“敦祥父独得之秘”白文方印、“六舟惟善以为宝”朱文方印、“小绿天庵六舟珍藏书画金石经籍印”朱文方印。

钱应溥《年谱》“四年甲寅六十四岁”条所载“十二月，移寓海昌陈氏双清草堂”^{[3]601}与跋语中所言“年来寓于陈文简双清草堂”相合。陈文简，即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浙江海宁人，“文简”为其谥号。钱泰吉寓居双清草堂时，从陈元龙孙陈少山处得见陈奕禧之墨宝。此书上有六舟题跋：

“香泉太守未遇时，曾安砚于山左王新城家。想旅窗余暇，手录是本。可见古人凡事谨飭，自始至终，毫无草率。蝇头小楷而具擘窠大势，名不虚有，于此益信。时咸丰六年岁次丙辰暮春，得于吾州市肆。南屏退隐道者六舟达受并弁其端于小绿天庵之墨王楼下，时年六十有六。”文后钤有“六舟”“墨王楼”两枚白文印。六舟，法号达受，别号万峰退叟、小绿天庵僧、南屏退叟等，斋名有玉佛庵、宝素室、墨王楼、小绿天庵等，浙江海宁人，善篆刻治印，尤精摹拓古器碑帖。咸丰丙辰年即咸丰六年（1856年），六舟之题跋作于是年暮春，而钱泰吉之题跋作于同年七月朔，较之更晚。考《甘泉乡人稿》，钱泰吉与六舟多有往来，钱泰吉曾从六舟处借观《集古印谱》《悟空禅师碑铭》《华严经》等。再根据钱泰吉跋语中“为墨王楼增一宝玩”一句，可知《陈香泉太守手录李笠翁尺牍》藏于六舟处，钱泰吉跟从六舟游览时得观。

值得注意的是书尾还钤有“淳溪管子”朱文方印，此当为管庭芬之藏书印。管庭芬（1797—1880年），原名怀许，字培兰，又字子佩，号芷湘，晚号笠

翁、芝翁、甚翁，亦号淳溪老渔、淳溪病叟等，浙江海宁人。钱泰吉与管庭芬、六舟多有往来，考管庭芬《日记》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日云：“午酌深庐夫子处，并晤查君巽泉、程君淡如，夜宿六公禅室。”^{[5]1510}咸丰六年（1856年）一月十三日云：“舟行人城，贺深庐夫子、六舟上人、周梦鱼昆季、陈湘圃、潘觉斋、曹杏庭诸戚友节。夜饮六公处，即宿墨王楼下。”^{[5]1542}如六舟致管庭芬书信云：“芷湘先生阁下……钱警翁竟挂冠，俟新接手到，搬至王家桥张宅矣……方外弟达受顿首，三月望日。”^[6]深庐夫子、钱警翁均指钱泰吉。管庭芬极有可能与钱泰吉、六舟同游观看《陈香泉太守手录李笠翁尺牍》。

3 《宰相守令合宙》二十四卷 （明）吴伯兴撰 明崇祯间刻本 十六册 钱泰吉题识

咸丰甲寅十月廿三日，蒋寅昉以此书及叶氏刻套版《文选》界我，孙颐仁因录《四库提要》于卷首，《四库目》中尚有《魏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元相臣传》十二卷不知得见否？甘泉乡人识于闲心静居。

吴伯兴撰《宰相守令合宙》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钤“钱泰吉印”白文方印。现藏于苏州市图书馆，索书号为G0151019。

钱泰吉之题识作于咸丰甲寅年，即咸丰四年（1854年）。蒋寅昉，即蒋光焄（1825—1892年），字绳武，号寅昉，浙江海宁人，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楼名曰衍芬草堂，藏书数十万卷。钱泰吉与蒋光焄多有诗文唱和、书事交游，《故交遗翰节存》第一册存有蒋光焄与钱泰吉往来书信三十九通，《甘泉乡人稿》中亦存有钱泰吉为蒋光焄所作书画题跋。蒋光焄借给钱泰吉的《宰相守令合宙》为明崇祯间刻本，书前录有《四库提要》。此处还提及钱泰吉从蒋光焄处借得叶氏刻套版《文选》，此本《文选》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叶氏海录轩朱墨套印本。钱泰吉的著述中多处提到他购买或借阅《文选》，如《甘泉乡人稿》卷七“明新都刻六臣注《文选》”条载“《文选》余旧藏六臣注六十卷，为明神宗二年新都崔大夫刻本”^{[4]312}，又“《文选》评本”条载“道光壬午，得评本于杭州市肆，乃重刻汲古阁本”^{[4]312}，《甘泉乡人稿》卷九“北宋刊本《文选》”条载“北宋刊本《文选》，是书今在张芙川处，丁酉夏寄来属余作跋”^{[4]348}，然此叶氏海录

轩朱墨套印本《文选》未曾提及,可丰富对钱泰吉校勘《文选》所用版本之认识。蒋光焄对钱泰吉校勘古籍帮助颇深,除《文选》外还为钱氏提供了不少其他古籍版本。比如钱泰吉校勘《史记》时所用明游明本即为蒋光焄所藏。钱泰吉致蒋光焄信札中亦可见求书之言,如“日来校游本《史记》,叨惠不浅,如有余年,尚须假邺架各本一校。惜《正义》无善本,总难满志耳……《史记》白文,及邺架旧藏真王本,望携数册来,日内正在校游本,可以参看也”^{[7]99},“所贻汪本《后汉》,浏览甚便,何敢得陇望蜀”^{[7]103}。

4 《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 (宋)司马光撰 (清)李光瑛观妙斋刻本 三册 钱泰吉校并跋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点读一笔过,蒋生沐假所藏张氏海鹏《学津讨原》刻本至。已校至十四卷,爰自十五卷以后以张本校对,参以许辛木所阅本,与此刻同。粗为是正。子侑姪鬯醇亦寄所阅本,尚需细校也。甘泉乡人识。时年六十有二。

朱子在长沙所刻《稽古录》,自谓胜越中本,当即陈直斋所称潭本也。潭本、越本既皆不可见,世所通行者惟此本,不知何人所刻。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似从潭本,而脱讹颇甚,恐亦如赵氏所刻《历年图》,不免有所增损,而传写之不审则又甚焉。咸丰壬子夏日养疴,取许辛木会元楣及兄子鬯醇阅本粗校一过,两本皆同此刻。又从蒋生沐光煦假昭文张氏《学津讨原》本比,稍稍是正。张氏本差善,然若汉武帝时脱天汉三年至征和二年事,凡八年,而以征和三年、四年事为天汉三年、四年,张氏亦未及校正。若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迁安西都护于龟兹,兼统于阗、疏勒、□□,此刻空二字。谓之四镇”,张本补“碎叶”二字,是矣。而前文云“阿史那社尔拔焉耆,虏其王诃黎布失毕”,则以龟兹王为焉耆王,温公元本必兼序焉耆、龟兹二事,而传者脱失,张氏亦未及校正。又若汉宣帝地节二年,“二”误“三”,张氏既改正矣,而立许后子爽为皇太子乃三年事,今误系于二年下,而三年乃无事,张氏亦未及校正。他处类此者不可枚举。老年眼花臂病,史事不熟,翻阅为难,尚望同志共为校讎,以成善本云。七月十一日,甘泉乡人钱泰吉识于海昌学舍。

三年正月廿七日,录许辛木主政补校各条。泰吉。

此刻本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鱼尾单鱼尾。钤“钱泰吉印”白文方印、“辅宜”朱文方印、“可读书斋”朱文方印、“嘉兴钱泰吉校读本”朱文印、“友芝”朱文印。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为线善750305—06。

钱泰吉题跋共三则,第一则作于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前钱泰吉以许楣校本、钱鬯醇校本校勘,是时尚未用张海鹏《学津讨原》刻本进行校勘,计划从十五卷开始以张刻本校对,参以许校本。第二则作于同年七月一日,此时钱泰吉的校勘工作基本已经完成。第三则作于次年正月二十七日,钱泰吉在校本中补充许楣数条校记。其中第二则“朱子在长沙所刻《稽古录》”至“甘泉乡人钱泰吉识于海昌学舍”收入《甘泉乡人稿》卷六,题为《跋〈稽古录〉校本》^{[4]297}。而《甘泉乡人稿》及《甘泉乡人题跋》未收第一则、第三则跋语,当据补之。基于此可知钱泰吉校勘《稽古录》是以许楣校本、钱鬯醇校本为通校本,以张刻本为参校本,这些内容《甘泉乡人稿》所载未详。张刻本为钱泰吉自蒋生沐处借得,蒋生沐即蒋光煦(1813—1860年),字日甫,一字爱荀,号生沐,海宁硖石人,清代著名藏书家,与钱泰吉多有书事往来。许辛木,即许楣(1797—1870年),字蕴千,号辛木,浙江海宁人,著有《真意斋随笔》《真意斋文集》《钞币论》等。考清光绪五年(1879年)江苏官书局刻本《稽古录》附有《稽古录校勘记》一卷,卷首曰:“记中所称原本即通行本,杨本为明杨氏璋所刊仿宋本,张本即张氏海鹏《学津讨原》本,三本互有异同,今参斟酌定,所据各书具详本条。又许氏楣、钱氏泰吉及其兄子鬯醇皆尝校是书,今亦参用其说焉。”^[8]钱泰吉校录本上许楣、钱鬯醇及其本人的观点多被江苏官书局本采用,钱泰吉的校勘成果对于江苏官书局刻本《稽古录》的成书起到了重要作用。

5 《宋槧汉书残本考异》一卷 (清)钱泰吉撰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手稿本 一册 钱泰吉题记

道光乙巳夏日,遇塘栖劳季言格于吴山书肆,未几,朱述之金陵人明府绪曾亦至,两君皆博闻、广收藏。各操口音不相通,因此笔谈,良久而罢。余亦得闻所未闻。劳君语余,有松厓先生《汉书》校本,逾月,属

其从子枕叔颀携示，因倩钟署香、潘稻孙为抄录此本。枕叔以所纂补钱晦之《续汉书艺文志》，属为之序，尚未有以应也。十月十三日，泰吉记。

此稿本黑格白口，单鱼尾，单边。铃“嘉兴钱氏泰吉字辅宜号警石”朱文方印、“文瑞曾孙”朱文方印、“钱泰吉印”朱文方印、“钱泰吉印”白文方印、“警石”朱文方印、“可读书斋”朱文方印，“卜菜盘食读异书”朱文方印。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为T20613。

钱泰吉校勘《汉书》近三十载，成果颇丰。金陵书局本《汉书》在校勘的时候大量用到了钱泰吉的校勘成果，刘毓崧《校刻〈汉书〉凡例》有载：“《汉书》字句古奥，较之《旧唐书》难读不啻倍蓰，虽钱警石先生哀校各本，俾阅者事半功倍。”^[9]其批校本《汉书》及其过录本分散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多地。此稿本《宋槧汉书残本考异》亦是钱泰吉校勘《汉书》的成果之一，其据宋刻《汉书》考校异同，多有阐发，富有己见。

此题记作于道光乙巳年，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钱应溥《年谱》“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岁”条载：

“夏日，与仁和劳季言格遇于吴山书肆，季言尝言惠半农学士松厓征君所校《汉书》曾仿《后汉书补注》摘录成卷。逾月，令其从子枕叔颀携借府君录副本藏之。”^{[3]594}二者虽有部分重合，然钱泰吉之跋语显然更为详实。《年谱》所记与钱泰吉见面者仅有劳格，据跋语可知当有劳格与朱绪曾二人，且跋语详细记录了三人因乡音不通，只能通过笔谈来交流的过程。劳格（1819—1864年），字季言，浙江仁和人，好学嗜藏，精通校讎，通晓史典，著有《读书杂识》等。朱绪曾（1805—1860年），字述之，号北山，江苏上元人，通经史训诂，藏书逾十万卷，皆以精审称，著有《北山集》《曹子建集考异》《开有益斋集》等。钟署香，即钟继芸，潘稻孙，即潘诒谷，二人常为钱泰吉抄书，比如《甘泉乡人稿》卷五《〈文苑传〉跋》记：“昨岁，梧君下世，其册归唐氏，泰吉乃属钟署香、潘稻孙为钞此本。”^{[4]293}二人为钱泰吉抄惠半农《汉书》校本一事，《甘泉乡人稿》未载，可据跋语补充。同时，跋语中还提到了劳颀请钱泰吉作序一事。劳颀，字枕叔，劳格从子，仁和人，著有《续汉书艺文志》。是书之序文为泰吉所写，《甘泉乡人稿》卷十六载《劳枕叔颀订补〈续汉书艺文志〉序》：“乙巳夏，遇仁和劳季言甫于吴山书肆，语余其从子枕叔取可庐之书正定之，已有

写本。逾月携其书来。”^{[4]431}而钱泰吉写此跋时，“尚未有以应也”。

6 《孙过庭书谱》不分卷 明文徵明停云馆初拓本 一册 钱泰吉题识

此文氏停云馆初拓本也。泰吉尝敬观三希堂法帖，天上宝书非可企及。他若宋元佑河东薛氏本、明渤海陈氏玉烟堂本、康熙间麓村安氏本，体格不殊，神彩迥异矣。特未知王晋卿家黄麻纸真迹及大观太清楼所刻何如耳。朱书释文为海昌钟梧村先生笔，秀劲绝伦。先生讳凤翔，字千仞，乾隆壬戌庶常改官知县事。详《州志·循吏传》册中名字印为鬻者，涂抹尚隐约可辨别。得先生所藏淳化阁帖小楷释文始终不懈，前辈用心之细，用功之密，足为后学法式，不独艺事之一也。安氏本有陈香泉太守释文，体兼行楷，别为一卷，此则正书，旁注可省两读，安得好事者钩摹上石与香泉翁并寿天壤耶。道光辛卯夏日，鸳湖读旧书生钱泰吉识于海昌学舍可读书斋。

书谱前半真迹已亡。翻刻入石后半，真迹具存，勾填入神。故停云馆帖所刻笔气相悬若此。孙虔礼，字过庭，见陈子昂撰墓志。《宣和书谱》云：孙过庭，字虔礼，甚谬。咸丰戊午四月廿七日，偶检《清河书画舫》录于闲心静居。甘泉乡人时年六十有八，辞谢学职已六年矣。

《孙过庭书谱》拓本，题签为“停云馆初拓书谱”“海昌钟梧村先生朱书释文”“嘉禾甘泉乡人钱泰吉”。铃“钱泰吉印”白文方印、“钱泰吉”朱文方印、“泰吉”朱文方印、“山阳朱铸禹审定金石书画印”朱文方印、“铸禹心赏”朱文方印、“山阳朱氏”朱文方印等。该书谱为朱铸禹旧藏，朱铸禹（1904—1981年），名鼎荣，以号行，江苏淮安人，精于碑帖鉴定。

第一条题识作于道光辛卯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年）。钱泰吉将文徵明停云馆初拓本与三希堂法帖比较，认为“非可企及”。并言宋元佑河东薛氏本、明渤海陈氏玉烟堂本、康熙间麓村安氏本各具特色。朱笔释文者为海昌钟梧村，钱泰吉称其字“秀劲绝伦”，并辑《州志》于后，盛赞前辈“用心之细，用功之密”，以期后学效法。钱泰吉还指出康熙间麓村安氏本与文徵明停云馆初拓本之区别，前者所载陈香泉太守释文（陈香泉太守即陈奕禧，具见前文）独为一卷，后者将正文与释文合刻。

第二条题跋作于咸丰戊午年,即咸丰八年(1858年)。两条题跋间相距近二十余载。此条题跋为钱泰吉自《清河书画舫》中过录,分别见于卷三“孙虔礼《书谱》小字千文”条和“孙虔礼”条。据末句“甘泉乡人时年六十有八,辞谢学职已六年矣”,可知其于咸丰三年(1853年)辞去海宁训导一职,与《庐江钱氏年谱续编》卷五“咸丰三年癸丑”条所载“甘泉公致仕,旋主讲海昌安澜书院”^{[10]61}相合。

7 《逊学斋文钞》十二卷 (清)孙衣言撰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 二册 钱泰吉题识

永嘉先儒文集,余独未见薛常州耳。陈文节以下,皆尝寻览,大都深厚质实,不为过高难行之论。展卷静读,儒者气象,恍在心目间。有宋永嘉之学,与金华并为吾浙大宗,所以世无异说也。今虽稍衰,承学之士犹未艾。余夙闻瑞安孙琴西兄弟能文章,登上第,为清华选,心窃慕之。今与琴西相遇皖中,既读其刊行《逊学斋古今体诗》十卷,又出其文稿相示,皆自成机杼,无所依傍,不必与文节诸公同,而宗旨无异。碑版述事之文,造句尤似昌黎,为近时所罕见。假令久居禁近,簪笔侍从,记事记言,成一代巨制,岂异人任。乃去承明之庐,出领大郡,虽为朝廷分忧重寄,然琴西恋阙之思,遥望五云,能无慨叹?虽然,以琴西之学行、政事、文章,任所施設,无所不宜。政事须假手事权,琴西既不乐,持手版谒监司,暂卸郡符,闲居乐志。吾意斯时也,可专事文章矣。琴西以我为然乎?我于琴西愿有进。百余年来,古文家竟推桐城,桐城诚为正宗,然为学各有家法,文章流别,不必一涂,先哲遗型,近而易习,琴西于其乡先生之文,童而诵之矣。吾愿益专其业而推广之,昌明永嘉之学,俾世之人知吾浙之学犹有永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不亦美乎?琴西以我言为然乎?否耶?同治二年,岁在癸亥九月既望三日,嘉兴钱泰吉拜识于皖城寓舍。时年七十有三。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逊学斋文钞》,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诸可宝题署。书前有钱泰吉、吴大廷序,书末有许宗衡、胡凤丹跋。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均有藏此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刻本有翁同龢批语,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抄本一种。瑞安市玉海楼藏稿本《孙琴

西文稿》一卷。其作者为孙衣言(1815—1894年),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拔,斋名逊学,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孙衣言是清代著名藏书家,藏书楼名为“玉海楼”,著有《逊学斋诗钞》等。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钱泰吉自江西迁至安徽安庆城西。据钱应溥《年谱》条载:“十一月迎养府君赁居城西。”^{[4]605}《庐江钱氏年谱续编》卷五亦载:“十一月,先考迎养先大父母于皖城。”^{[10]3}寓居安庆期间,钱泰吉与“独山莫子偕孝廉友芝、新宁邓伯昭孝廉瑶、南汇张嘯山茂才文虎、瑞安孙琴西观察衣言、乌程周縵云侍御学浚、桐城方存之茂才宗诚、阳湖方元征二尹骏谟、海昌李壬叔茂才善兰”等学人“过从尤密”^{[3]605}。

孙衣言与钱泰吉相识于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初九日。是日孙衣言《赴皖日记》云:“晤钱警石封翁。封翁为余甲辰同年,子方孝廉己酉拔贡,子密枢部之尊人,时子密在节相幕中,迎养封翁于此。”^{[11]727}三月十九日,孙衣言前去拜访钱泰吉^{[11]733}。四月初一日,曾国藩“请客持便饭”,钱泰吉与孙衣言皆在座^[12]。钱氏题识中言“读其刊行《逊学斋古今体诗》十卷,又出其文稿相示”,与孙衣言五月十四日《赴皖日记》所载“晤梅生、子密、壬叔、警石先生、縵云侍御、梁药洲太守春亨。节相见示杨性农新刊诗文”^{[11]740}相合。六月十九日,孙衣言“晤警石先生”^{[11]743}。七月十九日,孙衣言“晤警石先生,出新得《玉枕兰亭》,索为诗”,所作之诗载于《逊学斋诗续钞》卷三^{[11]236}。八月二十日,孙衣言“访钱警石太翁”^{[11]749},未详记拜访所为何事。直至十月初二日,孙衣言时隔月余方再度“晤警石先生”^{[11]752}。据钱泰吉“九月既望三日”落款,可以推测孙衣言可能是于八月二十日面请钱泰吉作序。

十一月十七日,钱泰吉病重^{[11]951}。次日,孙衣言亦前去“视警石先生疾”。二十日,钱泰吉逝世于安庆旅社^{[4]235}。钱泰吉与孙衣言虽然相识时间甚短,却结下了深情厚谊。作于钱泰吉人生末年的此篇序言正是二人情谊的重要见证。钱泰吉评价孙衣言文章“自成机杼”,文节异而宗旨同。碑版述事的文章“造句尤似昌黎”,十分罕见。如果“久居禁近,簪笔侍从,记事记言”,可以成为一代巨著。同时,钱序认为桐城派固然是古文正宗,但“为学各有家法”,文章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表明自己愿推广孙衣言之文,以“昌明永嘉

之学”，使世人知“浙之学犹有永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孙衣言亦于《赴皖日记》中称赞钱泰吉“博学能为诗、古文辞，尤勤于校书”，“封翁年七十三矣，而嗜学如旧，可敬也”^{[11]727}。可见二人彼此欣赏，相互敬重。

8 结语

今所辑钱泰吉题跋皆为前人所未备，于此可见钱

氏爱书之深、搜采之广、治学之勤，实不愧为一代硕儒。亦于此可见钱氏交游之广，其书事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清代文人之交游提供参考材料。题跋中不乏钱泰吉对同时代学人之评价，可供学界参考。此类题跋可补钱氏文集、年谱之缺漏，是研究其生平、藏书、交游以及学术活动的重要补充材料。今以题跋之辑录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钱泰吉进行更为深入之研究。

参考文献：

- [1] 吴仰贤等.嘉兴府志：卷二十一[M].许瑶光等修.刻本.1908(清光绪四年):38.
-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369.
- [3] 钱应溥.皇清敕授修职郎诰封朝议大夫显考警石府君年谱[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1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 钱泰吉.甘泉乡人稿[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1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 管庭芬.管庭芬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6] 六舟.六舟集[M]//浙江文丛.桑椹,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74.
- [7] 赵厚均.钱泰吉书札辑存[M]//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历史文献：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 [8] 司马光.稽古录[M].刻本.1879(清光绪五年):1.上海图书馆藏.
- [9] 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仪征刘氏集：上[M].吴平,李善强,郑晓霞,整理.扬州:广陵书社,2018:316.
- [10] 钱仪吉.庐江钱氏年谱[M].钱骏祥,续辑.排印本.天津.1911(清宣统三年).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 [11] 孙衣言.孙衣言集[M].刘雪平,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12]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4:876.

作者简介：林才伟，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2-12-28

本文责编：李芳